

2021 年 3 月 関西大学審査学位論文

18、19 世纪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从语言学发展的视角出发

関西大学大学院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

李 思漢

18、19 世纪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从语言学发展的视角出发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

2021 年

李思漢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 18、19 世纪意大利的汉语教学和研究。自西方人开始研究汉语起,意大利便诞生了重要的汉语研究者。尽管 16、17 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被认为是汉语研究的先驱者,但到了 18、19 世纪,意大利在汉语研究方面似乎并没有取得重要的突破性进展。然而,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史资料后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本篇论文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共四章,讲述 16 至 18 世纪初西方对汉语的研究。第一章揭示了西方人语言研究的起源,分析了从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语言研究的发展进程;第二、三章则从 16 世纪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出发,探讨了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不同时期和不同修会对汉语的研究情况;第四章归纳了前三章的内容,总结出了 18 世纪初以前,西方人汉语观的发展路线。

作为论文主体的第二部分同样分为四章,主要通过分析 18、19 世纪中国和意大利的汉语教学和研究,来探讨西方汉语教学体系的变革和汉语研究的发展。第五章分析了西方传教士协助编纂的《华夷译语·拉氏诺话》,以此说明中西方在语言研究领域的合作。第六章则将重点放在了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这位在 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神父身上。受“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影响,清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得益于马国贤以及其他传教士的努力,双方的关系得到了缓解,从而使得中西文化交流能够得以延续。第七章着重介绍了马国贤回到意大利后创建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以及书院对西方的汉语教学和研究所起到的推进作用。

最后的第八章则从两个方面说明了 18、19 世纪的意大利对汉语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在汉语研究方面,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学生为西方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语

言文字学，从而为西方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汉语语法的思路。在汉语教学方面，书院的建立则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新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意大利汉语教学；意大利汉语研究；那不勒斯中国书院

目录

研究背景.....	1
研究方法.....	2
研究目的.....	2
创新之处.....	3
第一部分:	
前史: 16 世纪-18 世纪初西方对汉语的研究.....	5
第一章 西方人对语言的研究——从公元前到文艺复兴.....	8
1.1 在古希腊 (Ancient Greece) 发源的西方语言学.....	8
1.2 古罗马时期 (Ancient Rome)	9
1.3 中世纪时期 (Middle Ages 或 Medieval)	10
1.4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11
第二章 16 世纪: 首次来华的耶稣会会士.....	13
2.1 利玛窦之前的来华传教士.....	14
2.2 罗明坚、利玛窦和《葡汉辞典》.....	16
2.2.1 《葡汉辞典》的主要架构.....	18
2.2.2 《葡汉辞典》的注音系统.....	20
2.2.3 《葡汉辞典》以后传教士们的注音系统.....	22
2.2.4 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注音系统.....	23
2.2.5 总结.....	24
2.3 利玛窦的汉语观.....	25
第三章 17 世纪: 西方人的汉语语法教材.....	30
3.1 卫匡国与《中国文法》.....	31
3.1.1 白佐良整理版本《中国文法》的内容.....	33
3.1.2 《中国文法》的影响和贡献.....	41
3.2 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	43
3.2.1 来中国传教的托钵修会.....	43
3.2.2 万济国.....	46
3.2.3 《华语官话语法》.....	47

3.2.4 《华语官话语法》的章节分析.....	49
3.2.5 总结.....	56
3.3 马若瑟与《汉语札记》	57
3.3.1 马若瑟.....	58
3.3.2 《汉语札记》	59
3.3.3 总结.....	61
第四章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汉语观的发展.....	65
4.1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耶稣会.....	65
4.2 17 世纪中叶, 卫匡国的《中国文法》	66
4.3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 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	67
4.4 18 世纪上半叶, 马若瑟的《汉语札记》	70
4.5 汉语观的传承	71
 第二部分:	
18、19 世纪发生在中国和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75
第五章 康乾盛世与丁种本《华夷译语》	76
5.1 《华夷译语》及其研究	77
5.2 《拉氏诺话》的基本情况以及中文书名考察	81
5.4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拉氏诺话》的分析	83
5.4 结论	92
第六章 马国贤及其对汉语在欧洲传播所做出的贡献.....	95
6.1 先行研究	96
6.1.1 国外的研究情况	97
6.1.2 国内的研究情况.....	99
6.2 马国贤来华前的早期生平	101
6.3 马国贤对于缓解礼仪之争的贡献	103
6.3.1 礼仪之争的背景.....	103
6.3.2 “利玛窦规矩”	104

6.3.3 马国贤之前“礼仪之争”的过程.....	105
6.3.4 马国贤对缓解“礼仪之争”的贡献.....	108
第七章 那不勒斯中国书院.....	112
7.1 马国贤归国以及书院的创立.....	112
7.2 前期书院的生活以及学习.....	114
7.3 后期书院的生活以及学习.....	117
7.3.1 第一阶段.....	119
7.3.2 王佐才编写的课本.....	125
7.3.3 郭栋臣《华学进境》.....	130
7.3.4 本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142
7.3.5 总结.....	143
7.4 结论.....	145
第八章 结语.....	147
8.1 汉语研究的发展.....	147
8.1.1 18、19 世纪意大利汉语教学与研究对语言学发展的作用.....	147
8.1.2 关于词本位和字本位.....	155
8.2 西方汉语教学体系的变革.....	160
8.2.1 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动机.....	160
8.2.2 西方人汉语认知情况.....	163
8.2.3 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方法.....	165
8.3 结论.....	168
参考文献.....	173

研究背景

有学者将西方对于汉语的研究分为了“游记阶段”、“传教士阶段”以及“专业阶段”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游记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他将中国写进了自己的游记当中，让西方人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着中国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传教士阶段”是由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开创的。当时，天主教修会想在中国进行传教，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传教士们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中国文化；“专业阶段”则是以法国汉学鼻祖雷穆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于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中国学学科为开端，至此，汉学作为一门客观地研究中国以及汉语的学科正式诞生，并延续至今。

游记阶段和传教士阶段的区别在于：游记阶段的作者只记载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只停留于表面的认识和描述；而在传教士阶段，由于传教士需要入华宣传教义，说服中国人信教，尽管各个修会的传教策略有所不同，对于汉语的学习以及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针也略有差别，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们开始学习中文、阅读汉语古籍、编纂辞典和教科书并且翻译各种汉语文献。在传教士阶段，西方人对于汉语的掌握以及中国文化的研究都远远超过了游记阶段；而专业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专业阶段彻底将中国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并采取人文学科的研究办法对其进行研究。

尽管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将中国学真正纳入西方人文科学的框架，但其实早在十七世纪，传教士们就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各个学科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了。尤其是在西方语言学这一领域，自语言学在古希腊起源之后，由于其素材一直没有走出西方屈折语的框架，导致它在古罗马以及中世纪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直到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出于传教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学习并研究汉语，因此，耶稣会会士开始编纂双语字典，同时多明我的传教士也开始了汉语语法的研究，这些无不对西方的语言学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研究方法

本文基本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过去的一手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和研究。同时，在对前辈的先行研究进行归纳和整理的基础之上，找到其尚未明确解决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笔者在论文中进行分析的文本，除了极少数已经失传，大都能够找到原本、影印本或者是译本。由于本文想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待传教士对于汉语的研究是以何种方式增进西方人对语言学的认识 and 理解的，因此，本文通过对文本的剖析和对比，按照时间的顺序，整理出了一条传教士汉语观的发展路径，以此来探讨传教士汉语观对西方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出发，探索传教士阶段汉语在意大利的传播，以及它对西方人的语言观和语言发展产生的影响。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介绍和分析了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的传教士阶段汉语研究的诞生；汉语研究在 18 世纪的发展；以及它对 19、20 世纪的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自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对汉语的研究也受到了西方的很大浸染。这种浸染在促进中国语言学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把中国人对于汉语的研究引进了一条“歧路”。

本文从 16 世纪末利玛窦来到中国大陆和罗明坚一起编纂《葡汉辞典》开始谈起，将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上半叶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作为前史。虽然前人对于 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上半叶汉学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者，都很少从一个整体发展的视角出发，来审视这一段历史以及这些著作的进步。故笔者将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重新审视这段时期传教士们的作品，提炼出他们的汉语观，从而以一个更加整体和宏观的视角来分析它们的变化和进步。

接着，本文将把重点放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总体来说，18 世纪中叶以后的

西方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对于汉语的研究，并没有像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上半叶那样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研究汉语方面取得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他们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其先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完善和深入。因此，18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在汉语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并不是很大，即便是 16 到 18 世纪上半叶曾为这个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耶稣会，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取得的成果也寥寥无几。但另一方面，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汉语在西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不同于之前的两个世纪，汉语主要为传教士传教所需，18 世纪中叶以后的汉语著作尽管在学术上产生的价值有限，但对汉语以及汉语研究的普及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过三个世纪的历练，西方汉学在 19 世纪后半叶终于迎来了专业阶段。汉语为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增添了很多的“原料”，与此同时，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中国人也逐渐开始使用西方的语言学以及语法框架来分析中文。

本文通过分析和梳理西方人在三个世纪中对汉语的研究以及他们汉语观的变化，说明汉语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对西方人的语言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同时，对受西方人汉语研究影响的中国语言学发展也进行了说明。

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前人关于语言学的研究，大多将研究的范围铺得太广。我们知道，语言学涵盖的内容很广，涉及的语种也很多，汉语只是这一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导致完全针对语言学的研究很难将重点集中在传教士汉学时期的意大利这一专门的领域中。另一方面，从汉学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于 16、17 世纪汉学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而言，比较零散，不具有系统性。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就是整理了前人对于 16、17 世纪的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相对来说比较零散的研究成果，用语言学的发展作为线索，串在了一起。

第二个创新点则是在上述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了一些这个领域尚未研究过的内容。例如乾隆年间传教士编纂的丁种本《华夷译语》。之前对于这套《华夷译语》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简单的描述性层面，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在于丁种本的《华夷译语》只有一套原本藏在故宫博物院，这就使得在 2018 年出版之前，学者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丁种本《华夷译语》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套外语教科书，是在传教士们的帮助下编纂完成的，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外语观，也能反映出此时传教士们的汉语观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另外鲜有人研究过的是那不勒斯中国书院所使用的教材。和丁种本的《华夷译语》相似，学界对于这些教材的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简单的整体描述阶段。例如，对于在那不勒斯翻译出版的《初学简径》一书，绝大多数研究者只是提及一句这本书是在 17 世纪完成、18 世纪初出版的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的拉丁语译本，但其实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编者）对万济国原书的很多部分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而这些修改恰恰体现了多明我会的万济国与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双方教学理念以及汉语观的不同。

第一部分

前史：16 世纪-18 世纪初西方对汉语的研究

研究 18、19 世纪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对西方的汉语研究做出了何种贡献，首先需要了解在此之前，西方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对于汉语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笔者认为，西方对于汉语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以及研究，是从 16 世纪末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的。从那时起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书籍资料，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著作当中一窥当时西方人对汉语的研究。西方人研究汉语所使用的是从西方流传下来的一套传统方法。

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着眼于西方语言研究方法的诞生及其发展；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逐渐获得了“汉语”这一研究的“材料”，并使用其已有的研究方法来对之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由“老方法”和“新材料”所产生的研究结果，也开始反过来拓宽西方对于语言的研究方法。

在西方，人类对于自身语言的哲学性思辨起源于古希腊。当时古希腊的哲学家便已经开始对自身的语言进行剖析，提取出了一套语言框架。继古希腊语之后，同样作为屈折语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出现，以及它们与希腊语之间的交流，并没有扩充原有的“素材”，这使得直到中世纪，西方人对于语言的认知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欧洲，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使得西方人向东方行进，进入了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并且开始研究这些地方的语言。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游记的完成，让西方人第一次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在《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第一版约 1298 年出版）当中寥寥数行对汉语的描述，让欧洲人知道这个神奇的国度在使用一种神奇的文字和语言，仅此而已。

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欧洲发明了活版印刷术，加之地理大发现，使得知识的交流和流通范围更加广泛。各个天主教修会也开始逐渐向东方行进，试图在东方建立教区。十六世纪末，以罗明坚神父和利玛窦神父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终于经澳门进入了中国内陆，这预示着西方和中国相对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的开始。

利玛窦和罗明坚合作编纂的《葡汉词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未出版）成为了中西文对照词典的鼻祖，由罗明坚首创的汉字注音系统也对这领

域的发展做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利玛窦随后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神父一起改进了罗明坚的注音系统。而后，同为耶稣会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完善了这一注音系统，这一系列的成果为后人学习和研究汉语读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利玛窦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与中国朝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以后的传教士开展工作提供了无比便利的条件，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尽管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就有一些对于中文语法的简单说明，利玛窦则丰富并且加深了对汉语语法的认识，但尚无人尝试真正系统地解释汉语语法。直到同为耶稣会会士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写出了《中国文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¹，他在书中使用诞生于古希腊西方语言学的那一套理论来解释汉语。这本书的手稿最终并没有出版，从其内容来看则比较像是一个半成品。但其手稿的流通使得欧洲很多非教会的人士认识到了汉语这门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本书也是欧洲人了解汉语的唯一途径。

第一本出版的汉语语法书是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所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 年出版）。相较于热衷于编写词典的耶稣会，多明我会对于编写汉语语法书情有独钟。这样的传统使得这本语法书相对于卫匡国所写的语法书更加系统和全面，对汉语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并且书籍的出版，也让这本书影响了欧洲很多学者。

当今，很多学者在评价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时，都认为，这两本语法书的作者把汉语塞进了一个完全不适合自己的欧洲语言框架之中，并且试图用这个框架来对汉语进行分析。同为耶稣会士、并且精通汉语的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63），开始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并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写进了著作《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0）。

¹ 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很可能并不是第一本用西文写成的汉语官话语法书。但是由于成书于这本书之前的语法书均只有文献上模糊的记载，并没有找到原本，下文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说明。

第一章 西方人对语言的研究——从公元前到文艺复兴

1.1 在古希腊（Ancient Greece）发源的西方语言学

古希腊人善于思辨，早在公元前便在哲学领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古希腊被誉为西方哲学的起源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甚至这样说道：“严格来说，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希腊哲学”²。善于思辨的古希腊人对于语言也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探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套方法论的体系（这种成体系的方法论直到 18、19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所以，与其称这个时期的研究者“语言学家”(Linguist)，学界更倾向于称其为“早期的语法研究者”(Early Grammarians)，他们完成了两件与语言研究相关的重要工作：首先，分离并且几近完善出了一套西方词类框架³；其次，将语言的艺术——修辞学发展成了一门学问。

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学派（Alexandrian school）的重要代表人物狄奥尼修斯·瑟拉克斯（Dionysius Thrax, 前 179-前 90）在著作《语法术》（*Τέχνη Γραμματική*，公元前 2 世纪前后）中，将西方语言分成了八个大的词类，第一次建立了以“词法”为基础的西方语言框架。这套语言框架对于欧洲语言研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现在对于八大词类的提法，是否可以追溯到瑟拉克斯尚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瑟拉克斯在书中混淆了一些语法概念，直到几十年后的特里丰（Tryphon, 前 60 年-约前 10 年）才将这些概念解释清楚，因此他们认为，瑟拉克斯发明了八大词类的分类方法，这种说法是错误的。⁴但显然这些话题并不在本论文所研究的范围之内，故笔者暂且将这套或许是由瑟拉克斯创立、特里丰完善的八大词类体系归功于瑟拉克斯，将其称之

² [英]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 2 页。

³ Pieter A.M. Seuren, *Western linguistic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1998, pp. 2-24.

⁴ De Jonge, Casper Constantijn, *Between Grammar and Rhetoric: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Brill. 2008.

为瑟拉克斯的八大词类框架。

总的来说，古希腊时期的探索奠定了西方对于语言研究的基础。但也存在相当的局限：由于语言研究的发展确实取决于思辨，但是却更依赖“工具（即研究方法）”和“素材（即研究内容）”⁵。只把古希腊语，这门具有明显印欧语系特征的屈折语作为研究对象，这毫无疑问阻碍了古希腊语言学进一步的发展。

1.2 古罗马时期（Ancient Rome）

公元前 753 年，即罗马第一任国王罗穆卢斯（Romulus，约前 771-约前 717）建立罗马城的前后，一批希腊人移居到了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岛。公元前九世纪便开始统治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都对罗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无论是语言、宗教、音乐、艺术，还是文学，罗马人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罗马人只是在希腊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少许的创新和改造⁶。由于大都只是学习和模仿，因此古罗马在文化的研究以及创新方面要逊于古希腊。

具体到语言研究，与上述观点一致，罗马人并没有在希腊人的基础上取得很大进展。其主要原因和限制是与古希腊语言学发展的要素相一致的：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相对不成体系的研究方法时，缺少新鲜素材。古罗马所使用的拉丁语本身就受到了古希腊语的极大影响⁷，两者均是印欧语系鼻祖的屈折语，在语言结构以及语言现象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罗马人很难在希腊人的基础上有什么突破。

⁵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第 7 页。

⁶ 有关古罗马从古希腊继承的语言、宗教、音乐以及艺术，请参考下列资料：

J.B. Calvert, *The Latin Alphabet*,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9,

Roy Willis, *World Mythology: The Illustrated Guide*, Voctoria: Ken Fin Books, pp. 166-168

Lesley Adkins, Roy Adkins, *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50-352,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1988.

⁷ 古希腊语影响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语言，随后伊特鲁里亚人的语言以及古希腊语又深深影响了拉丁语。

请参照 J.B. Calvert, *The Latin Alphabet* 的内容。

1.3 中世纪时期 (Middle Ages 或 Medieval)

中世纪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难以定义的历史时期。一般来说,我们将公元476年,即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罗穆卢斯·奥古斯都 (Romulus Augustulus, 475-476年在位) 被日耳曼蛮族奥多亚克 (Odoacer, 435-493年) 罢黜,作为中世纪的开始。最后,中世纪在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的开始以及东罗马帝国的消亡之中迎来了终结。相比于之前的古罗马以及之后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显得毫无生气,以文艺复兴的先驱弗朗齐斯科·彼得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为代表的后人甚至将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⁸” (Dark Ages)⁹。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313年由君士坦丁一世所颁发的“米兰敕令”,让以前作为“地下宗教”的基督教合法化。而帝国的灭亡,使整个欧洲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政权,各个相对较小的封建势力之间战火不断。蛮族的不断入侵,使原本作为西欧官方语言的拉丁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¹⁰。然而,这样的局势,甚至语言的割据局面反而导致了天主教教会势力的逐渐发展和扩大。随着教权的不断膨胀,教会控制了绝大多数的知识和教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只能从教会那里学习和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的前提便是学习作为官方语言的拉丁语。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两本拉丁语课本分别是普里西安 (Priscianus Caesariensis, 活跃于500年前后,一般被称为 Priscian) 的《语法研究》(拉丁语: *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 以及多纳图斯 (Aelius Donatus, 活跃于4世纪中期) 所著的《语法艺术》(*Ars Grammatica*)¹¹。这两本书均使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词类语言框架。

中世纪中后期,在语言研究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将拉丁语作为衔接的纽带,将之前在拉丁语中的探索 and 发现应用到了欧洲的其他语言当中去。其大致

⁸ 在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将中世纪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中世纪早期 (Early Middle Ages)、中世纪中期 (High Middle Ages) 以及中世纪晚期 (Late Middle Ages), 请参照: Daniel Power,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 被后人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一般指代的是中世纪早期。

⁹ Theodor E Mommsen,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Vol. 1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226.

¹⁰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235-238.

¹¹ Deborah Hayde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 Medieval Europ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2017.

过程如下：欧洲各地的拉丁语学习者首先使用拉丁语编写的语法教程，但之后他们发现，由于语言背景的差异，这样的拉丁语教程并不适合当地人使用；随后，他们根据自己学习时遇到的拉丁语难点，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说明，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并理解这些读本，添加了一系列具有当地语言特点的注释；最后，他们发现拉丁语的很多语言以及语法现象和原理是适用于本族语言的，于是开始借助拉丁语的规则，通过适当的修改来描述本族语言¹²。例如，公元 7、8 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了由本地人编纂的拉丁语语法书；有明确记载可循，第一次使用本族语言来描述拉丁语的，是 10 世纪末 11 世纪初，一位名叫阿尔弗里克（Ælfric of Eynsham，约 955-1010）的修士编写的三本拉丁语教程：《拉丁语语法》（*the Grammar*）、《拉丁语会话》（*the Glossary*）以及《拉丁语词汇》（*the Colloquy*），作者在书中加入了许多注释和说明，来解释英语和拉丁语语法的不同（例如：性数的不对等）；最后，他还向读者说明，这两本拉丁语语法教程，也可以用作了解、学习古英语语言语法现象的教科书¹³。

1.4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中世纪末期，随着封闭的封建农业经济逐渐开始解体，市场经济开始起步，欧洲的经济渐渐复苏。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让人们对生活重新抱有了希望。在这个时期，相对守旧的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¹⁴完成了他的《神曲》；在新旧时代价值观冲突之中的彼得拉克完成了《歌集》；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则将焦点集中到了人类，完成了展现人类情感以及理性¹⁵的《十日谈》。以上三部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从中世纪末期以神为主到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将重点放到人的身上的这一进程。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8-1468）在欧洲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及从 15 世纪开

¹²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第 80 页。

¹³ R.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 Routledge, 1997, p.84.

¹⁴ 王军，“对但丁与《神曲》的另一种认识”，《外国文学》，第 6 期，2015，第 43-47 页。

¹⁵ 王军，“薄伽丘和《十日谈》的另一种解读——纪念薄伽丘诞辰七百周年”，2013，《外国文学》，第 4 期，2013，第 25 页。

始的地理大发现¹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大量书籍得以印刷和出版（例如：到 1640 年，仅在英国就印刷出版了超过两万种不同的书籍¹⁷）。《圣经》出现了很多可以在市面上流通的译本，极大地促进了语言的交流，同时终结了教会对书籍和知识的垄断。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通了欧亚以及欧美的航线，引发了殖民热潮，在为殖民者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欧洲与其它地区的语言交流。

另外，在从中世纪 11 世纪开始的两百年内，罗马教廷及其支持者组织了八次十字军东征，借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之名，对中东国家进行了掠夺。但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反而为欧洲与中东地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那些对用希伯来语书写的旧约《圣经》感兴趣，或者视希伯来语为神圣语言的欧洲人，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而对东方感兴趣的欧洲人也开始对阿拉伯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了希伯来语的教本【如德国人罗西林

（Johann Reuchlin, 1455-1522）撰写的《基础希伯来语》（1506,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¹⁶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第 103 页。

¹⁷ A.C. Baugh and T.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outledge, 2001, p.195-196.

第二章 16 世纪：首次来华的耶稣会会士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语言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教会或者基督教本身。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学习希伯来语以及阿拉伯语亦是如此。而中国则是比耶路撒冷以及阿拉伯世界更要向东的国家，尽管马可·波罗曾经在 13 世纪来过中国（对于其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从其所著《马可·波罗行纪》对于中文的寥寥数行的描述看来¹⁸，他尽管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并不太懂汉语。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可·波罗并没有对欧洲人了解中文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但其所著的游记，无论是从学术著作还是大众读物的角度来看，都为欧洲提供了一份新的材料。由于这本游记在中世纪后期的广泛流传，让欧洲人摆脱了中国属于“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的认知¹⁹。

另外一位有文献记载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则是和马可·波罗处于同一时代的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传教士约翰·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他是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先驱者²⁰。受教会的委派，他于 1294 年抵达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活了 34 年，直到病逝。他在中国期间学习了蒙古语，并将《圣经》翻译成了蒙古语，同时还收取了几位中国学徒，让他们学习拉丁语²¹，但我们并没有找到其学习中文的记录，更没有产生相对来说较为持久并且较大规模的影响。直到 17 世纪晚期，大多数欧洲人对中文的理解，只是“遥远东方一种语法怪异文字神奇的语言”。大部分有关中文的知识都被来华传教士“垄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几近 19 世纪。

¹⁸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C. Moule & Paul Pelliot,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1983, p.353.

¹⁹ Christine Gadrat-Ouerfelli, *Knowing the Orient via the Book of Marco Polo and Its Reception in Medieval Occident*, 《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 207-208 页。

²⁰ 董海樱，《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方人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第 32 页。

²¹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 22-23 页。

2.1 利玛窦之前的来华传教士

教会形成相对较大的规模，并且对欧洲与东方文化的交流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教活动开始于 16 世纪初：1517 年第一批方济各会会士到达了印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其它天主教行会的传教士们也陆续来到印度。作为耶稣会第一批会士之一的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1506-1552）于 1541 年抵达印度，并且在那里开始了传教活动。八年后的 1549 年，他来到了日本。这是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东亚国家进行传教。在传教的过程当中，沙勿略发现，日本的文化与欧洲以及中东地区完全不同，社会状况以及思想也与之前去过的国家大相径庭，因此他萌生了学习、了解、掌握当地文字、习俗以及文化的想法，以便顺利地进行传教。这种传教士应该学习对方语言并且适应对方传统习俗的面向东方的传教适应政策，渐渐成为了沙勿略传教的核心思想。而在日本传教期间，由于不断接触并且认识了日本文化和文字，沙勿略萌生了去中国传教的想法。尽管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都在寻找能够进入中国传播福音的方法，但是并没有成功。沙勿略去世后，耶稣会的后辈们继承并且发展了他的适应政策²²。

同样，后辈们也继承了沙勿略想要进入中国传教的想法。但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年当中，都没有获得成功。作为印度教区区长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努内斯·巴莱多神甫（Melchior Nunes Barreto，1519-1571），在其 1555 年来广东处理其它事宜的时候，对于如何进入中国传教进行了一番研究。巴莱多神甫计划派遣一名传教士来到广东学习汉语，随后进入中国。但是由于这名传教士的身体原因，导致了计划的搁置，不过巴莱多神甫为教会带来的研究信息确实发挥了作用。1553 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葡萄牙人进入澳门，首批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居住，1563 年，耶稣会士到达了澳门进行传教工作。并且得益于葡萄牙当局的支持，耶稣会会士们在澳门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以便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

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于 1578 年抵达澳门。当时的澳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社会：除了葡萄牙的商人，也有很多来自中东地区、非洲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修

²²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 59-102 页。

会的成员。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范礼安发现传教布道的效果极差。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皈依的华人信徒必须要起一个葡萄牙的姓名，并且穿上葡萄牙的衣服，遵从葡萄牙的习俗。面对这番景象，范礼安得出了和沙勿略相同的结论，即：如果想在中国传教，就不能采取和西方国家或者中东地区一样的方法，而是要学习对象国的语言以及习俗。于是，范礼安写信给自己的上司，要求增派一名传教士来澳门学习中文，以实现自己和沙勿略得出的适应策略。经过一点小插曲，范礼安的上司最后派了罗明坚来澳门。

罗明坚在收到自己新工作的通知之后，于 1579 年抵达澳门。这时，已经离开澳门去往日本的范礼安给罗明坚留下了相当明确的任务，其中有一条便是学习中国官话。在澳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罗明坚发现大多数内地过来的中国人普遍的教育程度不高，即便是那些成为葡萄牙人翻译的中国人，都没有较好的葡萄牙语以及中文水平。最终，罗明坚决定跟随一名通晓葡萄牙语的艺术家的学习中文。这一时期罗明坚学习的艰辛，体现出了一部双语辞典的重要性²³。随着学习的顺利进行，罗明坚认为，最好能够再有一名耶稣会士来帮助自己。于是，他向范礼安提出，将利玛窦派到澳门协助自己。随后，利玛窦于 1582 年来到了澳门。初来澳门的利玛窦，在罗明坚的带领下，也开始了中文的学习。

1582 年秋，一个很好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广州地区的官员邀请罗明坚到中国内地修建房舍和教堂，于是罗明坚在年底来到了肇庆，并在那里住到了次年三月。1583 年，由于此前在广州的工作颇受赏识，广州总督提出准许罗明坚在中国永居。同年九月，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一起来到肇庆，开始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生活，并且建立了肇庆教区。

1588 年上司要求罗明坚返回意大利的罗马，报告在中国的传教情况。罗明坚请求教皇派遣使臣去与中国皇帝进行交涉，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允许教会的传教工作。由于罗明坚在中国期间的身体状况欠佳，所以这次归国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可以看出罗明坚像一位长者，帮助利玛窦来华、学习汉语、并且让他继承了沙勿略和自己的适应政策，为利玛窦以后在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传教工

²³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言语学导论》，Matteo Ricci & Michele Ruggieri,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85.

作奠定了基础。

2.2 罗明坚、利玛窦和《葡汉辞典》

利玛窦来到澳门之后，得益于罗明坚的帮助，加之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很快就相对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去肇庆开始传教之后，罗明坚在 5 年后返回了意大利，之后再也没有重新回到中国。而利玛窦则作为传教士投身于当地的传教活动；同时，他还担任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以后的很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不仅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也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带入了西方。利玛窦于 1610 年在北京逝世，期间他都再也没有回到过意大利。

利玛窦在华期间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他不仅学会了官话，还能说很多地方的方言，甚至可以用古文进行写作。熟练的汉语，让利玛窦用中文完成了为数众多的著作，内容主要集中在神学和科学方面，一共二十部，并在中国的教徒之间流传²⁴。在他所著的书籍当中，对语言交流影响最大的两本要数与罗明坚一起编纂的《葡汉辞典》以及他独立撰写的《西字奇迹》（1605 年）了。

1934 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1963）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分类编号为：JapSinI, 198 的手稿，共 89 张。手稿前后部分均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笔记，与辞典毫无关系，所以辞典的手稿应该是夹在了其它笔记中间，由罗明坚带回了罗马。根据辞典手稿前后笔记的日期，大致能够推测出《葡汉辞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在 1583 年来到肇庆开始传教之后，在罗明坚于 1588 年返回意大利之前所编纂完成的²⁵。由于利玛窦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相对含糊地提及过在临清与郭居静神父一起合作编纂过一本汉语辞书：

神父们在旅途中没有浪费时间。因为神父们已经在中国传教多年，而同行者中又有精通汉语的钟鸣仁修士，所以大家在一起编写了一份实用的词汇表，把汉语的词汇整理了出来，并进行规范。有了这份词汇表，以后学汉

²⁴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第 31-46 页。

顾保鹄，“利玛窦的中文著述”，《恒毅》，1982，32：5，第 3-6 页。

²⁵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言语学导论》，p.108.

语就可以事半功倍了……汉语中有五个不同的声调，多亏了郭神父的音乐造诣，才把这些声调分清……²⁶

这段文字尽管有些含糊，并没有详细对这本词汇表进行介绍，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找到这本词汇表的原稿或者抄本，但也提供了数个重要的线索。首先，正如有些学者认为²⁷的那样，除了《葡汉辞典》以外，利玛窦很有可能还编纂了另外一本中西文对照辞典²⁸；其次，这里的“旅途中”指代的是第一次进京，想要觐见皇上，却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这份词汇表的编纂时间应该在 1598 年的下半年；第三，利玛窦在 1598 年时的中文水平已经足以支持他完成数部西方书籍的翻译工作，但是在这里他却特意提及“精通汉语的钟鸣仁修士”，这就意味着利玛窦的角色是主持这次编纂工作，而主要进行编纂的人是钟鸣仁

（Sebastian Fernandes，约 1562-约 1621）；第四，利玛窦在这里提及了郭静居神父的音乐修养，是他分清了这五个声调。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在刚到澳门的时候，在写给耶稣会其他神父的信件当中曾经提到过：

……有时两个字之间除了声音按照四种不同的声调有高低之分以外……²⁹

也就是说，刚来到澳门学习中文的利玛窦认为汉语读音的声调只有四种（耶稣会交给利玛窦的任务是学习官话，所以这里的四种声调应该和方言无关）。而本文之后将介绍的利玛窦注音系统，以及深受利玛窦系统影响的其他传教士们的注音体系，大都使用五种声调的注音方法。所以郭静居很可能在利玛窦注音系统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²⁶ 利玛窦 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第 233-234 页。

²⁷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言语学导论》，p.111.

²⁸ 也有一部分学者，比如发现《葡汉辞典》手稿的德礼贤，以及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都认为，在耶稣会档案馆发现的那部《葡汉辞典》便是利玛窦在回忆录当中所提及到的，1598 年前后自己与郭居静和钟鸣仁一起编纂的辞典。

²⁹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利玛窦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第 23 页。

书名	性质	编者	编纂时间	状态	注音系统
《葡汉辞典》	词汇对照集	利玛窦、 罗明坚	1583-1588 年之间	夹杂在了笔记中 间，被德礼贤在耶 稣会档案馆找到	只有注音 没有声调
未知	词汇对照集	利玛窦、 郭居静、 钟鸣仁	1598 年	失传	大概率不 仅有注 音，还附 有声调

表 2-1 《葡汉辞典》与“未知辞典”的对比

上表是对这利玛窦编纂的两本辞典的总结。由于这个词汇表的本子已经完全失传，所以尽管暂时并不能够确定另一本辞典的存在，但是很大概率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本子

另外一本确定存在，并且能够为研究西方人的注音系统提供宝贵资料的著作，是利玛窦在其生命的晚期，即 1605 年左右，独立完成的中文注音读物《西字奇迹》。这本读物共收录了利玛窦的三篇中文文章，文章中文上方则使用了拉丁字母进行注音，从而使这本书成为了一本汉语注音读本。

2.2.1 《葡汉辞典》的主要架构

《葡汉辞典》的架构十分简单，整本书分为三大列，如图 2-1 所示，第一列是按照字母顺序表排列的葡萄牙语列；第三列是与第一列葡萄牙语意义相对应的中文；第二列则是使用拉丁字母对第三列汉语进行注音的注音列。由于并没有对词汇的解释，所以和辞典相比，《葡汉辞典》更像是一套葡萄牙语与中文对应的词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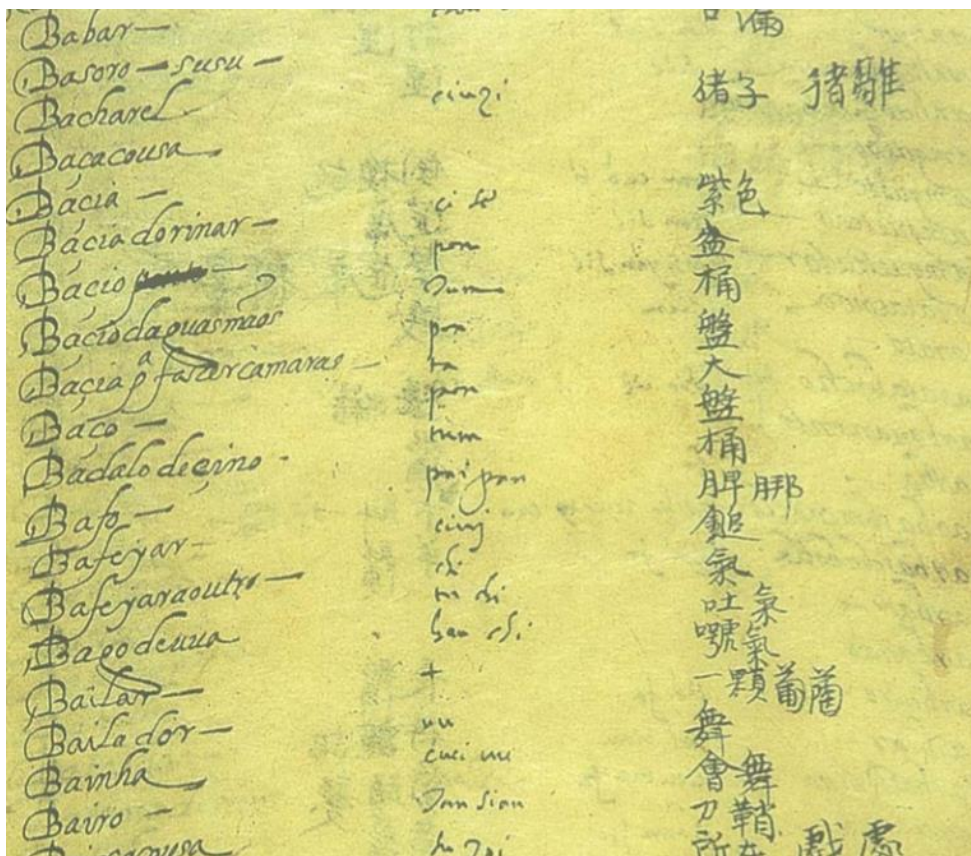


图 2-1 《葡汉辞典》书影

第一列葡萄牙语的选词以及排列：辞典是由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共同编写的，作为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会士，在缺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他们并没有选择使用中国传统的词汇分类方法，而使用了西方常用的字母顺序表排列方式。有学者认为，从第一列的词汇选词来看，可以推测有一部分词条选自卡尔多索（Jerónimo Cardoso，约 1508-1569）所著并且于他去世那年出版的《葡拉辞典》第三版³⁰。罗明坚和利玛窦于 1583 年 9 月再次来到肇庆之后，着手修建教会。建成的鲜花寺下层设有图书馆，所以很可能卡尔多索的《葡拉辞典》就藏于此³¹。并且从葡萄牙语词汇的挑选来看，两人确实上面下过一番功夫，以便使这些词汇更贴近汉语的实际使用。

第三列是第一列葡萄牙语所对应的汉语词条，从书写笔迹来看，基本可以

³⁰ Dieter Messner, "The First Portuguese Bilingual Dictionary Restoring to a Foreign 'Modern' Language – Chinese", *Review of Culture*, No. 34/35 (2nd series), 1998, p.289-291.

³¹ 董海樱，《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方人汉语研究》，第 68 页。

确定是由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所写³²。偶尔会出现外国人增添的笔记。词语以口语单字以及短语为主，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葡萄牙语词条有时不光对应一个中文词条，而能够对应两个甚至更多。从笔迹上来看，很多中文词条对应的葡萄牙语词条，最初都是一条，之后又逐步添加而成。

第二列是使用拉丁字母对中文的发音进行注音。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葡萄牙语词条对应了数个中文词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中文词条是一定有注音的，剩下的几个则或有或无。

作为非主体部分，《葡汉辞典》还有第四列，为意大利语的词条。但这一列只在辞典最初的几页上有。另外，有研究者提出³³，罗明坚和利玛窦编写这本辞典的时候，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墨水：一种是中国墨水，另外一种是中国墨水。由于欧洲墨水含铁量相对较多，所以经过较长时间会褪色并且呈棕红色，在手稿上十分明显，而中国墨水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从手稿看来，第四列的意大利语词条全都是使用欧洲墨水进行书写的，而在其它列当中，也不时会穿插为数不多的、利用欧洲墨水进行书写的词条以及横线。然而，具体到何时使用欧洲墨水以及使用规律，仍然不明确。

2.2.2 《葡汉辞典》的注音系统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者都深刻研究了《葡汉辞典》的注音系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学界认同《葡汉辞典》的注音系统大都为罗明坚所写，所以将其称为“罗明坚系统”³⁴，并且有学者将罗明坚系统整理成了拼合表³⁵。尽管对于罗明坚系统使用的到底是何种西文仍存在着分歧³⁶，但总体而言，《葡汉辞典》采用的是类似中国传统反切法的注音方式：罗明坚系统使用拉丁字母辅音作为声母、元音以及元音的组合作为韵母，将拉丁字母的辅音和元音进行组合，组合出中文汉字的读音。

³²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言语学导论》，2001，p.108.

³³ Matteo Ricci & Michele Ruggieri,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519.

³⁴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言语学导论》，2001，p.112-115.

³⁵ 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67-175页。

³⁶ 杨福绵、尹斌庸认为罗明坚系统采用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综合的正字法注音；日本研究者高田时雄则认为整套系统都基于意大利语。

中国古代使用的注音系统，从直读法，到读若法，再到反切法，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递进关系，可以说是对外族语言以及外国语言注音的必然发展道路。西方人亦是如此。一开始西方人接触的外族语言甚至外国语言全都是表音文字，换句话说，只要掌握了相对简单的读音规律，就能够顺利读出这些语言的发音。因此，当西方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接触到中文这门非表音文字的语言，并编订教科书或是字典时，无疑会构思出一种能够为汉字注音的方法。作为首次编纂外汉辞典，并且首创这种注音系统的罗明坚，为西方人学习汉语发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³⁷。

然而，罗明坚系统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便是之前所提及的，学界仍对罗明坚系统到底采用的是何种西文正音法存在着争议：由于传教士们来自欧洲各国，各个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罗曼语族之间相似度很大，加上拉丁语以及葡萄牙语在教会中的泛用性，使得传教士们经常会使用融合了几种语言的“混合语言”。这使得读者在阅读罗明坚系统的辞典时，不能够确定这种相对有点模糊的读音。另外一个明显的缺陷便是罗明坚系统没有顾及中文声调³⁸。显然，西方语言当中并不存在这一概念。利玛窦最早于 1582 年 8 月份便抵达了澳门，在仅仅学习了五个多月的汉语之后，他于 1583 年 2 月 13 日写信给耶稣会的马尔蒂诺·德·弗尔纳里（Martino Fornari, 1547-1612）神父时提到：

.....这种语言既不像希腊语，也不像德语，而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其词语发音模棱两可，同一个发音会有很多词汇，这些词汇又代表着成千上万的意思。有时两个词之间除了声音按照四声不同的声调有高低之分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差别.....³⁹

也就是说，早在利玛窦到达澳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中文声调的概念。但他尽管意识到了其中有四种不同的音调，却并没有想出更好标注声调的方法，亦或出于一些其它方面的原因，所以并没有对中文声调这一点进行特别的说明

³⁷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刊集》，第一本第三分卷，中华书局，1987，第 268 页。

³⁸ 董海樱，《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方人汉语研究》，第 70、71 页。

³⁹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利玛窦书信集》，第 23 页。

或者标注。之后利玛窦以及金尼阁等后人的注音系统，显然延续了罗明坚系统，并改进了罗明坚系统的一些不足之处。

2.2.3 《葡汉辞典》以后传教士们的注音系统

在罗明坚将《葡汉辞典》带回罗马教会，彻底离开中国之后，利玛窦于1606年前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注音读物《西字奇迹》，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本用拉丁语进行注音的中文读物。正是这本读物标志着利玛窦的注音系统逐渐走向了成熟⁴⁰。当然，笔者在前文也提到过了一本由利玛窦、郭居静以及钟鸣任共同编纂的词汇对照集。按照利玛窦对这本词汇对照集的描述⁴¹，他很有可能已经在郭居静的帮助下，制订出了一套相对罗明坚系统而言更加完善的注音系统，但是由于本子的失传，对此并不能完全确定。

1983年，研究者顾保鹄在梵蒂冈图书馆找到了《西字奇迹》的复印件，其中收录了三篇利玛窦所写，并且使用利玛窦系统⁴²进行注音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是利玛窦于明代万历年间所编纂的《程氏墨苑》四篇文章中的三篇。现在中国学界习惯将收录在《程氏墨苑》的四篇文章统称为《西字奇迹》。

由于《西字奇迹》全文的汉字不超过1200字，不同的汉字数量更是在400字以下，因此无法对利玛窦注音系统进行十分细致的还原。但是，通过这不到400字的注音，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是利玛窦注音系统继承了罗明坚系统，也就是说，利玛窦系统并不是一个从零到一的创造，而是在罗明坚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而成的产物；第二是利玛窦在罗明坚系统上做出的些许改进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玛窦在自己的注音系统中增加了中文的声调。

早在罗明坚尚未从肇庆回到罗马之前，利玛窦在与教会往来的书信当中就已经提及过中文声调的问题，但当时的利玛窦仅仅是意识到了声调的存在，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分类，所以他并没有将声调纳入罗明坚系统之中。但在利玛窦生命晚期所撰写的回忆录当中，他说明自己在“通晓音乐”的郭

⁴⁰ 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方人汉语研究》，第72页。

⁴¹ 利玛窦 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233-234页。

⁴² 为了和《葡汉辞典》的注音系统进行区分，所以称主要由罗明坚完成的注音系统（《葡汉辞典》的系统）为罗明坚系统，而主要由利玛窦完成的注音系统（《西字奇迹》所使用的系统）为利玛窦系统。

居静神父的帮助下，将中文的声调分成了五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以及“入声”。加入了声调的利玛窦系统基本上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拉丁字母中文注音体系，这套体系在西方传教士当中广为流传。尽管以后许多传教士也都创造出了自己的拉丁字母中文注音系统，但他们的系统无一例外都是以利玛窦系统为基础，在此之上进行一些修改或是改进而成。

2.2.4 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注音系统

总体而言，利玛窦系统在加入了声调之后，就变得相对比较完整了。利玛窦之后的很多传教士也创造了自己的注音系统，但基本上都是以利玛窦系统为基础。其中较为著名，并且影响较广的是金尼阁系统。

作为耶稣会法籍传教士的金尼阁，于1611年到达南京，师从郭居静和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6-1640）神父学习中文⁴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郭居静神父在利玛窦的注音系统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后，金尼阁在1613年返回罗马的时候，携带利玛窦回忆录的手稿进行研读和翻译。可以说，金尼阁的汉语观和汉语知识体系，乃至他对中国的认识，都受到了利玛窦的很大影响。

金尼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其1625年开始撰写，1626年于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了。这是一本有关音韵学的著作，共分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介绍本书的音韵系统；第二编《列音韵谱》，采用拉丁语拼音的字母排序，对汉字进行排列；第三编《列边正谱》，采用汉字的笔画部首排列汉字。整本书对于音韵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受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好评⁴⁴。

关于《西儒耳目资》的注音系统，国内外的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充分深入的研究，在这里便不再赘述。总的来说，各位学者都认为金尼阁系统与利玛窦系统差别不大⁴⁵。就连金尼阁自己在《西儒耳目资》的序言当中也说到，自己的注音系统是从利玛窦、郭居静、庞蒂我那里继承过来的⁴⁶。

⁴³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列传及数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第116页。

⁴⁴ 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方人汉语研究》，第81-82页。

⁴⁵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卷，中华书局，1987，275页。而后，陆志伟、李新魁、曾晓渝等学者都再次对其注音系统进行分析，结论均和罗常培相比，没有太大差别。

⁴⁶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213册），齐鲁出版社，

利玛窦 16 世纪末在中国传教的成功，一方面帮助耶稣会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让天主教的各个修会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这片教区的重要性。因此，17 世纪以耶稣会为主的各个天主教修会编纂了许多和中文相关的辞典、注音读物和教材。教材包括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编纂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其手稿版本数量及其丰富，导致成稿时间未知）、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lla lingua mandarina*，1703 年出版）（后文将会详细对这两本教材进行分析说明）等；辞书包括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所编纂的葡萄牙语辞典、叶尊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的《汉字西译》

（*L'interpretazione occidentale delle caratteristiche cinesi*，1694 年编纂完成，1699 年完成第二版）等；读物则数量更多。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多名传教士们编纂的书籍进行了分析⁴⁷，认为，尽管传教士们在创造自己的注音系统时，会根据自己的国籍和母语进行一定的修正，但是都继承了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注音系统。耶稣会基本上沿用了利玛窦系统，而其他的托钵修则会更倾向于沿用金尼阁系统。

2.2.5 总结

十六世纪末，《葡汉词典》使用的是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创造的罗明坚注音系统，这是第一套使用拉丁字母来对中文进行注音的系统，是使用这种方式对汉语进行注音的鼻祖。由于两人当时对汉语声调的研究和理解尚不成熟，故罗明坚系统中没有加入声调。在擅长音乐的郭居静将汉语声调进行细分之后，利玛窦创造了利玛窦系统。至此，使用拉丁字母对汉语进行注音的系统已经相对成熟。随后金尼阁在利玛窦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小幅度的改进。尔后，17 世纪传教士们所使用的所有注音系统几乎都以利玛窦系统或者金尼阁系统为蓝本，并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用拉丁文字对汉语进行注音的注音系统，起源于罗明坚，成熟于利玛窦和金尼阁，在此之后，尽管这样的系统在传教士当中不断传承，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和突破。

1997，第 549 页。

⁴⁷ 董海樱，《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方人汉语研究》，第 109-111 页。

2.3 利玛窦的汉语观

利玛窦人生的最后两年（1608-1610）是在北京度过的，他用意大利语将自己数十年来在中国的经历（从和罗明坚进入中国一直到自己逝世为止）以及所见所闻都记录了下来，并取名为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e Christinita'nell Cina*（耶稣会和基督教来华史）⁴⁸。这本回忆录性质的作品，被誉为是利玛窦最重要的历史著作⁴⁹。法国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S.J., 1577-1628）在将利玛窦的回忆录手稿带回罗马的途中，将其翻译成了拉丁语，并将书名译为了 *De Christiane Expeditione apud Sinas*（基督教传入中国史），于1615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出版，中文译本的书名被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⁵⁰。由于金尼阁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删减以及修改，所以译本在有些地方与利玛窦的手稿相差甚远。所以，如果希望对利玛窦的汉语观进行研究，那么使用利玛窦用意大利语书写的手稿或者其译本会更合适一些。利玛窦的回忆录总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共计一卷，从中国的地理位置、物产、工艺、科学和政府机构，到中国人的礼法、相貌、迷信和宗教派别，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叙述和分析；第二部分是回忆录的主体部分，共计三卷，讲述了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故事，从沙勿略到达澳门，打算进入中国开始，直到利玛窦去世为止；第三部分，共计一卷，对这数十年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成果进行了说明。

另外一份能够体现利玛窦汉语观的文献，是他与耶稣会其他会士的往来信件。以下两个方面表明，这些信件可能比利玛窦的那本回忆录更加客观。首先，利玛窦本人的汉语观随着他汉语学习以及了解中国文化的不断深入，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回忆录当中的说明都是利玛窦本人晚年（1608-1610年左右）的观点，因此，信件中的观点能够体现出时间的阶段性；其次，通过信件和回忆录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现在留存下来的信件，均是利玛窦给西方耶稣会或是家人的信件，这就使得利玛窦在信件当中以向西方人

⁴⁸ 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文铮以及[意]欧梅金。

⁴⁹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言语学导论》，2001，p.104.

⁵⁰ 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译者何高济，王遵仲，李申。在简体中文版出版之前，大陆的研究者基本都使用在台湾翻译出版的繁体中文译本。

介绍中国的各种情况为主，而有关自己各种经历的部分相对较少；相反，在回忆录当中，利玛窦在撰写主体部分的时候，倾向于把耶稣会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一份“冒险记”：伴随着种种挑战、与各种邪恶势力斗智斗勇、同伴的离去、最终在天主的庇护下取得了成功。所以，要研究利玛窦的汉语观，其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手资料。

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但凡对汉语稍作了解，基本就能够看到两种现象：第一，中国各个地方使用不同的方言。但借助于官话以及相同的书写方式，使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进行很好的交流；第二，中文使用的是以拉丁字母为母语的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一种文字。关于这两点，马可·波罗在其游记当中也曾经提及过。他表示中国的方言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一方面书写方式是通用的，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官方的通用语言，所以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是不存在问题的⁵¹。但由于其对于汉语以及语言学的知识十分有限，因此并没有能够深入挖掘或者分析这些。

而利玛窦相对于马可·波罗来说，学习并且掌握了汉语，因此他在汉语观方面比马可·波罗看得更远。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利玛窦刚刚学习中文后不久，他便在与教会往来的信件当中提及过中文的声调系统，除此之外，信中还说了利玛窦早期对于中文当中“字”这一概念的看法：

.....至于他们的文字，可以说每件事物都有其相对应的汉字，相当复杂，也容易混淆。以至于世界上有多少词语，他们便有多少汉字，各不相同.....⁵²

首先，利玛窦对于汉字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汉字是有别于拉丁字母的“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而是对“字”这个概念进行了简短的说明。利玛窦认为，“字”在中文当中即能够直接当作词汇来使用，还可以借此组成词汇或是构成句子，这在西方语言当中并不能够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概念。至此，利玛窦的认知是正确的，并且推进了西方对于中文的认识。可是，当他说到“世上有多少词语，就有多少汉字”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起来。从上古汉语当中，就能够找出一系列难

⁵¹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353.

⁵²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利玛窦书信集》，第 37 页。

以拆分的双音节词⁵³，由此看来，利玛窦的这一说法稍欠妥当。

在熟练掌握中文官话和多种方言之后，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中国的科学以及学位制度的时候，特意对汉字进行了再一次的说明。总体上来说，利玛窦学习了那么多年的汉语，并且在中国生活了如此长的时间，但他的汉语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变化，只是深入了对汉字和汉语的理解。首先，就“形”来说，利玛窦认为汉字类似于埃及的象形文字；其次，利玛窦认为，在汉语中“词”和“字”的概念是完全对等的，上文已经说到这样的认知稍显片面；再者，利玛窦认为“汉字的数量应该处于不到七至八万这个数量级，常用的字在一万出头”⁵⁴。由于在中国历史上收录汉字最多的两本辞书是收录 53525 字的《集韵》⁵⁵以及收录 47085 字的《康熙字典》⁵⁶，都距利玛窦记载相差较远，故利玛窦在回忆录记载的关于汉字数量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他自己推测的结果。还有，就是关于汉字声调的问题了，在熟练掌握汉语并与郭居静神父交流之后，利玛窦也同意了五个声调的说法。

接下来，则是关于汉字的优点。利玛窦在初到中国之时，便惊讶于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异性居然如此之大，并认为这种差异性如果放在欧洲一定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更令利玛窦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文字居然是统一的，并且还存在着官话来统一口语的发音。利玛窦在晚年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相对客观的叙述，他认为这是由汉字的文字形式所带来的一项非常显著的优点：能够让不同语言的使用者理解同一个字、同一句话甚至是同一篇文章和同一本书⁵⁷。不光在中国本土，朝鲜、越南、琉球以及日本也使用汉字，这就使得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差异很大，但人们能够通过书写文字来进行交流。

另外一点，利玛窦在回忆录当中提及：

.....他们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相当大，没有一本书是以语文体写的，即

⁵³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第 138 页。

⁵⁴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 20、21 页。

⁵⁵ 赵继，《〈集韵〉究竟收多少字》，《辞书研究》1 期，1986，第 88 页。

⁵⁶ 苏嘉，《康熙字典》，出版史料，2008，1-1。

⁵⁷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 21 页。

便是有人用接近语文体的文字写东西，也难登大雅之堂，不被重视……⁵⁸

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以及书信集当中，不只一次提到，在中国，将想要说的话付诸于书面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一方面，在与官府进行沟通的时候，需要出较高的价钱来找专人来撰写递交给官府的报告；另一方面，在传教方面，中国人比起演讲更加相信书籍。

通过上述的种种证据我们可以看出，利玛窦的汉语观，相对于不太熟悉汉语的马可·波罗来说，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这种进步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于汉字，利玛窦不再局限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而开始探究中文的词法，尽管就结果来说，尚存在一些含糊或者不合理的地方，但这却是西方人对于汉语认识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在罗明坚的带领下和郭居静的帮助下，利玛窦终于利用拉丁字母归纳总结出了中文的发音体系，并将其付诸于书面，传承了下去；最后，利玛窦发现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区别，并且知道中国人经常会把书籍当作是权威。

当然，除了他的回忆录以及书信集，我们也能够从他编纂的书籍当中提炼出他的汉语观。当遇到一门全新的语言时，人类几乎会趋近本能地尝试用自己的母语来对其进行解释。在这些早期耶稣会会士来华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学习汉字的意思以及其读法成为了重中之重，所以利玛窦所编纂的两本汉语教学书籍可以说是从训诂和音韵两方面入手来解释汉语这门语言的。然而遗憾的是，利玛窦的《葡汉辞典》以及《西字奇迹》更像是一本工具书和一本读本，并没有系统深入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分析和剖析。

至此为止，抛开那些稍显不合理的观点，利玛窦还有两个完全没有涉及的方面。

首先是汉语的语法：无论是在书信集还是回忆录当中，利玛窦都鲜有提及汉语语法。固然，我们也可以将那些碎片式的对于汉语语言构成的思考看作是利玛窦对于汉语语法的认识，但这并没有形成任何系统的认识和分析，而只是将大量的精力以及篇幅放在了“字”和“发音”上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

⁵⁸ 同上。

为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途径都是直接来到中国，在老神父的带领下，在中文的大语境下进行学习。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目的只是利用汉语来进行传教。这就导致了早期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基本上没有对汉语语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本中西文辞典比一本汉语语法书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是对汉语知识的普及工作。马可·波罗游记的读者主要是欧洲的一般民众，通过他的游记，欧洲人知道了东方有个神奇的国度，他们说着一门神奇的语言。利玛窦尽管相比马可·波罗，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更深入，但是却把这份资源交到了耶稣会的手里：只有那些真正来到中国参与传教工作的耶稣会成员才有机会在老神父的带领下学习中文；无论是利玛窦的书信，还是他最后的回忆录，其流通范围都限定在了耶稣会内部（其中只有少部分信件是寄给自己父母的），甚至都没有传播到其它天主教修会那里。罗明坚、利玛窦编写的《葡汉辞典》的手稿被罗明坚带回耶稣会封存，而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到意大利，他所有的著作全都留在了中国。就连能够体现出利玛窦注音系统的《西字奇迹》，也只是给中国学者留下了宝贵的音韵学研究资料。

利玛窦除了对西方人的汉语研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之外，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并且为之后的中外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利玛窦之后，大量的欧洲传教士来华，这表明仅从文化交流的层面上来说，利玛窦进入中国所选择的“合儒”策略是十分精准并且合适的⁵⁹。也就是说，尽管利玛窦的目的是为西方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铺设道路，但其最终的结果却直接敲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这无疑间接推动了欧洲人对于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研究。

⁵⁹ 尽管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利玛窦的这种方式确实有损天主教教义的纯洁性。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会在第二部说到礼仪之争的时候详细叙述。

第三章 17 世纪：西方人的汉语语法教材

上文曾经提及，早在古希腊时期，欧洲便已经出现了有关语言语法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欧洲人对于语言研究的基调。但由于缺少素材，只能在欧洲的屈折语之间进行相互研究和比较。而到了 16 世纪，随着利玛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教区，欧洲和中国之间终于产生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语言文化交流。利玛窦为耶稣会敲开了中国的国门；金尼阁完善了利玛窦的注音系统并从语音学的角度研究了汉语；但是由于耶稣会本身对于使用书籍来进行语法教学、或是通过书本自学汉语的需求并不迫切，所以迟迟没有开展对汉语语法的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产生一本相对来说比较成体系的语法书。这个分析研究整理汉语语法，并将其撰写成书的艰巨任务，最后由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完成了。

其实，卫匡国并不是第一个撰写汉语语法书籍的西方人。根据多明我会的史籍《多明我会中国传教史 第五卷》的记载⁶⁰，早在十六世纪末，该会的会士胡安·科伯（Juan Cobo，生年不详-死于 1592-1593 年间）就已经编写出了一本名为《中文语法》的中文语法书。随后，在 1640-1641 年左右，同一修会的会士弗朗西斯科·迪亚兹（Francisco Diaz，1606-1646）也撰写了一本汉语官话语法书，然而却没有史料记载这本语法教科书的书名⁶¹。从中可以看出，最早的汉语语法书基本都是由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编纂的，其中很多人并没有来过中国，而是在菲律宾华人的帮助下进行的编纂工作。

卫匡国所编写的这本汉语官话语法书《中国文法》虽然并不是第一本，但却是目前为止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汉语官话语法书。上文提到的多明我会的语法书，有点像利玛窦的《汉葡词典》：只有回忆录当中的一段记录，却并没有本子

⁶⁰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 Juan Bravo, 1964-1966, p.42.

⁶¹ 同上。

保留下来。科伯的语法书也并未出版，此外，也没有人发现这本书留存的本子，有的只是多明我会的简单介绍；迪亚兹的语法书不要说是本子了，甚至连书名都不明确。所以本章将不对这两本书进行细致的讨论。

3.1 卫匡国与《中国文法》

耶稣会会士完成的第一本中文语法书是由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会士卫匡国用拉丁语撰写而成的。这也是现存的第一部面向西方人的中文官话语法教科书。

卫匡国出生于意大利特伦蒂诺（Trentino）的特伦托（Trento），在罗马学校肄业后随吉尔切（Kircher）神父学习数学⁶²。1640 年与耶稣会的同伴一起前往印度，1643 年来到中国。由于当时正值崇祯治乱的晚期，内忧外患：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发、满人入关……但所幸的是，清军并没有反对或者限制西方传教士的活动。

由于礼仪之争的不断发酵，为了避免矛盾的继续僵持或者升级，罗马教廷召回了多位在华传教士，并让其陈述原委。卫匡国于 1654 年抵达罗马并递交给教廷的报告《中国基督徒人数与素质简况》（*Brevis relation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apud Sinae*, 1654），让他也成为了礼仪之争早期的关键人物。教会经过讨论，于 1656 年颁布圣谕，允许中国礼仪⁶³。随后，卫匡国回到中国，并于 1658 年抵达杭州，三年之后，也就是 1661 年的夏天去世。

卫匡国一生的著作和译著存世的共计十余部，其中三部不仅出版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分别是：1. 两卷本的《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于 1655 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书中勘测并且绘制了 17 幅中国各个省份的地图，并附上了 171 页的说明，阐述了中国各省的情况。可以说，这是当时最权威的地理图志，被翻译成了许多国家的语言；2. 《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a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rema Asia, S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gestas Complexa*），1658 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最为古老的历史。在冯秉正（Joseph-Francois—

⁶²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261 页。

⁶³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始末，笔者将在第二部当中详细阐述。

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1730 年完成的巨著《中国通史》(HISTORI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出版之前, 可以说卫匡国的这本《中国上古史》在西方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3. 《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1654 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出版。此书记录了鞑靼人占领中国的战争以及他们的习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在欧洲各国出版⁶⁴。

除去上述的这三部“大部头”作品, 卫匡国还有一份不断修订的手稿, 那就是《中国文法》。卫匡国曾在旅途中不断修订自己的这份手稿, 但直到他去世, 这份手稿也没有得以出版。关于其没能出版的缘由, 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作者本人认为这份手稿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 尚需修订; 抑或是手稿中的汉字使得没有印刷商敢于接下这份工作⁶⁵; 或者也有可能作者编写这份手稿只是为了自用, 压根没有出版的打算⁶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学术界都认为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本出版的汉语语法书, 但最近有学者发现其实《中国文法》早在《华语官话语法》之前就悄无声息地出版过了。⁶⁷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找到《中国文法》的原本, 也就是说卫匡国的原始手稿很有可能已经遗失。这本书之所以没有失传, 是因为作者在上文提及的 1650 年左右返回罗马的旅途中, 将一些抄本赠送给了欧洲的学者。有记载的有:

.....卫匡国旅行欧洲时, 曾以所撰《中国文法》赠戈林斯 (Golins) ⁶⁸.....

这里的“戈林斯”应该是指荷兰莱顿大学的数学家兼东方学学者雅各布斯·格利乌斯 (Jacobus Golius, 1596-1667)。此人精通阿拉伯语, 尽管不懂中文, 但是对于这门语言很感兴趣。在卫匡国途径荷兰莱顿和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时候, 格利

⁶⁴ [法]费赖之 著, 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第 264-265 页。

⁶⁵ 姚小平,《西方语法理论与中国语言事实的初始遭遇》, [意]卫匡国著, 白佐良, 白桦译,《中国文法》, 第 14 页。

⁶⁶ [意]白佐良, 导言部分, [意]卫匡国著, 白佐良, 白桦 译,《中国文法》, 第 46 页。

⁶⁷ 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们都认为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本出版的西方人所编纂的汉语语法书。但是在 2013 年, 帕特尔尼科 (Luisa Maria Paternico) 收录在《鲁汶中国学研究 24 卷》(*Leuven Chinese Studies 24*) 的最新研究表明, 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曾在法国东方学家特维诺 (Mélchisedec Thévenot, 1620-1692) 的著作《有关各种神奇的旅行》(*Relations des divers voyages curieux*) 一书中刊登, 故《中国文法》才是现存最早出版的西方人所著的汉语语法书。

⁶⁸ [法]费赖之 著, 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第 266 页。

乌斯都见到了卫匡国，并且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卫匡国不仅认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和手稿给格利乌斯，其中便包含《中国文法》的手稿。

意大利学者白佐良（Bertuccioli Giuliano，1923-2001）在欧洲范围内找到并且研究了大量的《中国文法》的抄本，他发现，欧洲的大部分抄本的“母本”都有比较大的可能是卫匡国在 1653 年送给格利乌斯的那本⁶⁹。尽管这个研究结果可能令人感到有一些意外，但是作为耶稣会会士的卫匡国所编纂的全世界第一本面向西方人的汉语语法书《中国文法》，并没有在修会里产生很大影响，反而在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学者们之间广为传阅。在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一书出版之前，卫匡国的《中国文法》也是欧洲人学习中文时唯一的参考书。

由于《中国文法》的抄本相当之多，其传承关系也错综复杂⁷⁰。为了不在版本上纠结过多篇幅，笔者接下来采用《中国文法》版本研究专家白佐良整理的 26 页手稿进行分析。

3.1.1 白佐良整理版本《中国文法》的内容

《中国文法》总体分为三大章，第一章分为三个小节，主要讲解“字”的发音；第二章也分三个小节，讨论动词、名词的变格变位以及代词；最后一章有七个小节，对前文没有提到的语法现象一一进行说明。接下来笔者将对这本《中国文法》的教授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借此提炼出卫匡国当时的汉语观。

（1）《中国文法》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Vocum Sinensium Numerus”（关于中国字的数量）是讲解汉语发音的。在教学的一开始，卫匡国便提到了“Sunt Voces Omnes Monosyllabae et Indeclinabiles Nec Excedunt Omnes Numero³¹⁸”，也就是说，所

⁶⁹ [意]白佐良，导言部分，[意]卫匡国著，白佐良，白桦 译，《中国文法》，第 48 页。

⁷⁰ 现在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任教的意大利学者陆商隐（Luisa Maria Paternicò）以及白佐良均在 2011 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法》前言和序当中对《中国文法》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研究。

有字的发音都是单音节并且不能屈折的，全部的发音加起来不超过 318 个。从上面这句话，可以提炼出两个关键点，即卫匡国认为汉字具有单音节性和不可屈折性。首先，关于单音节性，卫匡国对于汉字单音节特性的认知和上文提及的利玛窦的认识有一定的区别：利玛窦强调了汉语中的“字”，涵盖了西方概念的“字母”和“词”两个概念。当然，这种认知整体方向是对的，但是稍有不妥之处；而卫匡国则没有对“字”本身的概念进行说明，只是提及所有的“字”的发音，全都是单音节的，这样的说明方式不如利玛窦来的深入，但是反而更加严谨了一点。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卫匡国提到了利玛窦从没有提及过的一点，即汉语是没有屈折变化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卫匡国之前的传教士们应该早就已经意识到汉语没有屈折这个事实，只是并没有人清晰明了地将之指出来。

卫匡国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汉语“字”的发音共计 318 种，并将其在第一节一一列举了出来。其中列举的汉字达到了 320 个，去掉一个重复的以及一个只标注发音却没有标注汉字的，一共 318 个⁷¹。列举的汉字使用卫匡国的拼音系统进行注音，并且按照拉丁字母注音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序。白佐良认为卫匡国在编写这一部分时，参考了葡萄牙籍多明我会的弗朗西斯科·迪亚兹所编著的《汉西字汇》（*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tion Castellana*）⁷²。有学者指出，《汉西字汇》当中的注音系统是从金尼阁系统稍作改进而来⁷³。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金尼阁在利玛窦的基础上改进了其注音体系之后，传教士所使用的系统都与利玛窦系统或者金尼阁系统其中的一个十分相似，在此基础上并没有很大的突破。

书中第一章的第二节，标题是“词条首先以拉丁语的发音注音”（*Harum Vocum Prima Juxta Latinos Explicatio*），这一节的内容则是将发音当中所有不按拉丁语注音的音节挑选出来，进行特别的说明。比如，“如果字母‘c’在‘i’或者‘e’前面时，‘ci’和‘ci’按西班牙语发音”、“‘g’在‘i’或者‘e’前面的话，‘ge’和‘gi’按意

⁷¹ [意]卫匡国著，白佐良，白桦 译，《中国文法》，第 102 页

⁷² 同上，第 17 页。

⁷³ Federico Masini, Chinese Dictionaries Prepar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Encounter and Dialogu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Beijing, 2001, p.358.

大利语的发音方式发音”，诸如此类的解释。单独列出来的第一章第二节，看似用处并不是很大，但是却解决了一个从罗明坚开始便遗留下来、在之后的很多中-西文词典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这本书当中的注音系统究竟采用的是何种西文正音法？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欧洲语言的相似程度很高，尤其是罗曼语族，加之各个天主教修会当中有着许多不同国籍的传教士，致使了他们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又有可能使用作为教会官方语言的拉丁语，以及很多与自己母语相近的语言。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所标注的发音有些暧昧不清。《中国文法》当中，卫匡国很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正音法使用的是拉丁语，同时又将其中不符合规则的读音一一列出，使得这本教材的注音体系更加严谨。

卫匡国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向读者讲解了汉语声调。中国的音韵学家很早就已经区分出了汉语的五种不同声调（清、浊、上、去、入），之后，在郭居静神父和利玛窦的协作下，用符号标注了这五种声调。这套已经较为成熟的体系，并没有值得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利玛窦系统一直传承了下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章第一节最后，卫匡国提到了一句：“如果按照 5 个声调发音的话，发音数目就会变成 1179 个”。这是继葡萄牙籍耶稣会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在《大中国志》⁷⁴第六章“他们的语言文字”当中⁷⁵，首次提及中文的发音数量问题以后，再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曾德昭估计的中文发音总数为 1228 个，相比卫匡国的 1179，相差了 49 个，考虑到两人都是大致推测出的中文发音，所以不到 50 个的数量差距可以说是相差不多。

（2）《中国文法》第二章

从书中的第二章开始，卫匡国开始讲述汉语语法。作为第一本使用拉丁语书写的汉语官话语法书，作者整理并且说明了一些在利玛窦时代完全没有提及，或者尽管提及却没有整理成体系的语法现象。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卫匡

⁷⁴ 此书版本众多，《大中国志》的标题是意大利语译本标题（*Rea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的翻译。最早 1642 年在里斯本出版的葡萄牙语原本题为《中华帝国和耶稣会会士的传教工作》（*Breve recompilação dos princípios, continuação e estado da Cristandade da China*），但是葡萄牙语版本是一份相对残缺的手稿；次年在葡萄牙的历史学家发现这本书的完整手稿之后，在西班牙再次出版。随后又被译成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⁷⁵ [葡]曾德昭 著，何高济 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 39 页。

国在第二章第一节“名词及其变格”开始时提到的，“根据所处位置的不同，汉语同一个单词可以作为名词、形容词或副词使用”⁷⁶。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本《中国语法》中，作者已经开始意识到，相较于西方大多数语言来说，汉语并不存在屈折变化，并提出了解决这种不使用屈折改变词义或者是词性的方法：改变语序。

卫匡国在第二章第一节便举例说明，汉语当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界限相对模糊，通过改变词语的位置能够改变词的词性。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词语之间的性质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转换。比如“Amo”为“我爱”之意，卫匡国认为“我爱”既可以当作动词使用，也可以当作名词来用；相反，有着“我去”之意的“Abeo”，就只能当作动词却不能变成名词。随后，卫匡国通过实例说明了汉语通过改变词序来实现西方屈折语的名词变格。首先，卫匡国解释了汉语当中通常在名词后面加“们”一字，让名词来变成复数。此外，在这本教材当中并没有将拉丁语名词的六种变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夺格）一一进行梳理和说明，而是仅用几个例子来对属格进行了解释，对其他的变格并没有特别提及。在进行语法说明的时候，卫匡国使用了一些比较具有天主教修会特色的词语，比如“Hominis Bonitas”（“人的好”）以及“Societas Jesu”（“耶稣会”）等等。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最后，卫匡国说了一句“item facit ex nominibus adiectiva uti cum verbis facit praeteritum passivum”，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并不是很好理解：“把名词变成形容词和把动词变成被动过去时一样”，结合作者在第二章第三节“动词的变位”当中提到的，“（汉语当中）的过去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抑或是祈愿式，都只需要在‘了’的前面加上‘过’即可”。由此看来，尽管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说明，但是作者在这里的意图是想向读者解释，汉语当中除了改变语序来实现西方语言当中的变格变位，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便是像黏着语一样，在词语当中插进一些小词。

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作者对汉语当中的代词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在代词方面，欧洲语言和汉语之间相似度较高，基本上每个单词（说法）都能够找到对应的释义。所以在代词这一方面，并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

第二章的第三节用来讲解动词变位。动词变位和名词变格一样，可以说是

⁷⁶ [意]卫匡国著，白佐良，白桦 译，《中国文法》，第109页。

欧洲屈折语的特色。在此，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卫匡国提出了在动词前后增加小词来达到动词时态语态变更的目的。例如：在动词后面加上“了”就能让动词变成过去时；在动词前面加上“将”就可以让动词变成将来时；加上“巴不得”使得动词变成祈愿式；加入“那时间”这样的时间副词，让动词变为未完成过去时；加上助词“被”让动词变为被动。值得一提的是，卫匡国在教材当中特别提到了“祈愿式”（Optative Mood），这种形式在拉丁语当中并不常见，相反，在古希腊语当中使用频繁。作者为何会在一本用拉丁语编写的中文教材当中提起祈愿式这种在拉丁语当中并不常见的语法，原因尚不明了。总的来说，动词的各种时态和语态可能是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差异最明显的地方，所以有学者认为早期西方的汉语语法教材在语法方面都变成了书中的薄弱环节⁷⁷。

（3）《中国文法》第三章

《中国文法》的第三章分七个小节，继续探讨第二章没有涉及的语法。分别讨论了：前置词、副词、感叹词、不常用的连词、名词原级比较级最高级、代词附录、数词以及小品词。可以看出，第二章的语法部分比较“大”，涉及一种语言最重要的名词动词代词；而相较于第二章，第三章则都是一些相对细小并且零散的语法现象。

作者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前置词。前置词本身在西方各种语言当中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相较于较少使用前置词的拉丁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的前置词显得复杂得多。罗曼语系自身的语言之间，前置词的用法就已经有这样大的差别了，更不用说汉语和西文了。但是卫匡国在编纂这一小节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将“前”、“后”、“上”、“下”四个在汉语当中并不能够当作前置词使用的方位词当作前置词来进行讲解，得出了“汉语的前置词既可以作为前置词放在词语前面，又可以作为后置词放在后面”（*Quae et Praepositiones et postpositiones esse possunt*）这种说法。也就是说，笔者认为这时卫匡国已经意识到汉语前置词和西文前置词的用法有相当大的区别，并且也认为单纯将“上下前后”归类到前置词有失偏颇，所以才加上了“前置词既可以当前置词又可以当后置词”的说法。卫匡国并没有意识到或

⁷⁷ 姚小平，序三，[意]卫匡国著，白佐良，白桦 译，《中国文法》，第 19 页。

许可以不将这四个字归类到前置词，而是将其单独分类（成方位词）进行说明和讲解，而是将真正的前置词和他认为是前置词的方位词都归成了前置词。

第三章第二节讲解汉语中的副词。卫匡国将副词精细地分成了二十余类，占据了相当的篇幅。的确，汉语副词尽管从功能上来说并不复杂，但是用法却丰富多彩。因此，学者们对于副词研究的争议一直不断⁷⁸。学界相对认可的副词分类方法是 2000 年张谊生所归纳整理的副词分类，他将汉语副词分割成了 10 类，分别为：描摹性副词、评注性副词、关联性副词、否定副词、时间副词、频率副词、程度副词、范围副词、协同副词以及重复副词⁷⁹。反观卫匡国《中国文法》当中将副词分为 20 多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有很多可以归在一类的副词，卫匡国却将它们放在了好几个不同的目录下。比如表示频率的副词，卫匡国将“一次”、“两次”以及“三四”、“常常”这两组表示频率的副词分成了两类。第二则是把有一些并不是汉语副词的词语归类到了副词当中，如书中的“Respondendi”（回答）部分，有“是”（Ita Est）这个表示肯定的回复。一般来说，如果表示的是肯定的程度，那么可以作为副词使用，但是肯定本身并不能成为副词。而且，卫匡国尽管囊括了 20 多类副词，但是依旧有一些没有涵盖的内容。

第三章第三节，作者专门用一节讲解汉语中的感叹词。相比于前两节，这一节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对感叹词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在西方语言当中的感叹词（拉丁语：interiectiones）的概念，和汉语基本上差别不大。卫匡国将这一小节分成了五个部分，分别是：“气愤或者责备（Indignantis aut exprobatantis）”、“对事物没有特点的感叹（Quem tamen characterem non habent）”、“痛苦（Dolentis）”、“欣赏（Admirantis）”以及“表示惊叹（Exclamantis）”。其实从这些部分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不管从汉语还是从拉丁语的角度来看，“感叹词”和“表示惊叹”这两者的概念十分相似。从这几个部分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痛苦”、“欣赏”部分当中的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感叹词：比如，“苦”、“可怜”、“奇”这样的词，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些词应该属于名词或者形容词，而非感叹词的范畴；同样，根据拉丁语部分的释

⁷⁸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和分类”，《语言研究》（01），2000，第 51 页。

⁷⁹ 同上，第 62 页。

义，也基本都是使用的形容词以及名词。只有在最后一部分“表示惊叹”当中，才出现了汉语和西文当中真正表达感叹的词语。所以在这一小节当中，从解释当中可以看出来，卫匡国对于汉语的叹词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另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小节有五个部分的标题，但是前两个标题下面并没有任何内容。至于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前两部分空有标题没有内容，就不得而知了。鉴于这本语法书最终未付梓的理由有可能是因为作者对其的完成度并不满意，所以笔者猜测这里有可能是卫匡国列出了标题，想在其中添加内容，可是由于自己汉语知识受限或者其它原因导致最终未能如愿。

第四节，作者介绍了汉语当中不常用的连词。卫匡国将这一系列的连词分成了四个部分，分别为“连接用连词（*Copulativae sunt*）”、“语尾助词（*Particulae Terminativae*）”、“选择连接词（*Disjunctiva est*）”以及“转折词（*Adversative*）”。在这里，卫匡国表示，这些连词的不常用是指（不经常在口语中出现，却）经常出现在文言文当中。在这一部分当中，“连接用连词”和“转折词”两部分，汉语和西方语言无论是从观念上来说，还是使用方法上来讲，都差别不大。唯一有些区别的可能就是在汉语当中，表达相同含义的连接词比拉丁语要多很多。比如表达连接用连词的时候，相对于拉丁语的“*Et*”、“*Vel*”以及“*Etiam*”来说，汉语的“及”、“亦”、“而”、“又”、“及”就显得更加丰富一些。而不同于这两部分，“语尾助词”以及“转折词”可以分析的地方就多了很多。首先是“语尾助词”，西方语言当中并没有使用词语来“止句”的习惯，然而卫匡国发现了中国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很喜欢用“也”和“矣”来结句。固然，将“语尾助词”归类到连词当中并不是十分合适，但是这给后期汉学家语言学家们让其单独成类打下了基础⁸⁰。在这一节当中，作者还用了一小部分来介绍“选择连接词”这个概念。首先，这一部分的定义其实非常模糊，作者给出的实例也只有一个“亦不”，拉丁语原文则是“*Etiam Non*”，即两个汉字的直译。而原本标题的“*Disjunctiva est*”当中的“*Disjunctiva*”应该是指代的语言的一种逻辑关系：两者是互斥的，只能有一个为真。比如“汤姆今天出门还是在家？”这样二选一，只能有一个为真的互斥概念的逻辑选择，指代的就是“*Disjunctiva est*”。然而无论是从拉丁语的“*Etiam Non*”还是汉语的“亦不”，比起标题本身的选择连接词，反而

⁸⁰ 姚小平，序三，[意]卫匡国著，白佐良，白桦译，《中国文法》，第20页。

更像是否定两者的连接词。如果只是汉语方面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那么有可能是卫匡国汉语水平受限所致。但是拉丁语部分也尚未能与标题对应上，所以并不能够确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第三章第五节讲述的是名词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这一小节的标题十分奇怪：首先，名词原级（*De Nominibus Positivis*）就很难理解；其次，无论是汉语还是拉丁语，名词都没有比较级以及最高级一说，在西方语言当中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应该为形容词。卫匡国在第二章讲解名词的时候，曾经提及过，在很多情况下，汉语的名词能够变成形容词，但是如果是不能变成形容词的名词，后面常常需要加“子”。在这里名词的原级指代的应该是“子”之前的名词的本质，例如“房子”的“房”就是原级、“果子”的“果”也是原级。之后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则是使用名词变成的形容词，加上一些能够体现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语，如“更”、“过”、“多”；“绝”、“紧”，使形容词变成比较级和最高级。在这里，卫匡国在用拉丁语解释汉语的时候，使用的基本都是形容词。然而这一节的标题却冠以名词。所以笔者推测，作者很可能是想试着利用汉语的逻辑来解释这些语法。尽管最终效果值得商榷，但是作为 17 世纪的最初的汉语语法书，这种尝试绝对是值得认可的。

第三章第六节的代词的附录，与第二章第一节讲解名词代词的内容重复，可以作为第二章第一节内容实例的补充，除此之外并无新增内容。

第三章第七节，也是整本书最后的一部分，作者讲解了汉语的数词和数量词。西方的大多数语言和汉语采用的都是十进制，同时排列顺序也是从大到小的排列，所以差别不大。作者在此也就用相对简单的篇幅来简单叙述讲解了一下汉语的数词。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的数量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固然，西方语言当中也有数量词，但是其数量和汉语相较着实小巫见大巫。所以很多传教士在编纂教材或者字典时，都会花费很大的篇幅来说明讲解这个问题。如 1620 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在菲律宾马尼拉编纂的汉语方言语法教学书《潮州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作者就花了整本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数词和数量词上；方济各会会士叶尊孝所编词典《字汇腊丁略解》

（*Dictionarium Sinico – Latinum Brevis Explicatio*）的附录有一份量词表；卫匡国的这本《中国文法》也用了从第 20 页中间开始，一直到手稿结束的 26 页，如

此长的篇幅来介绍说明数量词。

3.1.2 《中国文法》的影响和贡献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卫匡国《中国文法》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首先是这本教材对欧洲人认识汉语的影响，其次是这本教材对于欧洲语言研究发展的贡献。

关于第一点，《中国文法》作为现存被发掘出来的第一本汉语官话的中文语法书，其地位和影响理应是巨大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令人疑惑的是，与之前诞生的一些方言语法书不同，《中国文法》所教授的是汉语官话的内容，无论是在修会还是在欧洲的学者圈中理应都是受欢迎的读物，然而其抄本却十分罕见。笔者对这件事所得出的结论是：原因或许在于卫匡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而他却不务正业，编纂出了一本汉语语法书。由于学习汉语策略的影响，语法书在耶稣会内部并没有什么市场；而在中国礼仪之争已经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其它修会和耶稣会的矛盾也愈演愈烈，比较难以想象这样一本由耶稣会会士编纂的语法教材会在其它修会内部流传。然而，有趣的是，相对于修会内部，《中国文法》反而更受北欧学者们的欢迎。得益于这本汉语教材，很多对亚洲语言感兴趣的学者第一次了解到了汉语这门语言。这本教材的观点更是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汉学家巴耶（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他在其著作《中文大观：中国汉语文字诠释》（*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当中体现了卫匡国《中国文法》的观点和思想⁸¹。

关于第二点，截止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找到其他任何早于《中国文法》的现存的汉语官话语法教材。继利玛窦和罗明坚的《葡汉词典》之后，很多传教士编纂过词典，但是（有留下详细证据的）编写汉语官话语法教材还是第一次。马可·波罗在他的那本游记中，就表达了他对于汉语的些许看法；到了利玛窦时代，利玛窦加深了对汉语的理解，完善了前辈的汉语注音体系，也逐渐开始分辨出些许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区别之处，但是尚未形成体系；利玛窦之后的

⁸¹ 内田慶市、“T.S.Bayer（1694-1738）の Museum Sinicum（1730）に関する覚え書き”、「近代において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

耶稣会传教士们，几乎一直都在沿着利玛窦的道路继续前行：完善注音系统、编纂更全的词典。直到卫匡国，他在《中国文法》当中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归纳总结了前人对于汉语的认识，并且将从古希腊时代便出现的欧洲语言学规则套用到了汉语上面。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卫匡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汉语语法相较于西方语言来说几个十分重要的点：第一，汉语的字是不能够屈折的；第二，汉语当中一个词（字）的词性并不固定；第三，汉语实现屈折以及改变词性的方式是改变词序或者使用小词。在之后的大约 200 年的时间内，研究汉语的传教士们在描述汉语与西方语言不同的时候，基本都会将重点放在以上几点。在最早的得以流传下来的西方人编纂的汉语语法书当中，就能看到这种对于中西语言差距一针见血的观点，着实具有十足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尽管卫匡国发现了欧洲语言与汉语之间几个十分重要的不同点，但却依旧试图采用欧洲语言框架来套用和总结汉语。作者确实意识到了在某些方面，汉语和欧洲语言之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但是他发现的只不过是有些语言现象似乎并没有办法一对一对等，而并没有像之后的马若瑟、马士曼等人发现几乎整套欧洲语言框架都不能套用到汉语上来，所以卫匡国只是将一些西文不存在的汉语语法现象生硬地归到了不太属于自己的分类之中。这就导致了这本语法书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欠缺和不合理的地方。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卫匡国的这本书很大概率是他对自己学习汉语时所作的笔记的整理。一方面受限于他的汉语知识，另一方面受限于作者没有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雕琢这部作品，因此无论是系统性还是丰富性，这本书都有着极大的改进空间。书中的内容以及说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且有着十分明显的半成品痕迹。如果当时卫匡国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好好打磨这本《中国语法》，也许它能够成为和《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地图志》以及《鞑靼战纪》这三部经典作品相媲美的著作。

笔者分析了卫匡国的《中国文法》的不足之处并且对其进行了说明。但是，处在汉语语法研究相对完善的今天，用今天的视角来分析一位 17 世纪汉学先驱的作品显然对他并不公平。卫匡国所在的 17 世纪，使他根本没有可以借鉴的前人研究，一切只能从零开始。而他将西方的语言学应用到汉语之中，无疑为后人打下了十分牢固的汉语语言学基础。在耶稣会以及其它修会的教友中，

有很多人认为卫匡国的中文知识不足⁸²。尽管卫匡国的汉语水平确实不能够说是高超，但是作为后人，在这门学科逐渐成熟之时去批判前人的作品确实有失偏颇。卫匡国的贡献在于首次尝试解释中国语法，尽管在书中有些欠缺不合理之处，但瑕不掩瑜，他的这本讲解中文语法的著作，以很高的水准成为了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3.2 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

3.2.1 来中国传教的托钵修会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天主教的各个修会开始不断扩张各自的教区。总的来说，可以将向中国传教（扩张）的路线分成两条⁸³：第一条是上文着重提及并且说明的以利玛窦和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路线；另一条是以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托钵修会为主的传教路线。这里所说的传教路线，不光指代了地理上的方向，也表明了其传教方式，并且这两者也都深深影响了其对汉语的研究。

先从耶稣会说起，从十五世纪末开始，耶稣会会士们从葡萄牙出发，经过非洲大陆和好望角，来到了印度的果阿，并且将果阿作为根据地来继续他们在东方的传教。利玛窦在到达澳门之前，也曾经在印度学习过一段时间。随后耶稣会继续向东方进发，来到日本和澳门，并以澳门为根据地打算敲开中国大陆的大门。另一方面，各个托钵修会，则是从葡萄牙对面的西班牙出发，跨过了太平洋来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将马尼拉作为据点并尝试进入中国传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大都采用了耶稣会延续下来的适应政策进行传教工作：学习汉语、穿上中国人的衣服、从中国的知识分子那里学习知识、同时将欧洲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艺术教授给中国人、取得中国人的信赖，再开始自己的传教工作。与此同时，耶稣会会士也尽量与中国上层的官员建立

⁸² [意]卫匡国著，白佐良，白桦 译，《中国文法》，第 73 页。

⁸³ 高田時雄，"カトリック・ミッションの言語戦略と中国（特集 十字架とアジア）"，文学 2.5，2001，p.2-7.

起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国内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是一种从上至下的传教方式。而托钵修会则选择了从一般的民众开始入手进行传教工作，这是一种与耶稣会完全相反的、从下开始的传教方式。因为耶稣会的一些行为与天主教本身的教义相悖，这引起了其它托钵修会的不满，最后则演化成为了“礼仪之争”⁸⁴。

这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也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对于耶稣会会士来说，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上层官员的接触，使他们的汉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最终用汉语写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著作。上文所提到的利玛窦、金尼阁还有卫匡国的汉语著作，其内容不光涉及了汉语语言本身，更是对中国的文化、地理、习俗等等进行了探讨。这些都称得上是 16、17 世纪颇具水平的作品，对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比起在中国的影响力，耶稣会会士所编纂的汉语著作在欧洲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比如上文提到的作为中西文词典鼻祖的《葡汉词典》，在完成了几百年之后才在罗明坚的众多手稿当中被发现；金尼阁所写的汉语音韵学著作《西儒耳目资》在欧洲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相反却对中国人研究汉语音韵做出了很大贡献；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尽管有为数不多的几份手稿在欧洲流传，但整体影响也不大。

⁸⁴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内容将会在第二部详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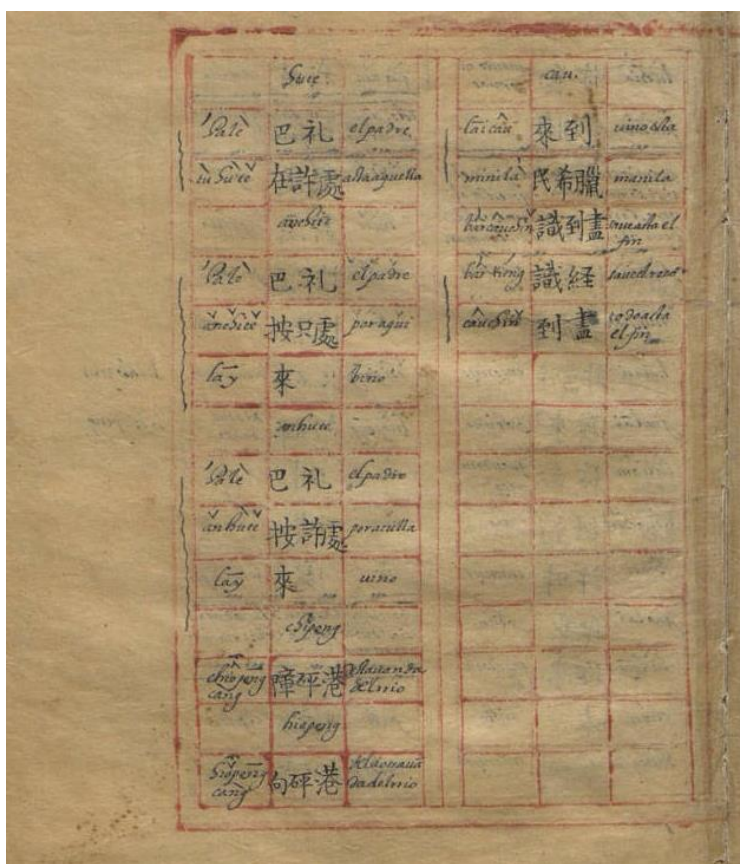


图 3-1 《潮州语法》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书影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版本)

与耶稣会相反，托钵修会则更倾向于编写纯粹的中外词典或是汉语语法教学书。尤其是多明我会，可以说是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创始者，并且将研究汉语语法这个传统传承了下去。耶稣会学习汉语的方法是直接进入中国，由老神父言传身教；而多明我会则走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由于托钵修会将菲律宾的马尼拉选作了向中国传教的据点，所以教士们并不像耶稣会会士那样，拥有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学习的便利条件。最初，如同罗明坚在澳门一样，多明我会的会士在马尼拉学习汉语也是一项缺乏可利用资源的艰巨任务。当时的学习途径只有通过马尼拉的华人或者是他们从中国带回马尼拉的汉语书籍。为了方便地学习汉语，首批来到马尼拉的多明我会会士就已经开始编纂汉语语法书和词典了。到了 17 世纪初，多明我会已经在马尼拉开设了面对新教士的

汉语课堂，并制定了学习成果考核机制⁸⁵。这些由托钵修会所编纂的汉语语法教科书或者词典，在欧洲产生了比耶稣会更大的影响。托钵修会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比耶稣会要早得多，其中，由多明我会传教士在菲律宾马尼拉编纂的《潮州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1620）大概是迄今尚未佚失的最早的方言语法书了，这本书的编纂比卫匡国的《中文文法》早了 20 余年。随后，无论是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会士叶尊孝于 1694 年编写的《汉字西译》，还是上文提到的多明我会会士弗朗西斯科·迪亚兹所著的词典，都在欧洲流传甚广。而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会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所著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则是全世界出版的第一部由西方人所著的汉语语法书。

3.2.2 万济国

万济国，原名弗朗西斯科·瓦罗，于 1627 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15 岁进入圣保罗修道院，一年后完成学业，成为多明我会修士。此时正值黎玉范，原名胡安·包蒂斯塔·德·莫拉雷斯（P.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约 1597-1664）从中国回到罗马，想招募一批神父修士，组建使团，去东方传教。万济国成为了使团的一员，并于 1646 年 6 月启程，经由墨西哥，于 1648 年 7 月到达马尼拉。在马尼拉，万济国与当地的华人共同生活，学习汉语。一年后，黎玉范带领会士们来到自己的传教据点福建福安。万济国到达中国的时间与卫匡国相差不多，当时正值郑成功（1624-1662）拒降抗清并且占领福建之时，清政府为了清除郑成功集结了大量海上力量打算与之对抗。这一将精力集中于对付郑成功的举措，给欧洲人带来了便利⁸⁶。

万济国在华度过了 38 年，与耶稣会进京实现从上向下的传教策略相反，他几乎一直在福建和广东地区，进行着自己的传教、教学以及研究工作：万济国来华之后一直在福建地区传教，直到清政府在 1671 年和 1672 年将许多传教士驱逐到了广东地区，后来，他又重返福建，开始以福建为据点拓展自己的事业。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撰写《华语官话语法》，并于 1682 年 2 月 18 日完

⁸⁵ J. S. Cummins, *Jesuit and Friar in the Spanish Expansion to the East*,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6, p.83.

⁸⁶ Jacques Gernet, *Le Monde chinois*, Paris: Armand Colin, 1972, p.409-410.

成。1687 年万济国在福建辞世。

《华语官话语法》完成之后，一直以手稿的形式在世间流传。后来，万济国的弟子、墨西哥籍方济各会会士石铎录（Pedro de la Piñuela, 1650-1704）于 1703 年将万济国的手稿重新进行整理，并且附上了叶尊孝所写的一份《解罪手册》（*Confessionarium*），将其交付给神父普莱希德·瓦尔查克（Placyd Walczak）⁸⁷，随即出版。

3.2.3 《华语官话语法》

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共十六章，加上前面的“弁言”以及作为附录的《解罪手册》，全书共分成了十八个部分。尽管作者称这本语法书不过是一本“小册子”，然而实则详细并且深入介绍了汉语语法。十八个部分分别是：作为前言的“弁言”；第一章、对于学习汉语的训诫；第二章、汉语的声调；第三章、代词名词的变格；第四章、名词以及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第五章、抽象动名词、指小词、多次性、行业名称以及名词的性数；第六章、代词；第七章、叹词、连词、否定词、疑问词以及表示条件的词；第八章、动词以及动词变位；第九章、被动；第十章、介词和副词；十一章、构句方式；十二章、数词量词；十三章、各种小词；十四章、官话礼貌用语；十五章、如何称呼官员及其亲属，以及其他入，如何称呼自己；最后一章十六章、交谈中的礼貌用语，以及拜访、邀请时的理解；加上最后附上的《解罪手册》。

从各个章节的标题上就大致能够看出，《华语官话语法》这本语法书在分类上面做到了十分的细致，不光讲解了汉语的语音，相较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更详细地讲解了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专门用了几个章节来解释汉语语用学相关的内容。长期以来，《华语官话语法》都被认为是第一本出版的汉语语法书，但它的完整程度让人吃惊。

这样高的完整度，是万济国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结果。无论是万济国自己在书中的叙述，还是内容的编排，都表明了该书至少得益于两项先人的成果：第

⁸⁷ 出自：Antonio Sisto Rosso,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 Mex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Author”, *Franciscan Studies*, 1948, p.269。但是笔者暂时没有找到对于瓦尔查克本人更详细的描述或者记载。

一是在万济国之前，由多明我会传教士编纂的语法教学手稿；第二则是由安东尼奥·德·内布利亚（Elio 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所写，于1492年出版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首先是多明我会传教士的汉语语法教学手稿。如上文所说，在万济国之前至少已有两本多明我会会士所撰的汉语官话语法书，但这两本书已经失传，只能够在多明我会的文献当中看到有关它们的记载⁸⁸。万济国本人在《华语官话语法》的“弁言”部分说到了其编写教材的经过：

.....利用从别的教师那里搜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个人的研究成果，花了20年的时间来编成这部小小的读本⁸⁹.....

由于万济国之前多明我会会士编撰的汉语官话语法书已经失传，所以我们无法断言万济国从之前的材料当中汲取了多少内容。上文提及的同为多明我会教士在马尼拉编写的《潮州语法》，其实已经将一本语法教科书的框架基本搭建起来了。所以尽管可以肯定，那些至今找不到原本的教科书对《华语官话语法》的编写具有一定参考借鉴的意义，但是从柯伯到迪亚兹再到万济国的这三本教材究竟进步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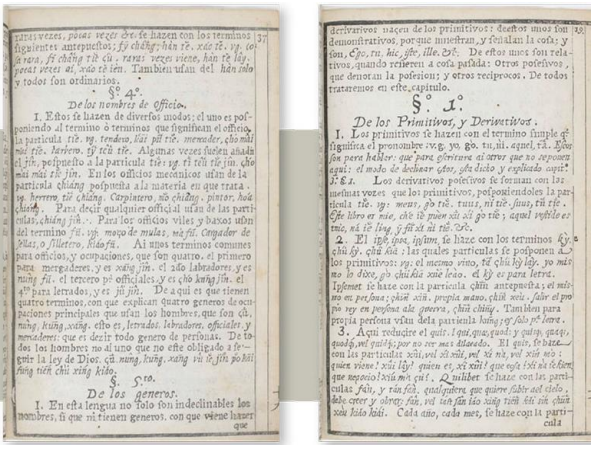


图 3-2（左）《华语官话语法》封面书影；图 3-3（右）《华语官话语法》内容，可以看出书中没有出现汉字

⁸⁸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 p.42.
⁸⁹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 著，姚小平 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可以明确的是,《华语官话语法》第二个借鉴的对象就是内布利亚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内布利亚的这本语法书,本身是一本西班牙语的语法书,介绍了西班牙语及其语法规则。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介绍现代欧洲语言的语法书。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在《华语官话语法》的英译本前言当中详细分析了内布利亚的语法书对于瓦罗的影响⁹⁰。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内布利亚的这本著作在当时享有极高的权威性,几乎成为了语法书的一个标杆;另外,《华语官话语法》的结构和内容都与内布利亚的语法书十分相似。万济国本人在书中的弁言当中表示: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学习拉丁语的时候,即使他懂了内布利亚制定的所有规则,仍然不足以成为一个拉丁语言学者⁹¹.....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内布利亚语法书的权威性,以及万济国对其的认可。同时,万济国在其语法书的第八章的开始⁹²,便说明了自己对于第八章动词及其变位以及第九章被动动词和被动结构的分类,是根据内布利亚的语法书而来。

由于找不到多明我会语法系列的最初两本教材,所以我们暂时并不能确定万济国的这本语法究竟汲取了多少前辈的内容。唯一能够肯定的是,相对于意大利籍耶稣会的卫匡国,西班牙籍的多明我会的万济国拥有更多前人所留下的资源,所以这本《华语官话语法》无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成果。

3.2.4 《华语官话语法》的章节分析

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仅有作者对于汉语语法的讲解,同时还提及了很多汉语中的现象以及作者自己对汉语的认识。这些讲解和认识,相较以前耶稣会的卫匡国,甚或更加久远的利玛窦,都更加深入和全面。

⁹⁰ Francisco Varo, Edited by: W. South Coblin, Joseph A. Lev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andra Breitenbach,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0, p.xxxv-xxxix.

⁹¹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 著,姚小平 译,《华语官话语法》,4页。

⁹² 同上,80页。

（1）前言

首先，在弁言当中，万济国主要说明了三點：第一，现在依然有很多传教士认为汉语是不存在语法的莽荒语言（西班牙原文为：*lengua barbara*），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第二，他编著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新教士学习汉语，然而学习汉语仅学习语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应用；最后，他强调说明并且规范了书中的正音法。

有关当时欧洲传教士对于汉语语法的认识，正如万济国所说，许多接触过汉语或者是了解过汉语的西方人都认为，汉语在语法规则方面相较于西方语言来说，更加单纯、原始。这种认为汉语更加原始的观点，自传教士开始学习汉语时便已经出现，直至今日依然存在。因为缺少了屈折变化，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汉语确实没有西方语言来的复杂，但无论是把汉语当作蛮荒的语言，还是神创造的大自然的原始语言⁹³，这两种观点都是混杂了些许民族主义的产物。

关于第二点，万济国在前言当中指出了当时传教士们学习汉语时所遇到的问题：很多新来的传教士在老教士的指导下学习汉语，或者直接跟中国人学习汉语；然而前者的问题是很多老教士本身对汉语也一知半解，后者的问题则是不会汉语的新教士压根没有办法与中国人交流⁹⁴。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也正是编写这本语法书的目的。从这里其实就能够看出托钵修会和耶稣会之间理念上的差别，万济国所提到的这种有些问题的学习方法实则正是当时耶稣会的大多数传教士学习中文的方式。

而关于正音法，由于西方语言众多，尤其是罗曼语系的几种语言发音语法都很相近，所以有时难于区分其所用的正音法。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在利玛窦之后，西方人编写的大多数关于汉语语言的著作都会在书中特意说明其所使用的正音法。在《华语官话语法》关于正音法的叙述当中，万济国主要按照元音分类，使用法语的读音简单介绍了汉语的读音规律。

⁹³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N. Brook, 1669, p.192-193.

⁹⁴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 著，姚小平 译，《华语官话语法》，第3页。

（2） 诚律

正文开始的第一章，标题为“若干诚律”。万济国在这一部分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汉语观。其实整体上来说，万济国在“诚律”当中所阐述的汉语观和利玛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的汉语观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很明显万济国对于汉语的理解更加细致深入。

在第一条诚律中，首先提到了西文当中的“字母”和“单词”与汉语的“字”之间的区别。万济国认为，对于西方语言来说，字母是有限的，词是无限的，而在汉语当中，“字”的数量十分巨大，音节繁多，大约有 364 个，加上不同的声调一共有 1525 个音节。相比卫匡国在《中国文法》中的统计，《华语官话语法》中的音节明显增加了很多。利玛窦认为，每一个字都能成为词，所以不存在真正的复合词，而万济国则告诉读者在汉语中存在真正的复合词，从而修正了利玛窦相对错误的理解。但遗憾的是，整本《华语官话语法》的原本除了页码由汉语标注外，没有出现一个汉字。诚律当中对于“字”的概念的介绍也显得有些含糊不清。换句话说，作者只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语法部分，而没有对汉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也就是汉字，进行特别的强调。讲解汉语语法却没有讲解汉字，甚至整本语法书当中都没有出现汉字，可以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条诚律则涉及汉语的语体（原文西班牙语为：**modos de hablar**，直译为“说话的方式”）。利玛窦已经意识到了不同语体的区别，他认为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差距很大：尽管词汇相同，但是口语难登大雅之堂，很难受到较高阶层的重视；书面语则可以在正式的场合使用。因此他将语体按照口语以及书面语进行区分⁹⁵。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则采用了另外一种分类方式，他将汉语的语体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高雅优美的语体，是有教养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语体；第二类处于雅俗之间；第三类为妇人和农夫这类当时中国社会下层人所使用的语言。书中特别提到，掌握第一类语体对于传教士来说是“极其困难”的；第二类语体则是传教过程中所必要的，所以教士们需要认真学习；第三种语体则是汉语学习的起点。从利玛窦和万济国对待语体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耶稣会和托钵修会之间传教策略的差别：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是从上向下，

⁹⁵ [意]利玛窦 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 20、21 页。

因此利玛窦认为传教士需要学习能够与中国上层人士进行交流的书面语，也数次在其回忆录以及书信集当中提及书面语在中国的重要性；而托钵修会则从平民开始传教，这导致了他们并不需要这种“高雅优美的第一类语体”，万济国在“诫律”当中也只列举了第二种和第三种语体的例子。

在第三条诫律当中，作者涉及了几个方面的内容。但重点都是在强调怎样让中国人听懂传教士所说的汉语。总体来说，这一部分可以归纳成以下四点，即音调、语序、上下文以及选词。音调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每个字的声调，还有整句话的语气和腔调；语序不仅是词之间的排列，也包括非单音节词内部词语的排列；上下文指的是传教士在与中国人用汉语交流的时候，要给予足够的上下文，这样才能让对方理解你的意思；最后是要根据汉语母语者的使用习惯来选择使用的词语。但万济国在书里也并没有总结这些东西的规律，而是给出了唯一的学习建议：模仿中国人。由于汉语声调的存在以及很多约定俗成的用法，比起总结规律，单纯的模仿和训练确实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第四条诫律的内容也相对有些杂乱，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点：1.如果一个人要学好汉语，那么就有必要学习汉字⁹⁶，但是汉字十分难学，所以作者不建议初学者去尝试；2.句子的组成结构十分重要，学习者要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练习才能掌握；最后一点则是举例讲解了汉语的复合词组成：例如“鱼鳞瓦”就是“鱼鳞形状的瓦片”。

接下来是最后一条诫律，即关于汉语的书写方法。如上文所述，在整本《华语言语法》的正文当中并没有出现汉字，也就是说，这里的汉语书写方法指代的并不是汉字的写法，而是注音的写法。第五条诫律和前言的读音以及第二章的声调基本上能够组合成一套完整的注音转写系统。关于万济国的注音转写系统，前人已经做过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本文在此就不多加赘述了。简单来说，这本书的注音撰写系统也很明显地继承了耶稣会的那一套，即由罗明坚创建、利玛窦发展、最后由金尼阁完成的注音系统，万济国在书中做了些许修

⁹⁶ 西班牙语的原文为“*Letras*”。由于作者此时并没有“字”这个概念，所以将“字”和西方语言的“字母”对等了起来。

改，目的是为了照顾西班牙语母语者的学习需要⁹⁷⁹⁸⁹⁹。在诫律的最后，作者还简单提及了中国方言：根据教士们向中下层民众传教的需要，强调了学习方言的重要性。这里也可以看出托钵修会和耶稣会之间的区别：对于耶稣会来说，学习汉语官话十分重要，而方言则可有可无；而对于托钵修会来说，由于传教对象以社会中下层为主，因此学会他们的说话方式就显得很有必要。

作为总结，第一、二、五条诫律基本上都是作者对于汉语规律的介绍，而第三、四条则更倾向于是作者对于学好汉语的建议。从上述分析能够看出，万济国的这本语法书十分强调实用性，也就是说，作者希望传教士能够在这本教材的帮助下，很快掌握汉语的基础知识，从而更好地开展传教工作。以实用性和降低难度为前提，作者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口语上面，以至于教材正文并没有出现任何汉字，并且建议，初学者应该将重点放在下里巴人的口语上。

（3） 声调

在第二章，万济国用较大的篇幅对汉语的声调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五个声调逐一举例说明。在音调方面，在郭居静神父确定了汉语官话的五个声调之后，基本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而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这套整体的书写规则也继承了金尼阁完善的注音体系；此外，学者们也能够确定书中所涉及的“官话”具有较强的南京官话特点¹⁰⁰。也就是说，在声调和注音方面，万济国的语法书除了在讲解和叙述方面进行了细化以外，和之前的语法书相比，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

（4） 语法

从第三章到第十三章，是这本书的重点。作者根据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语

⁹⁷ W. South Coblin,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Early Qing Guanhua”,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1996, p.43-57.

⁹⁸ W. South Coblin, “Notes on the Sound System of Late Ming Guanhua”, *Monumenta Serica* 45, 1997, p.43-57.

⁹⁹ 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 and the Sound System of Early Ming Mandarin”, *JAOS* 118: 2, 1998, p.262-267.

¹⁰⁰ 西山美智江，《近代欧洲人撰写的汉语语法——〈华语官话语法〉及其语言和语法特点》，《汉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法框架的八大词类的分类方法，对汉语的词法¹⁰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作者撰写这部分的时候，可供参考的资料相对多了一些。所以，这部分整体来说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改进的结果，笔者将在下一章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和以往的语法书（比如《中国文法》以及《潮州语法》）一样，《华语官话语法》在本质上依然采用了西方语法框架来对汉语的语法进行说明和分析，但这本书的内容明显要比之前的语法书更加充实。

首先，在使用西方语言框架这一点上，《华语官话语法》和以前的语法书一样，都采用了古希腊瑟拉克斯的语法框架，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扩展和修改，以适应汉语语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数词和量词。由于西方语言中的数词尤其是量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瑟拉克斯并没有将其单独列为一个词类。但是汉语的量词用法可谓是多种多样，就连时间、年份的计数方式以及各种计量单位都与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早期传教士编纂的几乎所有汉语语法书都特意将数词和量词单独作为一章进行讲解。另外，万济国的这本语法书，无论是其涵盖的话题还是对于每个话题的研究程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前的汉语语法书。如果说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告诉了读者汉语有着如此这般的现象，那么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则更像是一名了解汉语的教师，对每一个语法现象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举例。

值得一提的还有第十一章。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语言更喜欢研究“字”，而西方人则更喜欢研究“词”，但对于“句”的相关研究则少之又少。《华语官话语法》在第十一章专门用了一些篇幅研究了汉语的构句方式。由于缺少了词的屈折，所以汉语必须要通过改变词的位置来达到西方语言屈折的效果，这一点对于汉语的语法来说相当重要。很明显，作者已经发现用西方语言的语法似乎很难解释汉语的句法，因此他不辞辛苦地将其分类、归纳、总结，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汉语和西方语言在本质上的不同。根据万济国本人在这一章提到的“本章就讨论这些句型，另一部语法著作大体上也对它们进行了描述¹⁰²”，可以发现，这一章节的内容应该是从多明我会的前辈的书中所继承而来。

¹⁰¹ 实际情况是，由于汉语并没有词语的屈折，所以对于汉语来说根本就没有词法这种说法。这也是早期西方人所编纂的汉语语法书最大的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当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¹⁰²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 著，姚小平 译，《华语官话语法》，第 121 页。

《华语官话语法》的第二章到第十三章，基本采用的都是前人传承下来的系统和观念，万济国只是对这些系统进行了一些调整，例如：采用了对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者更容易理解的注音方式，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西方语言学暂时无法解决的一些语言现象。

（5）语用

第十四章到十六章的标题分别为：“官话礼貌用语”、“如何称呼官员及其亲属，以及其他的人；如何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称呼自己”、“交谈中的礼貌用语，以及拜访、邀请时的礼节”。这是在现存传教士编纂的语法书当中第一次出现汉语的语用学。其实，早在利玛窦时期，利玛窦就已经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阐述了他在中国见到的很多和语用学相关的实例，例如：中国人对于书面的东西非常信任，认为这是权威的象征；交给官府的文书需要找专人来撰写等等。但遗憾的是，利玛窦并没有在回忆录当中给出实际的案例，也没有对这些汉语语用学的“经验”做出系统的总结。在随后的两本汉语语法书《潮州语法》和《中国文法》中，几乎没有提及汉语语用学的知识。直到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如上所述，《华语官话语法》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使用汉语的来华传教士，因此这部分语用学的内容，在全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本专门写给新人来华传教士的语法教科书当中加入这三章内容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争取中国人的好感，使传教工作能够顺利展开；第二是避免麻烦。至于争取中国人的好感，这一策略其实是最初打算在中国设立教区的耶稣会带头实施的。但由于耶稣会采取的是自上向下，而多明我会则是自下向上的传教策略，因此万济国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是：争取下层民众的好感，是其成为信徒，同时避免上层官员给传教工作带来麻烦。

（6）《解罪手册》

《华语官话语法》的最后部分，是叶宗贤所编写的《解罪手册》。语法书的正文部分是用西班牙语撰写的，而《解罪手册》则是直接用拉丁语写成。由于

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新人来华传教士，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实用性。

3.2.5 总结

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作为早期来华传教士编纂的一本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并且很注重实用性的语法教科书，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华语官话语法》用“八大词类”的方法来讲解并且教授汉语，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瑟拉克斯制订的西方语法框架，被内布利亚用在了他的西班牙语语法书当中，随后又被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继承，最后，万济国则站在了这些巨人们的肩膀上，编纂出了这本语法书。虽然万济国并不是第一位使用这种语法框架来描述汉语的作者，但这本书的内容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汉语语法书。

第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的定位十分明确。这里的明确包涵两个不同的含义：首先，这本书毫无疑问是一本教科书，其次，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为了能在中国顺利传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由于在《华语官话语法》之前，现存的汉语官话语法书只有卫匡国编写的《中国文法》。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文法》很大程度上是卫匡国学习汉语时的笔记，因此它更倾向于对汉语语法现象的描述；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则致力于“教会”读者汉语官话，并且鼓励读者运用这些官话，因此他在书中介绍了很多学习汉语的“小窍门”，以帮助读者减轻学习时的困难。

同时，这本语法书的目标读者是去中国传教的多明我会的新人传教士。而多明我会传教士的目标人群则是中国的下层民众。因此，这本书的读者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即遵从多明我会的传教策略，学习简单的汉语，随后向中国的下层民众进行传教。这样明确的目的使得这本书的内容以口语为主，并且在书本的最后附上了叶宗贤所编的《解罪手册》。

第三，这本书介绍了汉语语用学的知识。纵观古今，讲解语用学的语法书可谓少之又少。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学习了一门语言的发音、语法以及词汇基本上就等于掌握了一门语言。这种认知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万济国的目标是培养出能够融入中国社会的传教士。在这个大前提下，

语用学就显得必不可少。

最后,《华语官话语法》在系统性和全面性这两个方面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利玛窦时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开始编写各类的汉语教学书籍,包括辞典、读物以及语法书。但是其中大部分作品所涉及的汉语知识都相当零散,不具有系统性。比如,无论是利玛窦的回忆录,还是他的《西字奇迹》,都没有对汉语进行系统的整理,即便书中所涉及的注音系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换句话说,利玛窦的汉语水平以及他对汉语的认识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在著作中的表现。卫匡国亦是如此,相较于他的其他著作,他似乎并没有将很多精力放在《中国文法》的编写上面。虽然后人认为,卫匡国的汉语水平有限,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书稿质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从仅有的一些例句或是他没有完成的章节中,很容易看出,他并没有很重视这本语法书。由此可见,早期的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尽管自己的汉语水平很高,但由于并不重视汉语的系统教学,因此他们的水平并没有在相关的汉语教学著作中体现出来。而相比耶稣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对于语法书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就促使万济国在编写《华语官话语法》时,认真并且系统全面地将自己的汉语知识付诸笔端。

3.3 马若瑟与《汉语札记》

1728年,耶稣会的法国籍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63)在广州完成了《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这本汉语教材作为当时观点十分超前的汉语研究成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前人对于马若瑟及其《汉语札记》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完善¹⁰³,并且笔者也认同这些研究成果的观

¹⁰³ 马若瑟留下的著作以及译著在相关领域的知名度很高,尤其是他翻译的《赵氏孤儿》以及各种索隐派著作,因此,西方对于马若瑟的研究既全面又深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对于马若瑟整体学术成就的研究:

[丹麦]龙伯格 著,李真/骆洁 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

马若瑟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的成果研究:

Knud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ActaJutlandica, 1991

对于《汉语札记》的研究:

点，所以在这里只对马若瑟及其《汉语札记》进行简单的叙述。

3.3.1 马若瑟

马若瑟于 1666 年出生在法国北部的港口小镇瑟堡（Cherbourg）。1683 年，也就是他 17 岁的时候，加入了巴黎耶稣会。1698 年，他随同为法国耶稣会会士的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以及巴明多（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启程来华，并于 1699 年抵达中国的广州。和利玛窦一样，马若瑟也献身于传教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事业，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扎根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法国。在中国期间，马若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用西方的方法论对之进行分析和解释，其著作在很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若瑟来华之后的人生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前江西时期（1699-1714）、北京时期（1714-1716）、后江西时期（1716-1724）以及广东时期（1724-1736）¹⁰⁴。

“前江西时期”是马若瑟入华初期，旨在认真学习、尝试掌握汉语并且开展传教工作。期间，他阅读并学习了很多中国典籍，并且尝试使用中文写作。同时，他还与同一修会的白晋以及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 1665-1741）一起讨论并创作了很多索隐派¹⁰⁵的作品。在北京的两年，也就是“北京时期”，一方面由于时间很短，另一方面各个方面都不太顺利，导致这个时期并没有产生值得一提的作品。再次回到江西之后，即“后江西时期”的马若瑟，无论是其写作水平还是知识储备，都远超“前江西时期”，所以在这 8 年的时间内，他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索隐派思想的作品。1724 年受雍正禁教的影响，马若瑟来到了广东。这个时期的马若瑟无论是语言技能、知识量还是人生阅历，都达到了一个顶峰，他在 1728 年创作出了《汉语札记》，并且将《赵氏孤儿》（1735 年出版）翻译成了法语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此外，他还完成了索隐派

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¹⁰⁴ 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第 14 页

¹⁰⁵ 索隐派（Figurism），代指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的古代典籍当作先知的预言书，找到其中包含基督教教义的部分，将这种方式作为推广基督教的一种方法，借此说服清朝廷支持耶稣会在中国国内的传教活动。

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籍之基督教教条》(*Selectae Quaedam Vestigia Praecipi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ae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 1712-1724)。

马若瑟一生所留下的著作，在三个方面¹⁰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一为索隐派思想研究¹⁰⁷，作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索隐派思想研究贯穿了马若瑟在华三十余年的传教和研究生涯；其二是他翻译的中国经典作品¹⁰⁸，使欧洲人了解了中国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化思想；第三便是他以《汉语札记》为代表的汉语研究成果¹⁰⁹，尽管这本书的编纂日期为 18 世纪上半叶，但却代表了 18 世纪西方汉语研究的最高水平。

3.3.2 《汉语札记》

1728 年，无论是汉语水平还是对汉语的理解程度都处于巅峰的马若瑟，在广州编纂完成了《汉语札记》。由于出版的过程相当不顺利，书籍直到马若瑟在澳门去世时都没有出版。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汉语札记》只能以手稿和抄本的形式，在教会内部以及欧洲学术界流传。1826 年前后，英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将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的抄本带回了远东，在他的推动下，1831 年，《汉语札记》才得以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出版。从成书到正式出版，中间相差了一百余年的时间。而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当中，《汉语札记》手稿则影响了很多汉学家或是来华传教士。

¹⁰⁶ 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第 19-21 页。

¹⁰⁷ 马若瑟的索隐派作品相当之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古籍之基督教教条》，还有一本是《易经理解》(*Notice critiques pour entrer dans l'intelligence de l'Y King*, 1731 左右成书)。

¹⁰⁸ 译著当中最为出名的应属将元剧《赵氏孤儿》(*Tcho-chi-cou-eulh; ou,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翻译成了法语，1735 年发表在了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卷三上面。

¹⁰⁹ 除去《汉语札记》以外，马若瑟还有一本名为《六书实义》的汉字研究书籍。成书时间为 1728 年之前，书中马若瑟使用了笔名“温古子”。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AUCTORE P. PREMARE.

MALACCÆ:

CURA

ACADEMIÆ ANGLO-SINENSIS.

MDCCCXXXI.

AD LINGUÆ SINICÆ NOTITIAM.

89

non tantum verba, sed verberibus adhaere te excipiam; 哩魔哩要怕只呵了見若你
zi jō kien laoh hō tchī pā yāo fang mō h, si videtur illam contempnit, hanc dolo pro amore in-
canes; 哩芽發有浸還通下方今如 ja kin fang hā tchōng, hōā m' yōō fā yā h,
modo somnasti, nondum messis tua germen protulit; 哩緊得切留不好麼些說
choāi sū chin mō, hāh pōi mī t'āi tō kin h, magna hic secretis vobis latetem dicitis; 知可
哩是 k'ō tchi chē h, ipsemet erat, vel hoc ipsum est.

3^o Sunt plures alii que idem dicunt ac 哩, v. g. 呢箇這 tchē kō n, istud vel iste autem
quid? item 波是不可 k'ō pōi chē pō, an non ita est? item 那好不可 k'ō pōi hāh-
nā nonne istud cedit locum? 那 nā est etiam particula vocantis, v. g. 那天 r'ān nā, o celum!

PARAGRAPHUS SEXTUS

DE PARTICULIS 兒 ēl et 耳 ēl.

兒 ēl proprie significat filium et 耳 ēl est auris. Sed cum assumitur pro meris particulis,
minima et forte nulla est inter utramque diff. rentia.

1^o Jungi solent nominibus substantivis, v. g. 焉試兒眼大太兒必的作 nī tī
ān ēl tū tū tā, yān ēl tū k'ā, cor grandis habes et oculi tui, Gall. tonnerre trop difficile;
你處兒法有也我 ngō yā yōō fā ēl tch'ā nī, scio modum te regendi; 作我與故
耳頭對 kōā yā ngō tō tōi t'ōu ēl, et idem vult esse mens adversarius, Gall. mon en-
fagoniste; 兒頭老老 t'ōu ēl, senex grandævus; 兒話句說兒禮个見 kien
kō ēl, choāi kiā hōi ēl, si leve sigum urbanitatis dedisset, si me vel uno verbo alle-
catus esset; 我觀兒眼雙一將 tāng y chōāng yēn ēl kōiā ngō, me oculis
aspexit; 兒話看好句幾說裡口 k'ō ēl h chōu ki kiē hōk'ān hōi ēl, conabatur
verba magnifica identidem proferre.

2^o Sæpe usurpantur per aliquem contemptum vel certe parvum aliquid esse denotant, v. g.
耳官文的頭華弄這微喜 nōi hī tō tōi tōi lōng pī t'ōu tī vān kōiā ēl,
nolo esse inter mandarinos pacis, qui solo calamo fortes sunt; 烏頂一這得不拾非
耳柄妙 fēi chē pōi tī tchē y t'ing oā chā mō ēl, non quod tanti faciam istud fletum
mandarini; 就音耶人兒話我思些這 tchē sū tchōng y hōi ēl, gū tōi hōi choāi,
nemo est qui non possit hoc modo loqui ad pompam de fidelitate et justitia.

X 2

图 3-4

1831 年英华书院出版

拥有大量例证的《汉语札记》

图 3-5

拉丁语版《汉语札记》书影

《汉语札记》共分三卷¹¹⁰，分别是绪论、第一编以及第二编。绪论分为三章，分别为论中国典籍、论汉字、汉语音节总表；第一编讲解俗文学作品中的汉语，分三章，分别为俗文学作品中的汉语语法和句法、汉语的特点、论中国礼仪；第二编则将重点放到了典雅文学作品中的汉语，分五章，分别为书本中的语法和句法、汉语虚词专论、论汉语的不同风格及撰写文章最好的方法、论修辞、典雅句法汇编。

从目录上来看，马若瑟第一次将通俗汉语和书面语分开来讲：早在耶稣会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利玛窦就已经在其回忆录和书信集当中数次强调了汉语口语以及书面语之间的区别；万济国也在《华语官话语法》当中表示，可以将汉语的文体分成三部分，但是马若瑟之前的汉语教程或者语法书，并没有真正将通俗语和典雅书面语分开进行说明和教授。

另一个能够从目录上体现出的特点是，从各个部分的比重来看，这本书的

¹¹⁰ 《汉语札记》的版本研究相对较为复杂，最早的原本已经佚失。这里笔者选取研究的为1831年在英华书院出版的拉丁语版本，相较最早的原本来说，有一部分的佚失，并且更换了文字左右排列的习惯，加增了雷穆沙编纂的索引。

重点并没有完全放在汉语语法上面。类似卫匡国的《中国文法》以及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在《汉语札记》当中只有第一编的第一章（口语的语法和句法）以及第二编的第一章（典雅文学作品中的汉语），是对汉语词法的讲解，其篇幅不到整本书的十分之一，即使加上汉字的声调和发音部分，也不过才占整本书的十分之一左右。作者将主要的篇幅放在了讲解虚词以及例句上面，具体表现如下：首先，马若瑟在书的开头就提到了汉语当中并没有“词法”，也就是说并不会像拉丁语一样出现词变，取而代之的是汉语使用相当多的虚词以及调整词语的顺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讲解不同的虚词。其次，由于马若瑟本人精通中国古籍，汉语水平十分高超，所以他在书中加入了很多的实例，文体也涉及极广，据统计，整本书所提供的例子超过12000条¹¹¹。

正是由于这本著作的内容十分充实，加上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深刻，所以在此就不再对《汉语札记》进行更加深入的文本分析，而只对其相较以前汉语研究书籍的特点进行说明和分析，并根据这些特点总结作者的汉语观。

3.3.3 总结

和前人的汉语研究著作相比，《汉语札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若瑟在《汉语札记》当中第一次明确表示，不能够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或者说所谓的拉丁语视角来研究汉语，而是需要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分析和教学。这就使得整本书当中对于“词法”以及“句法”的说明只占了极少的篇幅，而将重点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训诂学释义以及对不同字的用法上面，同时马若瑟也为读者提供了巨量的例句。就其结果来看，马若瑟尝试对西方人教授汉语语法的教学系统进行的变革，确实对这个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提出了一些前人没有意识到的重要观点。（对于西方人认识汉语来说，马若瑟取得的突破性的一点是，他认识到了对于汉语这门没有词法的语言来说，承载欧洲语言词法任务的是汉语句子当中不同词和字的顺序以及虚词）但问题是，他在书中尽管减少了对于词法句法的描述，增加了大量

¹¹¹ 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第322页

具有汉语特色的内容，但依旧在使用词法和句法来描述汉语的语法本身，也就是说，尽管他提出西方语言框架是不适合汉语的，但依然没有摆脱它的桎梏。

其次，《汉语札记》当中出现了好几个在前人的著作当中并没有讨论过或者是几乎没有讨论过的话题。第一个是通俗汉语和典雅汉语：从利玛窦开始，教士们就已经意识到下里巴人的口语与知识分子的书面语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并没有人在其著作中尝试说明这两者到底有何不同，或是提出将这两者分开进行处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语札记》是第一本兼顾白话和文言的汉语相关著作。第二个是修辞。从各种意义上讲，都不太能将修辞完全归到语法的范畴，而是类似于古希腊修辞学那样“达到说服别人目的的工具”这样性质的东西。所以修辞本身和使用何种语言关系不大，这就使得马若瑟之前似乎没有人将汉语修辞当作一个重点来讲解。第三是语用学的知识。语用学相关的内容、性质和《华语官话语法》当中关于中国习俗和礼仪的内容是类似的：和万济国一样，马若瑟在书中也用了一部分篇幅来讲述清朝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原则，在什么场景下应该如何使用汉语，与不同的人物交往的时候该如何措辞等等。然而，由于《华语官话语法》当中只介绍了和口语相关的通俗汉语，并没有任何有关书面典雅汉语的内容，这也就导致了书中缺乏典雅汉语的语用学相关知识。而《汉语札记》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了通俗汉语和典雅汉语，这就意味着在内容方面增加了万济国所没有提及过的典雅汉语的语用学知识。

第三，正是因为马若瑟在著作当中涉及了太多的内容，导致《汉语札记》也继承了耶稣会会士编纂汉语研究教学相关著作时那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缺点。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会士便完成了大量与中国文化或者汉语相关的著作，如同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也许是由于耶稣会学习汉语方法的原因，致使他们并不太需要语法书，所以与耶稣会会士完成的有关中国文化地理的书籍相比，他们编纂的语法书明显缺乏系统性。利玛窦本人的汉语水平很高，他在书信回忆录中也多次发表了自己对汉语的看法，但却并没有将其系统整理成一本语法书；卫匡国则是在自己汉语学习笔记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编纂和修订，因此，《中国文法》的完成度确实有所欠缺。至于《汉语札记》，从内容中就可以明显看出，马若瑟完全没有将书的重点放在语法上面，其中对于汉语语法的讲解和词的分类几乎简单到了不能更简单的程度；相反，他把中心放在了

给汉字的实词和虚词¹¹²释义、举例以及讲解文体上面。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若瑟在给法国汉学家傅尔蒙（1683-1745，Étienne Fourmont）写信的时候，曾经表示：

我创作这本书和其他作品时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基督教的历史同世界的历史一样古老，创造汉字以及写作“经”的那个或那几个人一定对基督有所了解¹¹³。

也就是说，这本汉语教科书其实是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的马若瑟夹杂了相当多“私货”的产物。由于马若瑟的这本书除了将“教会西方人汉语”作为目标以外，还有宣传自己索隐派思想的目的，因此，马若瑟既想抛弃欧洲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但最终又没能舍弃；既想教会西方人汉语，又想宣传索隐派思想；既想教授通俗汉语，又想教授文言，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汉语札记》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是对任何一个话题的讲解都缺乏系统性和全面型。

第四，身为耶稣会会士的马若瑟，具有极高的汉语水平，他收集了大量的汉语经典，从而使《汉语札记》的例证十分丰富。耶稣会来华传教士较高的汉语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从罗明坚和利玛窦时期便已经开始的学习汉语的方式：新教士来到中国后，在老教士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与中国当地上层的知识份子和官员交流，并且大量阅读汉语的经典。这种和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母语类似的学习方法，最终培养出了很多汉语水平极高，能够熟练使用文言写作的教士。对于马若瑟而言，其拥有较高汉语水平的原因还有一个，那便是他将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意义寄托在了索隐派的研究之中。因为索隐派认为，中国的古籍蕴含着基督教的思想，中国的古代思想和基督教有着相同的本源，所以他们不断寻找中国古籍当中所隐藏的，和基督教观点一致的内容。这种研究性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要博览中国古籍，并且深入研究书中的内容。马若瑟利用自己来华的三十七年时间，研究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才完

¹¹² 虚词的概念来自西方，泛指那些没有完成意义却有着语法意义的词汇。然而实际上汉语所使用的虚词自身的属性并不是“词”而应该是“字”。马若瑟在《汉语札记》当中所描述的虚词也都是“字”。

¹¹³ [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9-80页。

成了《汉语札记》。正是他的努力和博学，使得这本书对于汉字虚词的解释十分到位，并且包含了大量的例证。

第四章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汉语观的发展

13 世纪末来到中国的旅行者兼商人马可·波罗，在自己的《马可·波罗游记》当中首次记载了自己对中国以及汉语的看法。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马可·波罗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自己在中国的时候懂四门语言。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¹¹⁴¹¹⁵，尽管对于这四种语言究竟是何种语言有所争论，但他们一致认为这四种语言均为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中东地区的语言，而汉语官话并不属于马可·波罗掌握的这四门语言的范畴。他在中国生活的这段时间所使用的应该是蒙古文。马可·波罗对西方人汉语观发展的贡献仅限于他对汉语和汉字笼统的描述。况且，《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四卷当中，也只有第二卷专门记载了和中国相关的事情。所以总的来说，尽管这是对于东方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且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在欧洲流行，为欧洲人了解中国以及汉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其内容涉猎过广，加上作者本人不懂汉语，所以在中国语言知识方面只做了最基本浅显的描述。

4.1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耶稣会

罗明坚、利玛窦的来华可以说是西方人对于汉语深入研究真正的起点。耶稣会会士的来华，预示着西方人正式研究汉语的开始。利玛窦在华期间，完成了如下四项对于西方人研究汉语来说十分重要的工作：第一，与罗明坚两人共同编纂了第一本中外辞典，《葡汉辞典》；第二，与罗明坚一起创造了罗明坚系统，这是使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的第一套系统。随后又与郭居静一起改进了罗明坚系统，利玛窦系统成为了该领域相对权威的系统；第三，在遵从耶稣会

¹¹⁴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 Volumes), John Murray, 1871.

¹¹⁵ Marco Polo, 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F.Didot, 1865.

从上而下的传教策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驱佛近儒”、与朝廷上层搞好关系的策略，成功地将基督教传入了中国，并且影响了一批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为后来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使他们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但同时，这也埋下了中国礼仪之争的祸根。最后，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以及书信集当中，记载了一些他对汉语理解的碎片信息，这些碎片的性质尽管与马可·波罗在他游记中所提及的汉语信息很相似，但不同的是，利玛窦拥有极高的汉语水平，这就使得在这些碎片信息当中也隐藏着一些十分重要的西方人的汉语观。

利玛窦著作当中的碎片信息体现了他对汉语各个方面的认识，其内容涉及：汉语发音、翻译释义、汉字、官话方言、通俗口语以及典雅书面语。对于这个时期的汉语研究来说，无论是这些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利玛窦最大的遗憾是，虽然他本人的汉语水平极高，但却并没有将自己掌握的内容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无论是险些佚失的《葡汉辞典》手稿、还是在《西字奇迹》中首次使用的利玛窦注音系统、抑或是回忆录以及书信集，都只是十分零散地记录了他的汉语知识、对汉语的观点、自己学习汉语的方法以及对于新教士学习汉语的建议。从利玛窦的各种著作以及他本人的汉语水平来看，他对上述这些话题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选择其中任何一个话题认真编纂一本著作出版，都能够让这个领域的研究前进至少几十年。然而，利玛窦并没有将这些内容认真编纂并且付梓，从而使这些知识只限定在了来华耶稣会士的圈子里，实属遗憾。

4.2 17 世纪中叶，卫匡国的《中国文法》

同为意大利籍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卫匡国，完成了利玛窦没有完成的工作：他撰写了一本汉语语法书。这本使用拉丁语编写的语法书《中国文法》，应该是在卫匡国本人学习汉语时所写的笔记基础之上整理而成。这是现存文献当中首次由西方人尝试解释汉语官话语法的书籍。卫匡国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在三个方面对汉语研究的看法，即汉字、汉语发音以及语法（词法）。关于汉字以及汉字的发音和注音，卫匡国相对前辈利玛窦而言，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

一方面，卫匡国对于汉字并没有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在发音和注音上，也基本使用了利玛窦的那套注音体系。唯一取得进步的就是，卫匡国在他的著作当中明确提出了注音系统的正音法，从而使每个汉字的读音更接近作者想象的读音，消除了异读的情况。当然，《中国文法》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其语法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文法》并不是第一本汉语语法书，甚至连第一本官话语法书都算不上。但由于早期多明我会士在菲律宾马尼拉编纂的语法书大都佚失，所以《中国文法》成为了现存的第一本汉语官话语法书，它首次尝试使用西方的词类框架来叙述汉语，同时提出了对于西方人认识汉语非常重要的两个观点，即汉语的不可屈折的属性以及单音节属性。加之此书在北欧学者中间广为流传，为汉语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为现存第一次使用西方词类框架来分析汉语官话的语法书，《中国文法》依然存在着如下两个缺点：首先，作者本人并没有在这本书上投入很大的精力，这点从作者其它几本著作的体量、深度以及系统性上就能反映出来。这就导致这本语法书的完成度相对较低。其次，尽管作者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区别（提出了汉语不可屈折以及单音节的特点），但他依旧使用西方词类框架来讲解汉语语法。西方词类框架所诞生的语法，其内核实质上是词法，而汉语当中则并没有词法的概念，作者将汉语放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框架之中。当然，这并不是卫匡国一个人才有的问题，自西方人开始编纂汉语语法书，一直到19世纪《汉文经纬》的出现，西方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方语言框架的影响。

4.3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

除了耶稣会的这条来华传教线路，多明我会也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学习和研究汉语，并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于17世纪末完成，18世纪初出版的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可谓是多明我会研究汉语语法的代表作。作为一本汉语教科书，其涵盖的内容相当丰富，包含了作者对汉语的看法、汉语的规律、学习汉语的方法、发音以及声调、语法（词法）、语用学知识、最后还附了一份《解罪手册》。

相较于利玛窦和卫匡国对汉语的研究，万济国其实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他在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几乎都是前人已经涉猎过的，而万济国也并没有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和革新。但万济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这些内容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本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汉语教科书，他将自己的知识倾囊传授给来华的教士们。万济国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这本《华语官话语法》，其它影响力较小的著作还有两本没有出版的汉语词典¹¹⁶，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汉语教育事业的热忱。另外十分重要的一点，便是这本书一度被认为是最早出版的西方人编撰的汉语语法研究著作，尽管最后证明最早的那本应该是卫匡国编写的《中国文法》，但据此可以推断，这本《华语官话语法》的流通与知名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文法》以及利玛窦的汉语研究著作。

但《华语官话语法》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作为一本系统整理和汇集了前人成果的作品，万济国本人的汉语观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尤其在语法（词法）的讲解方面，不仅延续了并不适合汉语的西方语言框架，更是生硬地将西方语法框架套在了汉语上面。并且由于作为教会新人传教士汉语教科书的这一属性过于明确，导致其中几乎只涉及汉语的基础知识，甚至连汉字都不曾出现在这本著作当中。

很明显，耶稣会和托钵修会之间，在汉语知识方面存在着相互传承以及相互借鉴的关系：耶稣会传教士发明的注音系统传承到了多明我会，而多明我会传教士对于词典编写的经验也为耶稣会所用。虽然两个教会的传教理念不同，但总的来说两方还是相互交流和进步的。但不同的传教理念最终还是导致了双方学习汉语方法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双方编纂的语法书也有着天壤之别。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传承关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西方语言学起源于古希腊，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德里亚学派的学者狄奥尼修斯·瑟拉克斯撰写了《语法术》，将希腊语的词类分为八大类，基本确定了屈折语的语言框架，从而让这种标准作为整个欧洲语言学的标准延续了下来。

随后，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开始编纂拉丁语教科书，尝试使用起源于古希腊的那套语法框架来介绍和讲解拉丁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其它语言的语法书

¹¹⁶ 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revised and edited by TakataTokio, 1995, p.45.

也相继出现，其中包括了内布利亚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但内布利亚的《语法书》依旧使用的是大约一千六百年前瑟拉克斯在书中提到的八大词类的分类方法，只是对此做了细微的调整，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瑟拉克斯的八大词类分别是：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内布利亚则将词分成了十类：名词、动词、分词、代词、介词、副词、感叹词、连词、动名词以及拉丁语中特殊的动词。也就是说，内布利亚的语法框架基本上完全沿用了瑟拉克斯的框架，只是鉴于拉丁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区别，稍微对框架内动词的分类进行了调整。

多明我会的第一本汉语语法书是由柯伯撰写的，由于柯伯卒于1592年至1593年前后，因此可以推测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更早；随后在1620年前后，《潮州语法》成书；紧接着1640-1641年，迪亚兹的那本不知其名的语法书写成；之后就是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中世纪时期，教育被分成了“七艺”，分别为语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数、几何、天文。这大概是多明我系列语法书大都喜欢用“Arte（西班牙语中的‘艺术’一词）”来作为书名的原因¹¹⁷）。在迪亚兹的语法书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之间，是耶稣会会士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虽然在此将时间顺序罗列了出来，但要确定这些书籍的传承关系依然十分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最早的两本多明我会的官话语法书已经失传。

因为第一本柯伯的语法书已经失传，所以不能够确定这本书是否受到了内布利亚或是瑟拉克斯的影响，以及这本书本身对后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按照时间顺序，《潮州语法》从其目录上来看，与瑟拉克斯以及内布利亚的框架相差相对较大，但是考虑到这本书和后来迪亚兹的那本语法书都是在菲律宾编纂完成的，因此可以推测迪亚兹有可能从《潮州语法》当中借鉴了一些东西。卫匡国的《中国文法》中的音标很有可能借鉴了迪亚兹的注音体系，而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卫匡国的语法书也比较符合瑟拉克斯和内布利亚的那套语法框架。加上卫匡国本人与欧洲不同国家的很多学者交往密切，所以很有可能《中国文法》从多明我会系统当中汲取了灵感。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相对来说就比较

¹¹⁷ 《华语官话语法》的直译应为《汉语官话的艺术》；《潮州语法》的直译应为《潮州话的艺术》；柯伯那本已经失传的汉语语法书的书名直译应为《中国话的艺术》。

清晰，因为书中提到了内布利亚语法的权威，此外，学者们对其内容进行的分析，也能够证明万济国的语法书继承了内布利亚的语法框架。

但无论是否继承了内布利亚的语法框架，上述的语法书毫无疑问都在尝试使用欧洲的语法体系来解释汉语。这种从希腊-拉丁语的视角来看待汉语的做法，难免会产生一些偏差，或者说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容易对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不太正确的归类。因此，无论是《中国文法》还是《华语官话语法》，都存在着作者在使用西方语言系统对汉语进行分析时，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现象。而针对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作者只能尽自己所能寻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干脆像万济国那样直接表示“学习中国人自己是怎么用的”。

4.4 18 世纪上半叶，马若瑟的《汉语札记》

随后，在 18 世纪上半叶，耶稣会的法籍教士马若瑟编纂出了《汉语札记》。作为一本汉语研究书籍，《汉语札记》的结构与卫匡国和万济国的著作大相径庭。马若瑟通过《汉语札记》表达了自己的汉语观，其最大特点是，希望舍弃前人那种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来讲解汉语的方式，从而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来进行分析。此外，他还发现汉语中没有“词法”的概念，而替代词法的则是汉语丰富的虚词以及语序。由于马若瑟本人的学术信仰，他还试图将他的信仰通过这本书传达给读者。由于上述原因，《汉语札记》中有相当大的篇幅都在讲解虚词和举例。除此之外，这也是第一次在一本语法书中如此详细地介绍了学习汉语的方法、将汉语的通俗口语以及典雅文言文分开进行讨论、讨论语用学相关的内容、讲解汉语修辞等等。

《汉语札记》的问题在于两点，第一是尽管马若瑟提出要根据汉语自己的特点来建立一套语法系统，但他最终还是在依赖西方的语言框架；第二便是尽管在书中涉及了相当多的话题，对很多话题也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整本书依旧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从《汉语札记》的内容以及涉及的学习方法可以看出，从利玛窦时期开始，耶稣会传教士的学习方式似乎就一直比较接近马若瑟的方式：通过阅读中国典籍以及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员交往。换句话说，笔者认为《汉语

札记》当中很大部分的内容和利玛窦当时的汉语观是相近的（例如语用学的知识、学习汉语的方法、对于通俗口语和书面语的认识、对于汉字的理解等等），只不过利玛窦没有整理编纂出一本这样的汉语研究著作。

4.5 汉语观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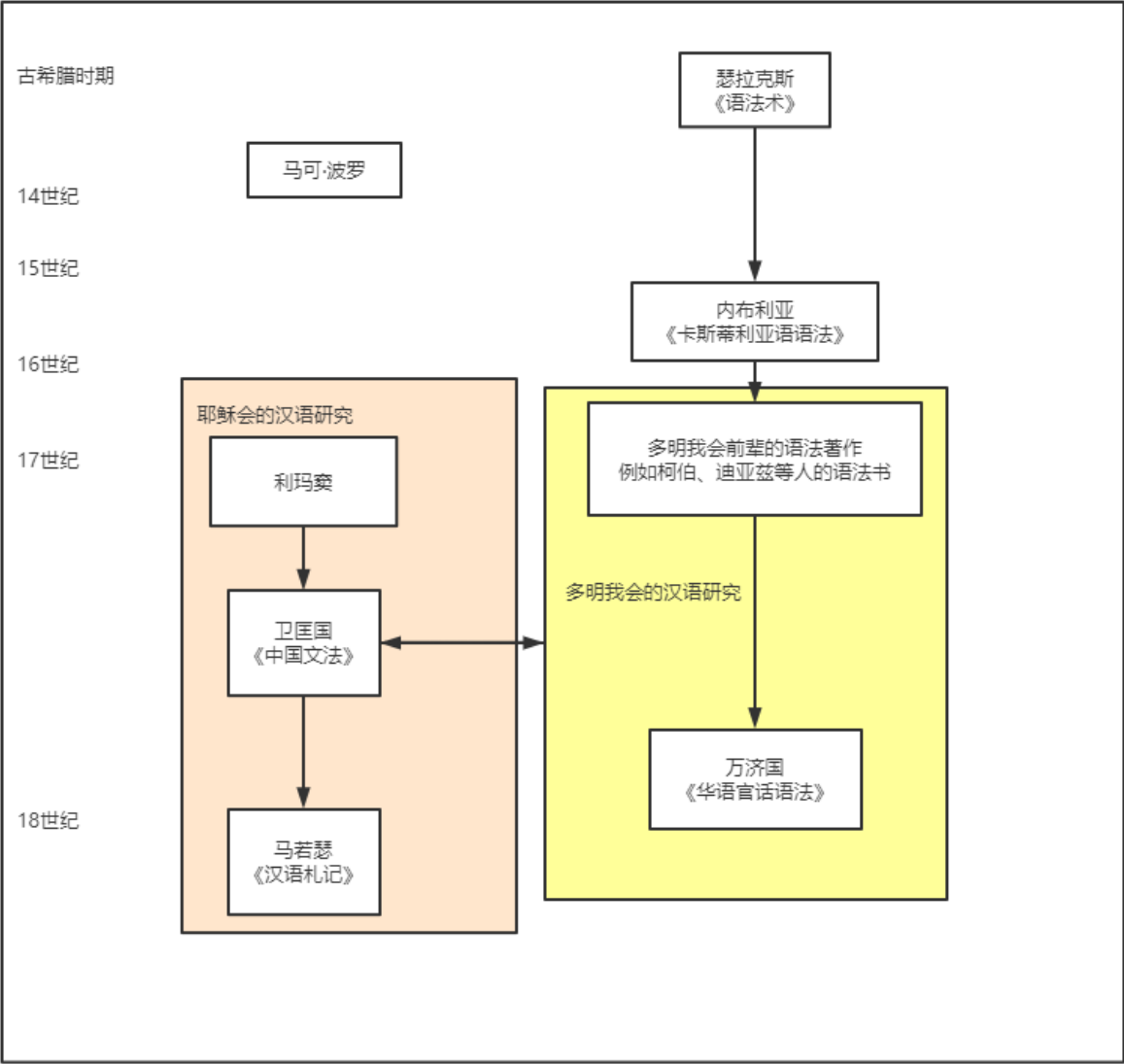


图 4-1 西方人汉语研究的传承关系图

西方人汉语观的发展与传承可以大致分为两条线路，分别是耶稣会的线路和托钵修会的线路。从古希腊开始，瑟拉克斯完成《语法术》，这标志着西方语法（词法）研究的开始。根据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中的记载，我们可以

很明确地了解多明我会汉语语法书的传承关系：最早古希腊瑟拉克斯在《语法术》当中将西方语言的词类分成八大类，随后内布利亚继承了这种通过词类描述语法的体系，并将其应用到了《卡斯蒂利亚语语法》当中。多明我会的教士们，受《卡斯蒂利亚语语法》的影响，继续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汉语，并且著书立传，为后人教士提供了参考。最后，万济国在多明我会前辈们的研究成果之上，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华语官话语法》。

相比托钵修会来说，耶稣会的传承关系就没有那么清晰了。

与利玛窦相比，卫匡国的汉语水平并没有那么好。在卫匡国的语法书当中，汉语词条的部分借鉴参考了多明我会迪亚兹的《汉西字汇》，换句话说，尽管不能够确定《中国文法》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多明我会的研究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卫匡国与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之间一定有汉语研究上的交流。而利玛窦和马若瑟所写的著作就更具有耶稣会的特色：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不断用中文进行写作，甚至用文言文著书，但并没有将自己对于汉语的种种想法和研究集结成书。马若瑟学习汉语的经历与利玛窦类似，因此可以认为，马若瑟是将那些汉语水平较高的耶稣会会士的汉语观进行归纳、总结、整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两条路线最大的区别在于，耶稣会更倾向于用中国人的视角和思路来看待汉语，即便是几乎完全照搬西方语言框架的卫匡国，在著作中也已经意识到了西方以词法为根基的语法并不适用于汉语。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会对于汉语的研究，虽然其研究方法更先进一些，但却鲜有人愿意下功夫完成一本专门针对西方人的汉语研究书籍；相反，托钵修会则更愿意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汉语的语法。这种视角的局限性导致了托钵修会在研究层面上落后于耶稣会，但是在编纂以西方人为阅读对象的汉语教学书籍时，则会投入更大的精力。

人物	汉语语法	发音声调	语用学知识	学习方法
利玛窦	只有涉及 对汉字的看法	提出这个问题 并几乎完美解决	浅谈了 口语与书面语 官话与方言	并未涉及
卫匡国	采用西方语言框架 认识到汉字不存在词 法	延续前人的系统	并未涉及	并未涉及
万济国	完全的西方语言框架	延续前人的系统	浅谈了 口语与书面语 官话与方言 和中国人交流	提供了明确的 方法论
马若瑟	提出要摆脱西方语言 框架，但是尚未实现	延续前人的系统	浅谈了 与中国人交流 文体风格修辞 深入讲解了 口语与书面语	提供了明确的 方法论

表 4-1 16、17 世纪西方人汉语观的发展表

从上图的表格可以看出，在西方人汉语观发展的过程当中，改变最大的便是西方人对于汉语语法的认识。其它的三个方面：1.发音声调，自从将罗明坚系统改进成利玛窦系统之后，后人几乎都在延用利玛窦系统或者根据利玛窦系统衍生出的金尼阁系统；2.语用学知识，其话题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多内容甚至是在马可·波罗时代就已经存在了；3.学习汉语的方式，无外乎阅读书籍以及与中国本地人交流两种。

所以西方人的汉语观发展基本上集中在了汉语语法上面。关于西方人研究汉语语法的发展和传承，笔者认为最好也分成耶稣会和托钵修会两条线路来分析。利玛窦尽管并没有书写任何关于汉语语法的书籍，但却为耶稣会奠定了一个阅读汉语经典以及以“字”为本学习汉语的总基调。而多明我会则从现存最早

的语法书籍¹¹⁸开始，就采用了西方的语言框架。当万济国完成《华语官话语法》的时候，多明我会已经把用西方语言框架描述汉语语法发展到了极致。卫匡国尽管从多明我会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也许是由于利玛窦奠定的基调，他在编纂《中国文法》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了汉语不存在“词变”的观点。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采用了以词法为根基的西方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语法。到了马若瑟，他已经明确提出汉语是靠词序以及虚词来决定句子的成分，而不像西方语言那样需要依靠词变。无论是卫匡国，还是马若瑟的主张都十分正确并且站在了西方汉语研究的前沿。然而遗憾的是，到这个时间点为止，依然没有西方人能够摆脱用西方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语法的禁锢。

¹¹⁸ 尽管并不能够确定最初的柯伯是用什么框架来分析的汉语，但是根据比《中国文法》还早完成的《潮州语法》，以及《华语官话语法》当中的叙述来看，柯伯也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语法的可能性极高。

第二部分

18、19 世纪发生在中国和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第五章 康乾盛世与丁种本《华夷译语》

第一部对于汉语的研究历史表明，几乎所有对汉语的研究都是由来华传教士完成的，而他们研究汉语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以耶稣会为例，为了进入尚未开垦的中国内陆，他们一方面努力与中国的上层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教的毕竟还是一般群众，所以传教士们还必须学习汉语，以便成功融入当时十分排外的中国社会；随后的各个修会亦是如此。尽管在中国礼仪上有所分歧，但教士们几乎都认同，想要在中国成功传教，学会汉语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西方人在这个阶段采取的一种“利用汉语实现文化输出”的策略。

中国与外族交流交往的传统由来已久。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传教士们的来华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但中国朝廷在这些交流中几乎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相较于西方将汉语知识都垄断在了教会内部，中国则把西方的语言知识都局限在了朝廷外交部门培养的翻译人才身上。与热衷于编纂汉语教科书和汉语研究书籍的西方人不同，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几乎没有编纂过任何有关西方语言的书籍。

清乾隆年间，乾隆帝打算启动重新编纂《华夷译语》的工程，于是他命令传教士协助编纂工作，并最终完成了一系列西方语言版本的《华夷译语》。西方语言版本的《华夷译语》系列，作为中国最早的西方语言教科书，对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套教科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于西方语言的了解程度。加之这部分的《华夷译语》是在传教士的协助下编纂而成的，因此，这些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的汉语观。下面，笔者首先对《华夷译语》系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5.1 《华夷译语》及其研究

元末明初，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境地。内部百废待兴，朝中依旧存在很多元朝的残余势力，外部周边的环境也动荡不安。此时，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便成为了明初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为了更好地了解元朝以及蒙古、女贞等周边民族的历史¹¹⁹，明朝廷十分注重外交翻译人才的培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洪武十五年（1382年）洪武帝命火源洁编撰蒙汉词典，于是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诞生了第一部《华夷译语》。此后，从永乐年间设立四夷馆直至清朝末期，会同馆和四夷馆（清朝由于忌讳“夷”一字，于是将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但从功能上来说，四夷馆和清四译馆一致）分别编纂了各种语言的对照词典，学界将这些词典统称为《华夷译语》。

乾隆年间，乾隆帝命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Joseph Bahr, 1706-1771）编纂《华夷译语》的欧洲语言版本。于是便诞生了六部“中文-西方欧洲语言”对照的词典。由于其扉页写着“西洋馆”三个字，后人习惯将这六本称为西洋馆《华夷译语》。存世6种，其中5种翻译较为准确，每种有20个门类，各收词2069至2071个，分别为《弗喇安西雅话》（即法语）、《额呼马尼雅话》（即德语）、《伊达礼雅话》（即意大利语）、《播呼都噶礼雅话》（即葡萄牙语）、《拉氏诺话》（即拉丁语）。此外还有1种《噶咭喇国译语》，记录英语，分20门类，收词734个。¹²⁰

关于其研究，由于《华夷译语》数量众多，分类复杂，但国内外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使用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4）的分类方法，将其细分为甲种本、乙种本、丙种本和丁种本四部分。

总的来说：

1. 甲种《华夷译语》指代的是明洪武十五年火源洁编纂并于洪武二十二年发行的《华夷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本，由于在洪武年间编纂，故称其为洪武本。内容由译语（杂字）以及来文两部分组成¹²¹。

¹¹⁹ 任萍，《明代四夷馆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¹²⁰ 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民族研究》，2008(2)，第51页。

¹²¹ 乌云高娃，《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载《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4期，第58-68页。

2. 乙种本则是在明永乐年间设置四夷馆之后，由四夷馆设立的分管进行编纂的。由于在永乐年间编纂，故称其为永乐本。共设十个分管，出版的译语共有十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语言。不同抄本很多¹²²。内容由杂字以及来文两部分组成。
3. 丙种本于明代由会同馆编纂。故称其为会同本。其语言不仅包含了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更是加入了朝鲜话、琉球话、日本语等东亚国家的语言。丙种本《华夷译语》只有杂字而没有来文。
4. 德国学者福克斯（Walter Fuchs, 1902-1979）发现了并不属于甲、乙、丙种本的《华夷译语》，并将其称为新《华夷译语》¹²³。后人便将这一套于清乾隆十三年由四译馆编纂的译语划分为丁种本¹²⁴。丁种本《华夷译语》除少数民族语言、东南亚以及东亚国家的语言外，还出现了六套欧洲语言的译语。丁种本均为杂字，没有来文。（表一）

	甲种本	乙种本	丙种本	丁种本
所指	洪武本	永乐本	会同本	四译本
杂字	有	有	有	有
来文	有	有	无	无
语种	只有蒙古语	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东南亚国家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东南亚国家语言、东亚国家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东南亚国家语言、东亚国家语言、欧洲国家语言

表 5-1 四种《华夷译语》对比表

前人对于甲乙丙种本译语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但是对于丁种本，尤其是丁种本西洋馆系列译语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将国内外学者对《华夷译语》系列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欧洲来华传教士以及

¹²²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2(1981)，第 57 页

¹²³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 8 页。

¹²⁴ 大友信一、木村晟，《日本館訳語》，东京洛文社，1968 年，第 37 页。

汉学家为代表的欧洲研究阶段；第二阶段则是 20 世纪初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的日本阶段；最后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出现《华夷译语》研究热潮的国内阶段。

- a) 第一阶段的欧洲阶段，其研究成果又可以细分成两类：第一类主要集中在对《华夷译语》当中番语的研究，另一类则是对四夷馆、会同馆等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东方学院”的研究。第一类对于书中具体番语的研究，始于德国汉学家葛禄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所著的《女真语言及其文字》¹²⁵。葛禄博在书中对《华夷译语》系列的《女真译语》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以此来推测研究古代的语音系统。此后，欧洲很多的语言学家以及汉学家，开始仿照葛禄博的做法，通过《华夷译语》来研究番语。第二类则是对《华夷译语》的编纂机构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所写的《中国的东方学院》¹²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的《四夷馆和会同馆》¹²⁷以及缪勒（Friedrich W. K. Mueller, 1863-1930）的《百夷和八百馆“华夷译语”词汇》¹²⁸等等。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初出现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相较于欧洲学者，日本学者们的研究普遍来说更加精细：他们学习并且具备了西方近代学术的理念和方法，同时又有传统东方学者挖掘利用古典汉籍的学术素养，这让日本学者们在这段时间对于《华夷译语》的研究超越了欧洲以及中国。在研究内容方面，他们认真地对《华夷译语》进行了详细的版本考察，并且将其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校对、分析和解释。在这个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是：石田干之助¹²⁹、西田龙雄（1928-2012）¹³⁰、小仓进平（1882-1944）等等。他们将《华夷

¹²⁵ Wilhelm Grub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896

¹²⁶ Friedrich Hirth, “The Chingese Central College”, *The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II, pp.203-224, 1887

¹²⁷ Paul Eugène Pelliot, *Le Sseu-yi-kouan et le Houei-t'ong-kouan*, *T'oungPao*, Vol.38, pp.207-290, 1948

¹²⁸ Friedrich W.K Mueller, “Vocabularien Der Pa-Yi-und Pah-Poh-Sprachen ‘Hua-I-Yi-Yii’”, *T'oungPao*, Vol. III, pp.1-38, 1892

¹²⁹ 石田干之助是一名日本历史学家和东洋学者，作为东洋文库的负责人，他扩大了文库的藏书并且加强了文库的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这些成为了日本人研究《华夷译语》的基础。

¹³⁰ 西田龙雄是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对于中国的番语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对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浓缩在了日本京都松香堂所出版的《華夷譯語研究叢書》系列当中，西田龙雄执笔了《西番館譯語の研究：チベット言語學序説》（1970）、《緬甸館譯語の研究：

译语》番语系列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第三阶段，随着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家罗福成（1884-1960）把国外的一些抄本带回了国内，中国开始掀起研究《华夷译语》的高潮，其契机是，在国内的研究初期，由于《华夷译语》系列原本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与国外的研究，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华夷译语》的概述性研究较多，而缺少系统性研究¹³¹。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国学术研究的逐步发展，才相继出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就来说，几乎都集中在了番语的研究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孙宏开先生对于《西番译语》的研究¹³²。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最早对《华夷译语》进行研究的欧洲学者，还是拥有最丰富一手资源的中国学者以及对《华夷译语》的研究贡献极大的日本学者们，都将重点放在了汉语-少数民族语言或是汉语-亚洲语言的译语上面。而对于西洋馆系列的研究大都处于简单介绍的阶段。近十年来，西洋馆译语系列中，除对英语译语《啖咕喇国译语》有着相对来说较多的研究外（这里的较多，是与其它西洋馆译语比较的结果。如果与番语译语相比的话，《啖咕喇国译语》的研究成果数量以及深入程度都与之相距甚远）、对葡萄牙语译语《播呼都噶礼雅话》有着零星的研究以外，学界对于其它几本西洋馆译语的研究基本为零。其原因很可能是以前六本西洋馆译语只有抄本存于故宫，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便于获取，直至2018年4月这些译本出版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笔者希望用这篇论文的这一部分来填补一点拉丁语译语《拉氏诺话》研究的空缺，同时抛砖引玉，让更多的研究者重视这套已经由故宫博物院出版社出版的《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

ピルマ言語學序説》（1972）、《多續譯語の研究：新言語トス語の構造と系統》（1973）、《倭羅譯語の研究：口口語の構造と系統》（1979）、《白馬譯語の研究：白馬語の構造と系統》（1990）五册（按时间顺序排列）。西田龙雄在这五册书中，根据他多年研究中国番语的经验，对这些语言的读音、书写、释义等等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讲解。

¹³¹ 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54页。

¹³²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白滨、金史波、卢勋、高文德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孙宏开，《〈西番译语〉再考》，《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2002年

5.2 《拉氏诺话》的基本情况以及中文书名考察

本文主要对西洋馆中的《拉氏诺话》进行研究，其基本情况如下：现存的《拉氏诺话》一共有5册，线装。封底通为兰色，五册书名均为“拉氏诺话”四字，均题写在封底的白色贴页上端。全书按顺序分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等20门，一共收录了2071个拉-汉对译词汇。其中，各门分类情况依次如下：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采色门；身体门；人物门；器用门；宫殿门；饮食门；衣服门；方隅门；经部门；珍宝门；文史门；鸟兽门；数目门；通用门；香药门；花木门；人事门¹³³。在编撰形式上，该词典由拉丁语原词、对译汉语词、以及用汉字注出的拉丁语发音合构而成。拉丁语词以易于辨认的手写体写出，下面的对译汉字词为楷书。这种分类以及编纂方式，和意、德、法、葡等其他西洋馆译语基本相同。由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在学习《西番译语》后，下令按照《西番译语》的编纂方式进行编纂，这很显然是执行乾隆御令的结果。

《华夷译语》六本西洋馆书籍标题的名字分别为《弗喇安西雅话》、《额呼马尼雅话》、《伊达礼雅话》、《播呼都噶礼雅话》、《拉氏诺话》以及《啖咭喇国译语》。从中可以看出编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来翻译不同国家的名称，加上“话”一字使其书题成为“XXX话”。而在英语的情况下使用的是“译语”一词。由于西洋馆除英语的五部均为传教士所编¹³⁴，英语则是由广东地区的中国人编写而成。鉴于其特殊性，在本文当中不对英语的《啖咭喇国译语》进行讨论。

接下来笔者将探索西洋馆书题究竟源自何处。

有学者指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西洋馆译语的书题均来自拉丁语¹³⁵。

¹³³ 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第51页。

¹³⁴ 福克司，《魏继晋司铎首创德华字典》，《中德学志》，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7月。

¹³⁵ 聂大昕，《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文献》，2016年11月第6期，第169页。

	法语	德语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拉丁语
额呼马尼雅	Allemagne	Deutschland	Alemanha	Germania	Germania
弗喇安西雅	France	Frankreich	Franca	Francia	Francia
伊达礼雅	Italie	Italien	Italia	Italia	Italia
播呼都噶礼雅	Portugal	Portugal	Portugal	Portogallo	Portugallia
拉氏诺	Latine	Latein	Latino	Latino	Latina

表 5-2 西洋馆书名考察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法、德、葡、意四馆的译语确实是根据拉丁语音译而成。但是只有《拉氏诺话》这本书的书题相对较为特殊。笔者在上文提及过，其余的几本西洋馆译语均采用了“国家名+‘话’”的命名方式，但是很显然拉丁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在拉丁语当中，“拉丁语”一词的拼写为“Latina”，发音为“拉氏娜”。由于最后一个音节与标题的“拉氏诺”不同，所以可以断定《拉氏诺话》中的“拉氏诺”并不是拉丁语当中的“拉丁语”（Latina）。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屈折语的词尾变化所致，即：将《拉氏诺话》视为一部辞典，修饰中性名词“Lexicon”（即拉丁语的“辞典”一词）的“Latina”变化成了“Latinum”。由于汉语官话没有鼻化元音韵母，于是将“num”写作“诺”¹³⁶。然而笔者并不十分赞同此观点。由于《拉氏诺话》采用的是相对严谨的注音系统（笔者将会在下文指出），通过对照可以得出，如果西文文字为“Latinum”的话，中文的音译应该为“拉氏努穆（穆为小字）”，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么，“拉氏诺”的书题究竟源自何处？笔者进行了如下猜测：拉丁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书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理藩援奉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恣可信，罗刹着徐日昇去，会喇第诺文字，其文妥当，汝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刹。”¹³⁷葡萄牙语以及意大利语的拉丁语一词均为“Latino”，可以推断，康熙年间出现的“喇第诺”应该是根据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

¹³⁶ 聂大昕，《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文献》，2016年11月第6期，第170页。

¹³⁷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0页。

“Latino”一词音译的结果。根据西洋馆《华夷译语》当中的音译法，葡萄牙语以及意大利语的“la”音节译作“拉”，“di”和“ti”均译为“氏”，“no”译为“诺”。

“Latino”与“拉氏诺”完美对应了起来。既然在康熙年间，已经将拉丁语称为“喇第诺文字”了，那么在乾隆年间开始编纂的西洋馆系列的《华夷译语》，其标题很可能是延续了康熙年间的发音，但是采取了一套不同的音译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西洋馆译语《拉氏诺话》的题目是从“Latino”音译而成。由于拉丁语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通用语言，因此可以推测“Latino”一词很有可能来自意大利或者葡萄牙的来华传教士。所以《华夷译语》当中的题目“拉氏诺”并不是来自拉丁语，而很可能是由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译成的。

5.4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拉氏诺话》的分析

本篇论文研究的是 18、19 世纪意大利的汉语研究对语言学的推进作用。这些汉语研究一方面推动了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人对于汉语以及西方语言的研究。笔者所分析的《华夷译语·拉氏诺话》毫无疑问是西方传教士协助清政府所编纂的西方语言教科书，在这本“中西合作”编纂完成的教科书中，反映出了很多问题。

《华夷译语》最早不是作为词典，而是作为朝廷用来培养翻译外交人才的教科书而编纂的。作为明代四夷馆的以及清代四译馆的教材，《华夷译语》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乾隆皇帝是在通过《西番译语》学习番语时提出重新编纂全套《华夷译语》的，据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前人还是乾隆帝，都想把《华夷译语》作为语言教科书来进行编纂。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教科书和教师的质量都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效果的好坏。接下来，本文将对《拉氏诺话》进行分析，探索这本教科书的优点和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套书尽管是作为教科书来进行编纂的，但它实际上能不能成为一套教科书，换句话说，它能否教会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掌握拉丁语。

首先，笔者选取了在学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语言知识分类法，将语言知识分成四个领域，即语义学、句法学、音位学以及语用学¹³⁸。这四个领域分别对

¹³⁸ D.W.Carroll, *Psychology of Language*, 4th Edition, Thomson Learning, 2004, p.4

应着和语言相关的不同知识：语义学知识用来处理语言词汇以及句子的涵义；句法学知识负责语法：如何组合词以及句子；音位学知识则关注语言的发音系统，分析此种语言如何发音；最后的语用知识学则与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社会知识相关。换句话说，想学习并且掌握一门语言的话，这四个方面的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参照本论文第一部关于传教士编纂的汉语教科书，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教科书对应了上述一个或者数个领域的内容。然而很明显，《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作为语言的教科书，并没有完全顾及以上这四个方面。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并不能够掌握其对应的语言。接下来，笔者将对西洋馆系列涉及的语义学、句法学、音位学以及语用学的知识情况进行分析。由于《拉氏诺话》只有杂字而没有来文部分，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只有文字的对照以及外文的注音，所以本文只能将分析的侧重点放在音位学以及语义学上了。

（1）音位学：注音体系分析

《拉氏诺话》采用了从第一本《华夷译语》开始沿用下来的注音方式：利用汉字来注外语的音¹³⁹。这种注音方法共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汉字，在图 5-1 的汉字为“斗”，即北斗七星的意思；第二部分为拉丁语的翻译，图中为“ursa minor”，为小熊星座；最后便是汉字注音的部分了，这里的汉字注音将单词分解成音节，然后每个音节对应了一个汉字来进行注音。

¹³⁹ 这种注音的传统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后汉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利用汉字发音来注解发音的方式。中国传统的注音方式可以分成读若法、直音法以及魏晋出现的反切法三种。和字面上的意思相同，读若法是指寻找与目标读音相近的汉字来表示读音；直音法是寻找与目标读音相同汉字的读音；反切法是使用第一个字的头音加上第二个字的韵母而组合成的读音。

西洋馆《华夷译语》的注音方式以读若法和反切法为主。



图 5-1

笔者对《华夷译语·拉氏诺话》全本所有出现过的注音进行了总结。对其进行分析之后归纳出了以下特点：

1. 相对严谨的注音体系：全本《拉氏诺话》遵循着相对严谨的注音体系，也就是说，一个拉丁语的音节将对应一个汉字，而这种对应关系在整本书当中是大致相对固定的。
 - 1) 大致固定，而不是完全固定，也就是说在书中出现了很多次一个音节对应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注音的情况，比如“an”这个音节，书中有将其注音为“安”的情况，也有着将其注音为“昂”的情况。而这种一个音节对应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注音的情况，很少发生在经常出现的音节上，比如以“b”为辅音，“aiueo”为元音的音节，在书中出现了很多次，但并没有出现一音节多注音的情况；相比经常出现的音节，出现次数少的音节，一音节多注音状况出现的频率相对来说会多一些。笔者推测，本书的编者一开始的确想让整本字典的音译系统遵照十分严谨的注音体系，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注音，但由于不同的音节众多，编者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导致编者在对待很少出现的音节时，并不能够确定这个音节是否已经有固定的发音

了。

- 2) 另外，书中也出现了多个音节对应同一种注音（同一个汉字）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十分正常。用中文标注拉丁语的发音，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奈妥协的做法。所以中文注音和拉丁语本身音节的读音之间就有着一定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尽管拉丁语是不同的发音，但是并不能够找到两个不同的汉字来分别进行注音，于是两个音节就对应了同一个汉字。详细的例子笔者将在下文中列出。

2. 元音以及辅音：大多数语言的音素都可以分成两部分，即元音以及辅音，拉丁语亦然。总的来说，元音是指发音时不受到发音器官的阻碍而发出的声音，而辅音则是指代在发音时受到发音器官阻碍而发出的声音。

- 1) 拉丁语中，可以将元音分成两类，一类为单元音（vowels），另一类则为双元音（diphthongs），无论是单元音还是双元音，由于在拉丁语的发音中，都为一个音节，所以在《拉氏诺话》中，编者找到了与这个元音发音相近的汉字来对其进行注音。拉丁语的单元音包含一般语言常见的五个元音，a、i、u、e、o，加上一个在其他语言当中并不常见的 y。然而，拉丁语区别于其它语言的地方在于，六个元音均有长短音之分。在元音上面标记横线则为长音，没有任何标记则为短音。在《拉氏诺话》的发音当中，并不区分长音以及短音，所有的单元音均采用短音的标记方法。关于双元音，拉丁语当中存在 ae、oe、ei、au、eu、ui 共计六种。在《拉氏诺话》当中，编者将 ae 两个字母缩到了一起，其发音注音与单元音的 e 基本相同。然后便是 au 和 eu，由于 au 在拉丁语当中的发音与汉语拼音的 ao 很像，eu 在拉丁语当中的发音与汉语拼音的 ou 类似，所以在《拉氏诺话》中，将 au 的发音标注为“傲”，eu 的发音标注为“欧”。剩下的双元音多采用分开注音的方法，即 ui 的注音为 u 的注音加上 i 的注音。
- 2) 拉丁语的辅音共有 24 种，《拉氏诺话》中基本上将辅音的发音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辅音加元音的组合；第二类则是单个的辅音。第一种情况，即一个辅音加上一个元音的组合：由于根据拉丁语的读

音规则，这种组合能够成为一个音节，《拉氏诺话》便找到了一个与这个音节发音相近的汉字来为这个音节注音，其书写方式与元音的注音相同。第二种情况，即单独出现辅音时，由于单独出现的辅音就能作为一个音节，所以编者便找到了一个与这个音节发音相近的汉字来进行注音。单个辅音的发音一般来说是单纯舌头的发音，而不会带来声带的震动，编者在这种情况下，将与这个音节发音相似的汉字用小字标记出来，以便学习者能够分辨出单个辅音抑或辅音元音的组合的不同发音。

3. 清辅音以及浊辅音：在不同的语言当中，人们称发音时声带震动的辅音为浊辅音，而称发音时声带不震动的辅音为清辅音。在拉丁语当中，字母 **b** 与 **p** 的发音以及字母 **d** 与 **t** 的发音都是不一样的：前者为浊音，后者为清音，即在发 **b** 以及 **d** 音时声带振动，而在发 **p** 与 **t** 时则不震动。然而在汉语中，却并没有采用清浊音，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区别这两对发音——送气音以及不送气音。在汉语拼音当中，**b**、**p**、**d**、**t** 均为清

	b	d	p	t
a	巴	达	巴	达
e	伯	德	伯	德
i	毕	氏	毕	氏
o	博	多	博	多
u	补	都	补	都

表 5-3 《拉氏诺话》清音浊音注音表

音，其区别在于送气与不送气：**b**、**d** 为不送气；**p**、**t** 为送气。这样的区别使得编者并不能够使用中文的注音来区分出拉丁语的清音和浊音。毕竟“夏虫不可以语冰”，所以，《拉氏诺话》采用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方法，即完全不理睬清音浊音，一律按照清音来进行标注。从整理出来的发音列表中，可以看出 **b** 列的注音与 **p** 列完全一致；**d** 列的注音与 **t** 列完全一致。

4. 元音之后的“**n**”：在拉丁语当中，元音之后，**n** 的发音为 **/n/**。这样的发音与汉语当中的前鼻音十分相像，于是编者便采用了汉语的前鼻音读音汉字来对 **n** 进行注音。如表格所示，这样的注音方式很清晰明了地对这样的字母组合进行了注释。但是，这样的注音方式却有着自己的一些缺

陷。因为很多时候，并不能够找出和元音加 n 这样的组合发音相似的中文，所以编者用了两种方式为元音与 n 的组合进行注音。在第一种情况下，编者能够找到和元音与 n 组合发音相近的中文，便用其进行注音，例如：“ven”（图 5-2）在拉丁语中的发音与中文的“文”相对接近，于是编者便将“ven”这个音节注音为“文”，再比如“fun”（图 5-3）这个音节在拉丁语当中与中文“冯”的发音相似，于是编者便将“fun”注为“冯”，以此类推。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对应的中文，所以在第二种情况下，编者采取了一种聪明的方法，即将音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 n 前面，一部分为 n。n 前面部分按照之前所说的注音规则进行注音，然后将 n 注为“安”，之后将两个汉字缩成一个字便完成了注音。比如，“ten”注音为“te”的“德”以及“n”的“安”，缩合后变成了如图所示的“德安”。这里使用的注音方法很像中国传统的反切法。



图 5-2



图 5-3

5. 利用拉丁语来为中文注音：在《拉氏诺话》当中出现了极少数的利用拉丁语来为中文注音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这个词语本身来源于中文，翻译成拉丁语则采用了最简单的音译方式。比如“人参”一词，拉丁语的翻译为“ginxen”，按照这本词典的发音规则来说，应该将其发音标注为“因克参”，然而有趣的是，编者直接将其读音标注为了“人参”。也就是说，本身“ginxen”一词便是拉丁语“人参”一词的音译，再回

译的过程当中，编者没有选择“因克参”，而是使用了原本“人参”的发音，颇有一种从中文来的单词，读音要回归到中文去的意味。



图 5-4



图 5-5

6. 明显的注音错误：在《拉氏诺话》当中，编者在编写的过程当中犯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明显的错误。其原因可能是缺乏认真的校对所致。注音错误一般来说是能够明显看出来的。举例来说，第一册当中“温和”一词的拉丁语为“temperarum”（图 5-4），对其注音为“德穆伯哩叶斯”，很明显前半部分“tempe”的注音没有问题，但是后面的“rarum”部分应为“喇噜穆”，这样的错误在整本词典当中还有几次。这样的错误很明显是笔误，或者与其它的某些单词看混了。

通过以上对《拉氏诺话》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拉氏诺话》采用的是一种创新的给欧洲语言注音的方式。《华夷译语》的西洋馆系列延续了整个系列最早使用的注音方法：利用汉字给外文注音。从明初开始，四夷馆将这种注音方式应用到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典当中，随后又应用到了亚洲语言的字典中去，直到乾隆年间编纂西洋馆《华夷译语》系列的时候又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了欧洲语言中去。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能够

让知晓中文发音的国人尝试发出欧洲语言单词的音。

其次，其存在着系统因素上的不足：由于两种语言（中文以及某种欧洲语言）的音节发音相差甚远，所以这种注音方式并不是一种十分科学的、确实有效的教科书的注音方式。从之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编者确实是花了一番心思来整理、构思并且决定注音方式的，但是这种系统本身的缺陷导致了无论注音方式如何巧妙，利用中文汉字的发音，永远也无法将拉丁语的发音完全标注出来，反之亦然。

最后，它还存在着非系统因素上的不足：《拉氏诺话》共五册，收录的单词超过两千个，不同的发音以及对应的汉字更是有数百个之多。在清朝乾隆年间，在人力、物力和技术均受限的情况下，导致了一些注音的错误以及汉字注音系统不够严谨等一系列的问题。

《拉氏诺话》对拉丁语进行了注音，旨在让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拉丁语的读音。尽管如上所说，这部书籍的注音系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是否存在音位学的知识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人学习拉丁语的发音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学习《拉氏诺话》，尽管最后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但学生确实能够掌握拉丁语的发音。

（2）语义学：与释义相关的研究

无论是作为教科书还是字典，《拉氏诺话》当中都存在着释义系统。这样的释义系统也是从甲种本《华夷译语》传承下来的。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这是一套“中外词汇对照集”，而不是“外中词汇对照集”：西洋馆系列采用的都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的释义系统。由于乾隆帝在学习《西番译语》的时候，认为其编纂精细、分门别类呈系统化，于是命人以《西番译语》为蓝本修纂以前编过的《华夷译语》，并以西番译语为蓝本编纂新的华夷译语¹⁴⁰。这就导致了西洋馆六部译语的释义均是从中文翻译到了外文。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系列的“外-中”字典，而是“中-外”字典。这种编纂方式带来的弊端是：所有的词汇以及释义都是以中文为视角出发的。尽管中外语言之间进行了交流，但

¹⁴⁰ 《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八）》，卷 369，“乾隆十五年七月”，台北：华文书局，1969，p5562

是作为西洋馆系列的《华夷译语》却没有从外语当中学习吸收到任何东西。举例来说，西洋馆系列中的时令门有关于报时相关词汇的翻译，中文部分均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子丑寅卯”时辰的报时方式，而非小时制。然后将时辰报时的方式十分生硬地翻译成了外文。这样的编纂方式使得清政府不仅拒绝了国外的词汇，也将国外的各种文化以及技术挡在了门外。

其次，《华夷译语》使用了一词对一词的释义系统：在《华夷译语》的编纂过程中，从甲种本开始，始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即两种语言的词汇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够一一对应的。一种语言的一个词汇对应另一种语言的很多词汇是十分常见的。如果将这种对应关系限定在一对一之中，势必会引起一些歧义或者解释不清的情况。

第三，西洋馆系列从整体来说存在着对应语言系统的局限性。人类的语言系统一般可以分为屈折语、黏着语以及孤立语三种。一般来说，我们将中文看作孤立语；日语、韩语等等看作黏着语；并将大多数欧洲语言视为屈折语。一旦语言需要发生屈折，那么除去需要学习单词本身的涵义之外，还需要学习其变位、变格等等。而在孤立语当中则不需要学习这样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可以称其为词法）。也就是说，在《拉氏诺话》当中，尽管我们能够将每一个拉丁语词与中文对应起来，但是由于缺少词法的相关知识，《拉氏诺话》提供的信息并不能够让我们了解拉丁语词组的确实涵义。

综上所述，《拉氏诺话》采用了一套尽管有些问题但是依然能够用来释义的系统。但由于缺乏对屈折语的认识，因此《拉氏诺话》不管是作为教科书还是词典，都不能给予读者了解一个词的足够的信息。

（3）句法学以及语用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拉氏诺话》完全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句法学以及语用学方面的知识。在甲种本和乙种本的译语当中，除了中外文对照的词汇（我们称其为“杂字”），还有中外文对照的文章（也就是所谓的“来文”）；但是在丙种本以及丁种本的《译语》中，则取消了这些文章，致使其完全没有任何涉及句法学以及语用学的知识。

5.4 结论

德国传教士魏继晋主持编纂的五本西洋馆《华夷译语》作为清政府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教材，无疑在中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上文对于《华夷译语-拉氏诺话》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拉氏诺话》作为一本教科书在音位学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确实能够教会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拉丁语的发音，但它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表现在在语义学方面，由于缺乏对屈折语的认识，《拉氏诺话》延续了《华夷译语》系列的编纂方式，从而使这本教科书只有词义，而缺乏和词法相关的内容；在句法学和语用学方面，只有“杂字”的《拉氏诺话》没有涉及任何与句法以及语用相关的内容。所以总的来说，如果《拉氏诺话》以“教会别人拉丁语”为目标的话，其记载并且教授的知识体系是有很大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导致了学习者构建的语言体系不够完整，从而无法真正学会并掌握这一门语言。

本文通过下列表格，将《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的编纂方式与本文在第一部介绍的传教士编纂的汉语教科书进行比较：

书名	时期	语义学	句法学	音位学	语用学
利玛窦、罗明坚 《葡汉辞典》	16 世纪末	简单的词 汇对应	无	没有声调的 注音	无
卫匡国 《中国文法》	17 世纪初	简单的语 法和词义	简单的西方 语法框架	使用拉丁字 母的注音	无
万济国 《华语官话语法》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	相对复杂 一点的语 法和词义	完整的西方 语法框架	使用拉丁字 母的注音	与中国人交流 的注意事项
马若瑟 《汉语札记》	18 世纪上 半叶	很复杂的 语法和词 义解释	西方语法框 架与汉语虚 字实字结合	使用拉丁字 母的注音	与中国人的交 流，撰写文章 的注意事项
西方传教士编纂 《华夷译语》 西洋馆系列	乾隆年间 (18 世纪 后半叶)	简单的词 汇对应	无	利用汉字直 音法、反切 法等注音	无

表 5-4 《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与西方汉语教科书比较

《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与之前传教士所编纂的汉语课本，两者虽同为西方传教士所编纂，但其编纂目的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旨在教授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而以往传教士所编纂的课本则是以教西方人学习汉语为目的。此外，《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是传教士们受命于清朝廷的产物，其编纂方式和内容则和《华夷译语》系列一脉相承：就编纂方式而言，全书共分成三个部分，即番语（外语）原文、汉语解释以及使用汉字的注音；而内容方面则完全按照门类对词汇进行分类，从而使这本西方语言教科书类似于一本中-外分类词典。

从以上对《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和传教士编纂的汉语教科书对比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尽管《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的编纂时间为 18 世纪的后半叶，但其所涉及的知识，基本没有超出 16 世纪末利玛窦、罗明坚编纂的《葡汉辞典》的范围，里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词汇对应以及相对初步的注音系统。在编纂《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的时候，传教士们对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法、发音和语用上的差别其实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关于这点，具体可以参照本文第一部对 18 世纪上半叶马若瑟编纂的《汉语札记》的分析。也就是说，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人对汉语的研究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中国对于西方语言的认识却还停留在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对应上面。诚然，《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在编纂观念上的落后并不代表中国翻译人才水平的低下，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朝廷的记录都表明，四夷馆培养的翻译人才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能够较为出色地完成翻译工作。但毋庸置疑的是，当时中国对西方语言的认识与西方对汉语的认识相比，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关这点将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做详细的说明。

以上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华夷译语·拉氏诺话》进行了简单分析，但这种微观层面的分析，对于《华夷译语》西洋馆这一系列的词典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加深这方面的研究。纵向来说，西洋馆译语的五本书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外词典，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对 16 到 19 世纪的中外词典和汉语教科书，包括其注音方式、词类选择和语法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就横向而言，除了拉丁语的《拉氏诺话》以外，还

有四本魏继晋主持编纂的词典，此外，《啖咭喇国译语》在注音和选词方面和其余的西洋馆译语相比，也大相径庭，但碍于篇幅所限，本论文将无法具体叙述这些内容。

第六章 马国贤及其对汉语在欧洲传播所做出的贡献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探讨了西方人对汉语研究的开始及其发展。马可·波罗最早将有关中国以及汉语的知识带回了西方，16世纪末耶稣会以澳门为据点进入中国内陆，预示着汉语研究的正式开始。经过上文所提到的耶稣会的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马若瑟以及多明我会的柯伯、迪亚兹、万济国等传教士的共同努力，对汉语的发音、语法以及学习方式和语用学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则是这个时期的巅峰之作。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尽管不同身份和国籍的汉语研究者们写出了许多著作，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是《汉语札记》的延伸。

《汉语札记》的核心观点是，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是不合适的，需要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发展一套新的系统。马若瑟认为，汉语替代西方语言“词法”的核心部分是虚词，正如他在《汉语札记》中提到的：

汉语里这些语法概念与欧洲语言固有的概念还是有差别的。如汉语里的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而引起的词尾变化，只能借助特定的虚词¹⁴¹。

但马若瑟也只是提出了不能使用西方语法框架来描述汉语而已。尽管马若瑟提出的以虚词为核心的观点确实切中了汉语与西方语言不同的要处，《汉语札记》中也使用了大量的汉语经典作为例证来讲解各种汉语现象，但他在讲解汉语语法的时候，最终并没有跳出希腊—拉丁语八大词类的分类方式。

在马若瑟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出现了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的《中国言法》（1814）、法国汉学家雷穆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 1788-1832）的《汉文启蒙》（1822）以及同为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所编写的《汉文指南》（1866）等书

¹⁴¹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1页

籍。然而和马若瑟相比，这些著作中有关汉语语法的核心思想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马若瑟认为，实现西文“词法”的关键因素是汉语的虚词，因此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解虚词，但最终并没有摆脱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的禁锢；马若瑟之后的三位作者，则将关注的重点从汉语虚词转到了汉语的词序，他们认为，汉语词语的位置是汉语的核心，通过改变词语的位置可以实现西方语言“词法”所达成的效果，但他们最终却依旧使用西方语言词类的分类方法来讲解汉语。

总体而言，在马若瑟之前，西方人对汉语的研究成果呈现的是一个不断突破的态势；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则达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巅峰，，但之后直到德国人甲柏连孜（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编纂出《汉文经纬》为止（有关《汉文经纬》相关的内容本文将在第三部进行分析），期间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另外，在此期间还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是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冲突愈演愈烈。利玛窦在中国开始传教的时候，就埋下了礼仪之争的祸根；随后，在耶稣会内部出现了以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 1559-1654）为代表的中国礼仪反对派；之后，以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为代表的多明我会开始向教廷报告耶稣会默许中国礼仪的行为；最终，教皇在 18 世纪初发布了禁约，而随着康熙皇帝颁布禁教令并发行传教票，这场有关礼仪之争的冲突达到了高潮。这场争论的不断升级，也给中西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其次，当时西方有关汉语的知识都被教会所垄断。除了教会之外，只有少部分对东方感兴趣的西方学者有机会从来华传教士编纂的书籍当中获得一点和汉语相关的知识，而普通人则几乎没有接触这些著作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汉语知识在西方的传播。上述三个问题，随着一名传信部传教士的来华，基本得到了解决：他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

6.1 先行研究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马国贤以及他建立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的研究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

内对于马国贤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虽然谈不上硕果累累，但也产生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成就。由于马国贤是采用日记的形式，用意大利语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与创办中国书院相关的事宜记录下来的，能读懂意大利语的西方学者们便能够将其作为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和发掘，所以西方（尤其是意大利）学者对于马国贤和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相较国内学者更加丰硕一些。这些研究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十分广泛，其中有与马国贤的生平相关的研究，与其艺术成就相关的研究，与其传教活动相关的研究，与其创立的中国书院相关的研究，以及对马国贤及其书院为中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的研究等等。

如果根据研究者们能够获得的原始文献来进行划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根据原始资料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研究方向的不同。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研究者，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马国贤的日记，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生平以及他回到意大利之后创办的中国书院；而国内的研究者相对而言则更容易获取马国贤在华期间的相关文献，以及他作为清朝的宫廷画师所创作的各种画作，因此，他们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马国贤作整体研究的并不多。

6.1.1 国外的研究情况

在上文中我曾提及过，由于西方的学者们（尤其是意大利的学者）相对来说更容易接触到马国贤所著的原始文献，并且能够更轻松地从中获取相关的信息，因此无论是在原始资料的整理还是研究成果的体现方面，他们都比国内学者更胜一筹。他们的著作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马国贤的日记，通过对其进行整理甚至是删减，最后出版成书；另一部分则是相关研究的论文集。

经后人整理成书的日记共有三种版本：《教堂会众以及中国书院的创建史》

（三卷本），¹⁴²《日记》（两卷本），¹⁴³以及《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清宫十三年》。¹⁴⁴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版本的日记内容是一致的，均为马国贤本人的日记，只是由不同的人整理出版而已。第一种《教堂会众以及中国书院的创建史》是将马国贤的日记整理成册，并没有加入过多的注解或者对其进行删减。两卷本的《日记》则是由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研究马国贤的权威学者法蒂卡（Michele Fatica）教授整理而成的。为了方便现代读者的理解，法蒂卡教授在书中加入了很多的注释以及相关材料。法蒂卡本人是马国贤研究专家，因此这部《日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最后一种《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清宫十三年》则是由普兰迪（Fortunato Prandi）从马国贤的日记当中挑选了其在中国十三年的相关段略，并将之翻译成了英文。由于译者想将此书编纂成类似《马可·波罗游记》类型的冒险记，所以有着相当程度的删减甚至是改写，此书于2002年出版。这本书也是国内研究者参考较多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的原本。¹⁴⁵

最为集中论述中国书院以及马国贤对汉语在意大利的传播所做出贡献的一本论文集当属《马国贤和中国书院（1682-1869）》了。¹⁴⁶此论文集由法蒂卡教授主编，2006年在那不勒斯出版。本书收录了和马国贤以及中国书院相关的论文，以及珍贵的图像资料。论文一共7篇，所涉猎的题材相当广泛：包括对马国贤在华期间画作的研究、对中国书院学生的生活研究、对中国书院的学生蔡若祥（1739-1806）的研究等等。此论文集的后半部分为资料，收入了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了八个阶段的各种图像资料，从马国贤的日记插图到中国书院的教材

¹⁴² Matteo Ripa,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C. scritta dallo stesson fondatore Matteo Ripa e de' viaggi da lui fatti, Tomo II, dallo stabilimento della Scuola in Pekin fino alla solenne apertura di quest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in Napoli*, Napoli: Napoli dalla Tipografia Manfredi, 1832

¹⁴³ Matteo Ripa, *Giornale (1705-1724) Vol I, Vol II, Testo critico, note e appendice documentaria di Michele Fatica*,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1, 1996

¹⁴⁴ Matteo Ripa, and Fortunato Prandi,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6

¹⁴⁵ 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¹⁴⁶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ercorso documentario e iconografico, catalogo della Mostra*, Napoli: Archivio di Stato di Napoli, 2006

书影，涵盖的内容相当丰富。但正因为涉及的内容太过庞杂，所以对马国贤的整体认识并不是很充分。

总体而言，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对马国贤本人还是对中国书院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以法蒂卡教授以及迪·菲奥雷（Di Fiore）为代表的研究者，对有关马国贤以及中国书院的第一手文献大体上都进行了初步整理，为后来的研究者创造了诸多便利的条件。

6.1.2 国内的研究情况

20 世纪 40 年代，方豪（1894-1955）神父以及傅任敢（1905-1982）分别撰写了《中国初期留学史拾遗》¹⁴⁷以及《雍正年间意大利的中国书院》。¹⁴⁸前者对马国贤创建的中国书院着重进行了介绍，并且对前去书院学习中国留学生进行了研究；后者则仅仅对于马国贤创建书院这件事以及书院本身进行了相对简单的介绍。这两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国内对于马国贤研究的正式开始。¹⁴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内对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不断升温，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马国贤归在了众多耶稣会传教士之列，对其生平进行了梳理。以方豪神父为例，他所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¹⁵⁰当中就有一节为“马国贤传”。他对收集到的中外文献进行了汇总研究，对马国贤的生平进行了相当全面并且系统的叙述。这本书在 1988 年由中华书局再版，随后又在 2007 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再版。影响力之大，使其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马国贤不可或缺的书目。¹⁵¹

2000 年左右，国内的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了马国贤及其创建的中国书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同样，研究作为宫廷画师的马国贤及其绘画成就的论文也渐渐增多了。

之后，国内学界对马国贤比较集中关注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4 年《清廷十

¹⁴⁷ 方豪，《中国初期留学史拾遗》，《磐石杂志》第四卷第一、二期，1936 年

¹⁴⁸ 傅任敢，雍正年间意大利的中国书院，《中华教育界》23 卷 9 期，1936 年

¹⁴⁹ 万明，意大利马国贤与中国学院研究在中国，*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Napoli: Archivio di Stato di Napoli, 2006, p.134

¹⁵⁰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香港公教真理会，1967 年

¹⁵¹ 万明，意大利马国贤与中国学院研究在中国，*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134

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文译本的出现。如上文所提及的，尽管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只是对马国贤的日记进行了相当程度删减的结果，但是其作为为数不多的中文一手资料，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本书不仅对马国贤在清宫的十三年做了叙述，而且还记载了马国贤来华之前以及返回意大利创办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前后的事情。

新世纪以后，学者们也着手开始研究中国书院所使用的教材，并且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了几位中国书院的中文老师以及学生身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06 级的丁娜娜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历史沿革及其中国教学》¹⁵²中，对中国书院的学生郭栋臣（Giuseppe Maria Kuo, 1846-1923）和王佐才（Francesco Saverio Wan, 1842-1921）进行了介绍，并对书院所使用的三本汉语教材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作者对三本相对稀有的教材进行的描述无疑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刘桦在论文《论王佐才对海外汉语教学的贡献——那不勒斯中华书院汉语教材再探》¹⁵³对中国书院的学生王佐才所编写的四本汉语教材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刘亚轩在《清代留学生郭栋臣与中西文化交流》¹⁵⁴中，对郭栋臣及其作品《华学进境》进行了分析，借此说明其在汉语传播方面的重要地位。此外，意大利著名建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的外教马方济（Francesco Maglioccola），在《郭栋臣（1846-1923）：搭起武汉和那不勒斯交流桥梁的人》一文中¹⁵⁵，对郭栋臣的生平以及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列举；重庆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意大利留学生孙为（Michele Salvemini）在其学位论文《〈华学进境小引〉探析》当中，描述分析了《华学进境·小引》的内容，由于《小引》当中的意大利语采用了相当难

¹⁵² 丁娜娜，《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历史沿革及其中文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

¹⁵³ 白桦，《论王佐才对海外汉语教学的贡献——那不勒斯中华书院汉语教材再探》，载《国际汉语教育 4》，2010 年

¹⁵⁴ 刘亚轩，《清代留学生郭栋臣与中西文化交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 11 期，第 157-161 页

¹⁵⁵ 马方济（Francesco Maglioccola），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 Parthenope）工程系助理教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外教。其文章发表在他的个人网站上。

Francesco Maglioccola, 郭栋臣 Guō Dòng Chén (1846 – 1923): the man which was a great bridge between Wuhan and Naples, in *Italy in Wuhan*, 2016, from <https://italyinwuhan.wordpress.com/author/italyinwuhan/>.

辨认的手写体，所以孙为的论文无疑为很难读懂郭栋臣手写体意大利语的中国学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最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意大利留学生意杰作（Vincenzo Iannotta）在其学位论文《意大利汉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考察》（*A Survey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in Italy*）当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并且相对详细地介绍了《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Vocaboli Usualie Domestici con Frasi Semplicie Dialoghi Facilie Brevi*）当中的内容，为难以得到这本小册子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6.2 马国贤来华前的早期生平



图 6-1 马国贤画像¹⁵⁶

1682 年马国贤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南部的埃波利（Eboli）。其父亲吉安·菲利普·利帕（Gian Filippo Ripa）是一名医生，母亲安东尼娅·龙果（Antonia Longo）的兄弟姐妹中有人当神父和做医生，因此勉强可以说和其父亲是门当户对的。¹⁵⁷1700 年，当 18 岁的马国贤在维萨戈尔宫（Vicergal Palace）前闲逛

¹⁵⁶ Ritratto di Matteo Ripa - autore sconosciuto, da Poliormama Pittoresco 1839.

¹⁵⁷ Michele Fatica, "L'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come sede di scambio culturale tra Italia e Cina nei secoli XVIII e XIX", in: Scritture di storia, 2001, p.83-121.

的时候，偶然听到了一名圣方济各会士的布道，没想到这改变了他的一生。深受感动的马国贤决定加入教会，以便更好地为天主教服务。

1704年，22岁的马国贤结束了见习期，获得了神父的圣职。当他回到那不勒斯时，他的导师托莱斯（Antonio Torres, 1636-1713）神父对他说：“早上好啊，好人。准备去中国吧。”“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去中国。”¹⁵⁸马国贤在听完神父关于中国的信徒由于偶像崇拜而生活在黑暗中的演讲之后，悟得这便是天主要求他做的事情。在接受了罗马传信部的汉语语言培训之后，马国贤于1707年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行程。¹⁵⁹然而，恰巧在这个时候，教皇发布了禁止中国礼仪的部谕，并且让同为意大利人的特使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将其带给康熙皇帝，这导致了清朝廷对于禁教的热情空前高涨，而教皇这边也丝毫不予退让。

马国贤就在清朝廷与教会关系相对紧张的时刻，与其他几位神父和医生一行七人向中国进发了。他原本是打算帮助铎罗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然而，就在马国贤一行于1710年1月抵达澳门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铎罗已经被清廷驱逐至此。幸运的是，1710年6月马国贤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圣旨，要求包括他在内的掌握西洋技巧的三名神父来到北京入宫。¹⁶⁰这三位神父分别是擅长数学的奥斯定会士山遥瞻（Fabri Bonjour）¹⁶¹、擅长音乐的遣使会的德里格（T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以及擅长绘画的马国贤。清政府将他们称作“技巧三人”¹⁶²。

¹⁵⁸ Matteo Ripa, and Fortunato Prandi,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6, p.4-5

¹⁵⁹ Ibid p.11-16

¹⁶⁰ Ibid p.43-44

¹⁶¹ 关于山遥瞻神父的记载相对较少，没有找到其详细的生卒年月。在马国贤的日记中，*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C.*，60页，1707年的日记是这样描述山遥瞻神父的：山遥瞻神父，50岁左右。所以可以推测其出生时间大概在17世纪的50、60年代。

¹⁶² 歐陽哲生，《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第291页

6.3 马国贤对于缓解礼仪之争的贡献

6.3.1 礼仪之争的背景

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曾就“中国礼仪”的问题进行过一场宗教的辩论¹⁶³。当时，耶稣会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了清朝廷，并且为清廷工作。此时的中国人惊讶于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学和力学知识以及绘画技术等科学知识。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对耶稣会传教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耶稣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无疑是传播天主教，但在中国他们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到国家治理，小到每个家庭自己的生活方式，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指导框架。但儒家思想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了对于祖先的崇拜，这对一些天主教神学家来讲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按照教皇的观点，天主教的信徒是不允许再相信或者祭拜其他的神的。耶稣会士试图向教会说明，这些中国仪式只是社会性的行为，而不是宗教性仪式，应当允许中国的天主教信徒继续参与。这场天主教会内部对于是否应该允许中国教徒继续进行中国礼仪的争论便是后世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英文：*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意大利文：*la Controversia dei Riti Cinesi*）。

在天主教会的这场争论中，其主要的参与者是以下两方面的代表，其一是认为不应该禁止中国信徒参加祭孔祭祖活动的大部分耶稣会士，其二是认为应当禁止这种行为的教会其它势力。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教会内部争论是由于耶稣会以外的组织嫉妒耶稣会抢占了中国这一片“传教圣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争斗。¹⁶⁴而马国贤作为罗马传信部直接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在整个争论中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修会团体，因此他受到了持各种不同意见的团体和传教士的排斥。在之前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大都将马国贤定位成了一名“礼仪之争受害者”，而并非一位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下积极做出贡献并形成较大影响的人物。通过对原始档案和著作的研究，笔者认为，马国贤只是相对其他人来说选

¹⁶³ 有关礼仪之争的经过的叙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手文献，请参考：
[美]苏尔 诺尔 著，沈保义 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方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¹⁶⁴ 请参考：吴莉苇著：《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择了一种较为明智低调的生存之道，这也反映了当时很多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对礼仪之争的态度。相对于被研究者们讨论较多的几位在此次事件中活跃的人物来说，这些相对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则在不断缓和着清廷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矛盾，推进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接下来本文将对对比分析几位在此期间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以及马国贤本人，并对马国贤为缓和礼仪之争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探讨。

6.3.2 “利玛窦规矩”

大多数的学者都赞同中国礼仪之争的根本源头是基督教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挑起这一冲突并且为以后的礼仪之争埋下祸根的其实是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创办的天主教修会，该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而是主张以军队式的机动灵活方式传教。在耶稣会创办初期，罗耀拉就已经确立了其传教的基本思想。后人对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以及策略进行了归纳，其中“自上向下”的传教方向以及灵活的传教方法基本上是每个学者共同的看法。¹⁶⁵利玛窦来华之后也采取了这样的传教策略，由于大环境使然，这样的“本土化”传教方法也为教会所接受。但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灵活性却破坏了天主教本身应有的“纯洁性”，使得中国信徒在信奉天主教这个唯一神宗教的同时，夹杂了一些对于其它宗教的“信仰”。

利玛窦和其他的耶稣会士，为了能够在中国继续传教，向教会解释中国信徒们祭祖祭孔均属社会行为，并非宗教行为，不应该加以干涉。此后前往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基本秉承着和利玛窦一样的做法，这种不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礼仪进行干涉的态度被称为“利玛窦规矩”（the directives of Matteo Ricci）。这样的灵活性虽然为天主教进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导致了其后对于天主教在中国教区“纯洁性”的争论。

¹⁶⁵ 请参考：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整本书均在论述这个观点；吴莉苇著：《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7页；陆耿：“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2010年，第23-26页。

其实从上面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以及“利玛窦规矩”。首先，本文在第一部中曾经讲解过耶稣会入华的历史，无论是从史实还是利玛窦本人的记述来看，将基督教传入中国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正因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采取了从上至下的灵活传教策略，才让耶稣会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同时也为后来的传教士（不仅指耶稣会，也包括其他修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同时开展了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为汉语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确实存在着矛盾，这是不争的事实。利玛窦“合儒”的策略在保障基督教顺利进入中国的同时，也一直在刻意回避着基督教与中国伦理文化之间的差异。

由利玛窦引发的礼仪之争，最终使教会和清朝廷之间的关系在利玛窦死后100年左右，降到了冰点。

6.3.3 马国贤之前“礼仪之争”的过程

克莱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在1704年宣布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行为的部谕之后，¹⁶⁶派遣特使铎罗主教前往中国，并将部谕带往中国。身为主教的铎罗，自然与教皇站在同一立场上，将耶稣会之前“灵活”的传教方式视作是一种对教会的背叛。在铎罗到达广州后前往北京的路途中，尽管不断有在华的耶稣会士向他解释中国礼仪的社会性以及但凡中国礼仪被禁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但铎罗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在与赞同禁止祭祖祭孔行为的传教士交谈过后，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看法。

铎罗的这种“耿直”态度以及作为主教的自傲，加之他又缺乏良好的外交能力，让康熙皇帝产生了反感。两人见面时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前两次见面时铎罗都极力避开中国礼仪问题以及其带来部谕的话题，直到第三次见面时，在康熙皇帝的逼问下才说明了来意。在没有办法说服皇帝的情况下，铎罗请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阎当，想让他帮助说服皇帝。然而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并非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

¹⁶⁶ Dan. J. Li, *Chin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69, p.22-24.

阎当（Bp. Charles Maigrot）在 1684 年便开始担任福建传教区的宗座代牧主教。作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阎当认为应该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的活动，并在他管辖的教区颁布指令，废除了利玛窦制定的利玛窦规矩。紧接着在 1693 年，阎当起草了一份报告，对此前耶稣会呈现给教会的中国教区的现状进行了一一反驳，并将报告递交给了罗马教会。阎当在报告中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1. 中国人所说的“天”是物理上的天空，并不应该用来指代基督教的上帝；2. 孔子其实是无神论者，作为信奉孔子的民众以及皇帝也都是无神论者；3. 祭祖祭孔是宗教行为。罗马教会对于阎当的提议相当重视，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在 1704 年所定下的部谕甚至可以说是对于阎当报告的回复。

铎罗将这样一位态度保守并且思想相对极端的传教士阎当介绍给了康熙皇帝，着实激怒了康熙。在呈给康熙皇帝的文献当中，阎当指出了儒家思想以及基督教思想之间很多相抵触的地方。然而由于汉语水平有限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阎当在表述的过程中也犯了很多错误。在康熙召见阎当时，阎当不仅明确表示要禁止中国礼仪，并且态度相当高傲自大，同时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康熙皇帝对于中国文化的提问。这一切使得康熙皇帝气愤不已，他随后就下令将阎当和铎罗驱逐出了中国。

无论是从史料还是从马国贤的日记中，我们都能看出当时的康熙皇帝尽管有些傲慢，但是对于“中国礼仪之争”始终持一种相对宽容并且尝试寻求解决方案的态度。康熙曾经多次要求传教士以及自己的使者向罗马教会送去诏书，想要谈妥“礼仪之争”，但是罗马教会方面并不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所以一直没有什么结果。然而在中国方面，由于传教士们遵守着“利玛窦规矩”，康熙皇帝最初对于来华工作的传教士们是相当友好的。1692 年，康熙皇帝下达了一条教令：

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¹⁶⁷

¹⁶⁷ S.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p.189-190.

此时的康熙皇帝对于包括传教士们在内的西洋人抱以一种十分宽容甚至可以说是支持的态度，并没有实行任何政策上的打压，相反还上行下效，要求整个朝廷不要妨碍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这样的态度无疑为传教士们的传教工作减少了很大的阻力。

但是，传教士能够在中国境内安稳传教的局面，却被教皇于 1704 年颁布的那条敕令彻底打破了。1706 年，当铎罗和阎当与康熙皇帝见面时，康熙得知克莱门特教皇所下的禁令之后，颇为不快，认为教皇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能理解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表现。¹⁶⁸朱批如下：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¹⁶⁹

随即将阎当驱逐出国，铎罗押送至澳门软禁。

随后，清政府对境内的传教士开始实行领票传教的政策。如果传教士表示将永居中国并且遵守利玛窦规矩，那么他就能获得清朝廷颁发的传教票。反之，没有传教票的传教士将被禁止传教并且驱逐出境。尽管后人在描述此次事件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其称之为康熙的“禁教事件”，但就事实来讲，康熙帝并没有禁教。就康熙本人的目的来说，实施这样严厉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赶走传教士甚至在中国禁教，而是要将传教士们拉拢过来。康熙在与罗马使节的关系文书中曾明确表示：如果传教士能够领到传教票，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和大清子民一样的待遇；但凡教皇有任何处罚，清朝廷将保护所有持传教票的传教士。根据记载，中国境内的传教士有将近三分之二领取了传教票，其余大部分则被驱逐出境，少部分被限制了活动。

之后的 1716 年，广东总督曾上奏奏疏，希望皇帝能够禁止传教士的传教，但皇帝仍旧颁布了一条圣旨：重新开放广东的贸易并且暂时停止对于基督教的宗教迫害。¹⁷⁰

¹⁶⁸ Dan. J. Li, *China in Transition*, p.22-24.

¹⁶⁹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 年，第 96 页。

¹⁷⁰ 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 81 页。

从朝廷所记载的各种文献以及马国贤的日记中可以看出，¹⁷¹康熙皇帝无论对于基督教还是传教士，自始至终都抱着一种傲慢的态度，但是这种傲慢之中也夹杂着一一种接受和支持的立场。在没有收到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部谕之前，康熙皇帝不仅积极尝试解决礼仪之争的问题，并且对传教士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在召见过铎罗和阎当之后，也只是对那些认为应该禁止中国礼仪的传教士表现出了不满，而对于那些和自己保持同一想法的传教士，甚至对那些尽管和自己持不同想法但对自己和中国文化表现出足够尊重的传教士，都表现出来了相当和善以及支持的态度。

6.3.4 马国贤对缓解“礼仪之争”的贡献

在这个特殊时期来到中国的马国贤，其地位便显得十分尴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他的身份为教会传信部的传教士，因此他在中国礼仪之争的看法上必须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并且马国贤和铎罗、阎当所考虑的事情也不完全相同：尽管他认为应该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但他深知如果这样做，会阻碍自己传教工作的顺利开展。这种与其他传教士不一样的想法，使马国贤成了两方共同排挤的对象。

马国贤不属于教会两派之中的任意一派，并且对整个朝廷以及中国百姓都保持着一种谦逊的态度。他和其他几位在宫廷中任职的传教士所持的这种态度，无疑让康熙产生了好感。尽管康熙始终没有禁教并且一直善待那些认同中国礼仪的传教士，这和马国贤的态度以及行为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马国贤的行为让康熙感到满意是可以肯定的，这也确实成为了尽管这位圣祖龙颜大怒却始终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活动的一个因素。

此外，马国贤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和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意识到了了解中国文化以及学会汉语是一名传教士能够在中国顺利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在中国顺利传教，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众所周知，皇帝是中国皇朝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

¹⁷¹ 请参考北平故宫博物院于 1932 年编成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以及马国贤日记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C.* 中关于马国贤在中国十三年的部分。

皇帝不支持甚至反对传教士的话，那么一切传教活动都会举步维艰。只有取得皇帝的信任，有了皇帝的支持以后，上行下效，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认识到，从上至下的传教方式无疑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就算走这条道路，也必须得到上面的支持，传教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第二就是取得传教对象的信任。无论皇帝是否反对传教，但最终是否皈依天主教的还是一般民众。所以取得传教对象的信任也成为了成功传教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利玛窦的回忆录，整本书有很大部分都是在描述神父们如何与中国百姓斗智斗勇：明清时期的中国百姓相对来说比较排外，对于文化、语言、长相和习俗不同的西方人充满着怀疑。为了传教工作的顺利开展，传教士们只能想方设法赢取他们的信徒。

马国贤来到中国之后很快便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了这些。首先是皇帝的支持和信任问题，他在到达了澳门但还没有去北京的时候，看到了被囚禁在此的铎罗。由此，马国贤便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皇帝是整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允许，那么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开展任何的传教工作。接下来，无论是在马国贤第一次进宫与康熙皇帝交谈，皇帝用汉语十分耐心、并且语速很慢地与马国贤交谈；¹⁷²还是皇帝看到教皇禁令时的恼怒，认为这是教皇不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¹⁷³都能充分证明康熙皇帝是一位十分注重自己国家语言和文化的皇帝。康熙在整个礼仪之争中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是：外国传教士即便不理解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博大精深，但必须尊重它。

其次是关于取得传教对象信任的问题。马国贤在日记中提到了自己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传教活动：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能够少一点夸耀，采用的传教方式适合所有等级和不同情况的人们，那么入教的人数就能大量地增加。因为中国人拥有出众的天赋才干，并且谨慎而温顺。¹⁷⁴

很明显，马国贤深知，无论是对皇帝还是一般民众，想要顺利传教，融入他们并学习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马国贤后期创办中国书院的出发点。

¹⁷² Matteo Ripa, and Fortunato Prandi, *Memoirs of Father Ripa*, p.60-61.

¹⁷³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第96页。

¹⁷⁴ 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9页。

笔者将上面提到的各方有关“礼仪之争”的不同观点列表予以说明：

姓名	身份	对礼仪之争的主张	对朝廷表现出的态度	对教会表现出的态度	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态度
利玛窦	耶稣会传教士	不应禁止中国礼仪	不应禁止中国礼仪	不应禁止中国礼仪	需要学习并且融入中国人之中，才能顺利传教
铎罗	罗马主教的教廷特使	应禁止中国礼仪	应禁止中国礼仪	应禁止中国礼仪	不需要
阎当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	应禁止中国礼仪	应禁止中国礼仪	应禁止中国礼仪	不需要
马国贤	传信部直属传教士	应禁止中国礼仪	避而不谈	应禁止中国礼仪	需要学习，才能够顺利传教

表 6-1 代表人物对礼仪之争的看法

参照上面的表格，笔者将包括马国贤在内的处于中国礼仪之争时期的几位关键人物对这个问题的主张进行了对比。利玛窦是“利玛窦规矩”的创建者，为了打开中国这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遵从耶稣会的宗旨，他采取了较为灵活和温和的传教方式。尽管我们无法得知利玛窦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认为中国礼仪并不属于宗教行为，还是这只是他为了传教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总体来说，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教会，利玛窦都表达出了不应该禁止中国礼仪的态度，并且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玛窦也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阎当和铎罗二人，代表着除了耶稣会以外大多数天主教团体的看法，并且也代表着主教的观点。他们认为从本质上来讲理应禁止中国礼仪，而中国的语言文化也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必要，并且他们也将这种观点直接传达给了康熙皇帝。

而马国贤相对于前面的几位传教士而言，则充满了许多矛盾。他没有像利玛窦一样为了传教，“灵活”到可以穿僧服或儒服，为了方便传教先将自己的日常行为“本土化”的地步；也没有像阎当和铎罗那样，在面对康熙随时有可能禁教风险的时候，依旧尝试着说服皇帝，说中国礼仪是违反天主教教义的。有学

者认为，从加入天主教会的那一瞬间起，马国贤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会：无论马国贤拥有多少头衔，宫廷画师也好、文化传播的使者也罢，他自己最为认可的毫无疑问是传教士这个头衔。¹⁷⁵尽管马国贤看似有些表里不一，但他的行为模式其实十分单纯：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中国传播好天主教。首先，从马国贤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其实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礼仪并不是单纯的社会行为，而是掺杂了一些宗教性的因素在内。最直接的证据便是，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但凡他们让马国贤参与一些祭祖祭孔的活动，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糊弄过去。甚至在康熙皇帝的葬礼之上，马国贤也没有为其祭拜，而是巧妙地回避了这一请求。因为马国贤很清楚，如果像阎当和铎罗一样，把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弄僵，那么不只是自己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并且在中国境内的其他传教士也可能会因此遭殃。马国贤的这种避免冲突的策略以及对中国百姓和皇帝的谦逊态度，不仅使他得以继续留在中国传教，同时也缓和了中国朝廷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矛盾。此外，在中国的经历也让马国贤清楚地意识到，熟知中国的语言文化对于传教的重要性。

和马国贤抱有相似想法的在华传教士有很多，最能够体现他们态度的便是传教票事件。大多数在华传教士都深知，在中国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如果不想放弃这片教区的话，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皇帝妥协。所以无论自身的理由如何，包括马国贤在内的“妥协派”以及本身就支持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是这个时期保护住中欧交流桥梁的功臣。

¹⁷⁵ 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2期，第83页
111

第七章 那不勒斯中国书院

7.1 马国贤归国以及书院的创立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马国贤是教会传信部派来的传教士，所以在其内心之中是认为有必要执行教皇禁令的。但同时，他在中国朝廷的经验又让他认识到皇帝是整个国家绝对权力的象征，为了能够继续传教必须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耶稣会传教士以及其他教会团体对礼仪之争不同的看法，使得马国贤始终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样的境况在雍正即位之后逐渐恶化。根据十三年在中国传教的经验，马国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传教不能够完全依赖欧洲传教士，必须要培养合格的中国本土神职人员。¹⁷⁶基于这样的想法，马国贤决定离开中国，返回那不勒斯，曲线达到自己的目的——希望在家乡那不勒斯创建一所能够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的学院，再让培养出来的那些传教士回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¹⁷⁷

从马国贤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康熙年间，已经进入清朝廷并为其效力的欧洲传教士在没有健康问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主动向皇帝提出回国请求的。再加上之前实施的传教票政策，大多数传教士都答应了终身留在中国。所以在康熙驾崩、雍正登基之时，马国贤尝试着向雍正皇帝提出了回国申请，这在当时是不太“正常”的。念在马国贤为其父康熙效忠多年的份上，雍正批准了马国贤回国的请求。同时，马国贤除了自己回国之外，还有着把自己培养的中国弟子也带回意大利的想法。因康熙在位时曾拒绝过将自己的子民送出国外的请求，所以马国贤一开始并没有向雍正皇帝提及此事。最后在亲王的鼓励下，马国贤鼓起勇气打了一份报告，并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准许。随后，马国贤在 1724 年 1 月从北京出发，带着自己的四名中国弟子以及一名汉语教师，携带兵部给

¹⁷⁶ 同上第 90-91 页。

¹⁷⁷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2006, p.253.

予的通行文件，开始了返回意大利的旅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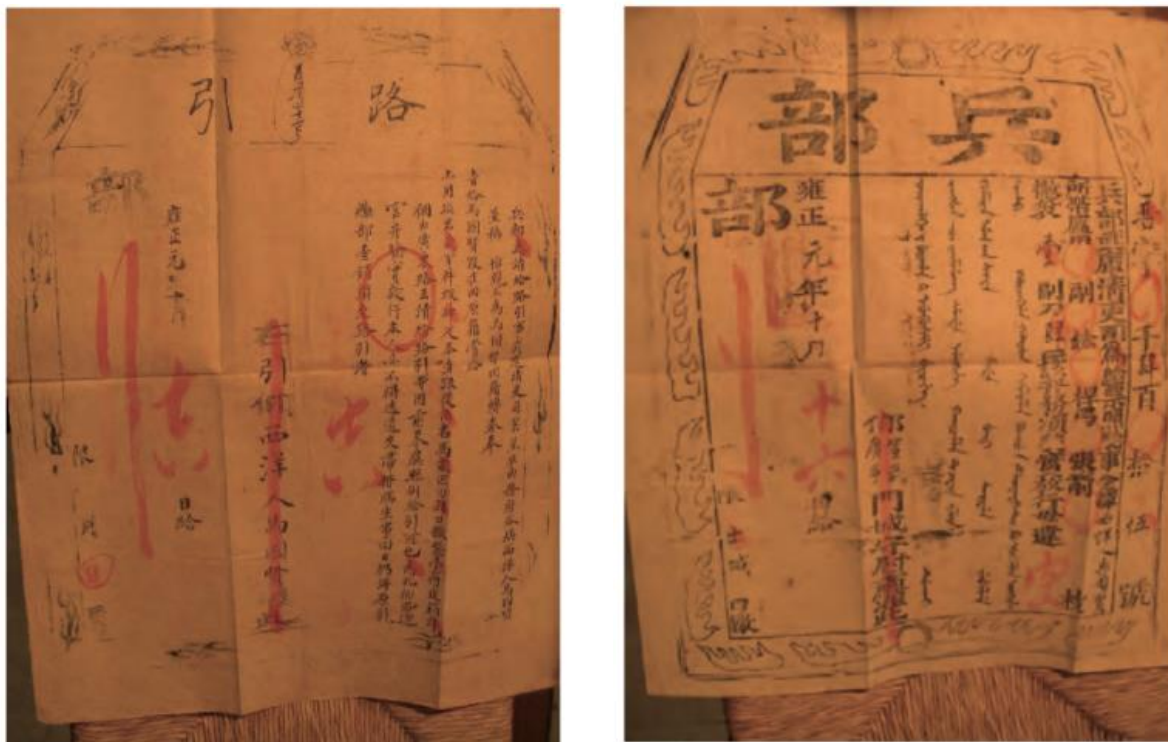


图 7-2、7-3：当时兵部发给马国贤的通行证¹⁷⁸

经过辗转十个月的旅途后，一行人于 1724 年的 11 月回到了意大利。随后马国贤便开始了筹备创建中国书院的事宜。但罗马教廷传信部起初并不同意建立中国书院的提议。原因有二：其一是现在传信部并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支持中国书院的启动；其二是为了表达对于马国贤擅自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不满，传信部拒绝给予马国贤帮助。¹⁷⁹总的来说，在与各方交涉并且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马国贤在回到那不勒斯八年之后于 1732 年终于创办了“中国书院”（il Collegio dei Cinesi）。在书院创办初期，其教学目的以及宗旨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中国书院的创立确实有助于在礼仪之争的大环境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书院培养出来的许多中国传教士像欧洲传教士一样，除了传教工作以外，也充当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欧洲第一所教授汉语的学院，中国书院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其教学目标逐渐地从培养传教士转向了汉语教学乃至汉学人才的培养，培养出了郭栋臣、王佐良等这

¹⁷⁸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233.

¹⁷⁹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ir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161.

些 18 世纪的“国际汉语教师”。

下面笔者将介绍和分析中国书院前后期的书院生活以及教学内容，指出书院的建立对于汉语在意大利的传播，以及意大利人对汉语的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7.2 前期书院的生活以及学习

那不勒斯中国书院从创立开始，就采用了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小时制来规定书院学生每天的生活。按照书院的规定，每位学生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听课、早中晚三餐、宗教仪式（比如祈祷）、心理测试等方面；同时，书院为了学生的健康着想，会强制学生保持充足的睡眠。书院从创建之初，就不断地招收学生，同时也鼓励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其它国家的学生入学。由于书院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前期大多数学生都是中国人，同时有少部分印度以及其它国家的学生），学生们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个性以及世界观，这样就导致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受到书院的管控。考虑到毕业以后大部分学生要回到中国传教，所以中国学生最重要的必修课是历史、神学以及拉丁语。波士顿大学的梅欧金（Eugenio Menegon, 1966-）找到过一份极为详细的中国书院的学生学习、生活的日程安排：

在经过了晚上七个小时的休息之后，提醒学生们去参加祈祷的第一次闹铃将会响起。

除了身体不适者，所有人都要起床。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闹铃之间，学生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更衣、叠床、做一些和信仰相关的事情或者处理一些个人事务。

上述的半小时结束后，所有的人都会集中在祈祷室，一起做半个小时的祈祷，然后再上一个小时的背诵课。在课堂上学生需要背诵¹⁸⁰给老师听。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想吃早饭的学生可以吃早饭，然后开始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¹⁸⁰ 关于背诵的内容则并没有提及

课程结束之后，过十五分钟学生将会参加弥撒；弥撒结束到午饭开始这段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需要做的事情，学生们可以安排自己想做的事情。

十七点半午餐的铃声响起，书院所有的人（除了身体不适者、根据需求会把饭菜带到其房间或者床边）都会来一起用餐，每次早午餐，都会将这些食物平均地分给每一个人：蔬菜汤、煮栗子、冷盘以及水果。

午餐结束之后，大家为那些为世人做出贡献的生者和亡灵举行念诵仪式。紧接着是休闲时间，学生们可以去走廊或者庭院里玩耍，天冷的时候也可以去火炉旁边。休闲的时间为一个小时。

随后会再次响起午休的闹铃，全体学生需要回到卧室，进行午睡或者做一些不会发出声响的手工。经过一个小时的休息之后，会响起交流会的第一次铃声。

第一次和第二次铃响之间相隔了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们可以收拾卧室，然后准备开始交流会。在持续半个小时的交流会上，学生们会对教规以及导师让学生阅读的书籍进行交流讨论。

随着交流会的结束，白天的日程就全部结束了。学生可以去郊外散步，如果天气条件不允许的话，便在校园里散步。

冬天，当圣母颂的铃声响起的时候，学生们会被强制要求一直学习到夜里一点，在一点的时候开始第二节课，一直上到两点钟。

两点的时候响起祈祷的铃声，所有的学生必须参加这场时长为半小时的祷告。

两点半的时候学生们去用晚餐，每人会有一份蔬菜汤、一份肉或者鱼（根据日期来决定）做的冷盘、水果、面包以及可以自取的葡萄酒；但是由于 **Domenica Ciao** 在中国患有胸部疾病，前往巴黎的途中还呕过血，所以学校老师以及医生都禁止他饮酒。

晚餐之后，学生们会背诵一小段时间的颂词，然后便开始了三刻钟的娱乐时间。

在一起接受灵修方面的测验之后，学生们便可以上床睡觉了。

中国学生可以不参加合唱，而是利用这些时间来学习。

中国学生也可以不参加每周五晚上举行的忏悔会。学生参加忏悔会之前

先要洗脚，然后在老师面前忏悔。经过开导，消除那些让学生们痛苦或者干扰学生学习的东西。¹⁸¹

在上面的日程安排中，并没有标注具体的年份。但根据日程中出现的一位名叫“Domenica Ciao”的学生，有学者认为这名学生应该是《中国书院学生名录》¹⁸²中所提到的赵西满。赵西满患有肺病，大概可以和时间表的内容对上。赵西满于 1738 年到达意大利并在 1750 年回国，所以可以认为这份日程安排应该是在此期间中国书院学生的日程，也就是说学院早期的作息表。

日程安排中共有三处标记了确切的时间，分别是十七点半的午餐、夜里一点的第二节课以及两点时祈祷的闹铃。根据常识推测，这里使用的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日常所使用的、从半夜零点开始计时的二十四小时制。时间表当中有记载铃铛响起“圣母颂”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推测时间表使用的应该是意大利时间。意大利时间是 14 世纪开始主要在意大利使用的时间系统：将一天分割为 24 个小时，并将日落后半小时的时间（也就是钟声响起“圣母颂”的时候）作为零点（或者二十四点）开始计时。

根据法蒂卡教授以及迪·菲奥雷的推测，¹⁸³换算成现在所使用的 24 小时制，学院的学生一般在固定的七小时睡眠之后，在早上 4:45-5:00 被叫醒；经过一系列的洗漱更衣以及基督教的祈祷之后，在 6:00-6:15 开始上课。7:00 的时候开始用早餐；7:30 开始上第一节课一直到 9:00；休息放松一刻钟之后，于 9:15 开始做弥撒，在 10 点（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意大利时间 17:30）开始用午餐。11:30 到正午，学生们会念诵、悼念善人，之后一段时间课间活动。午休过后，进行交流会。14:30 到 16:30 为自由活动的时间。

总体来说，从这个日程安排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书院的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是相对“模式化”的，并不是十分辛苦。由于书院最初培养人才的目的——旨在能够让学员学成之后归国传教，所以课程以及日常生活的安排主要均以一名

¹⁸¹ APF, Collegi vari, *Collegio dei Cinesi della Sagra Famiglia in Napoli*, b. 8, ff. 76-76v. 中文系笔者根据意大利文翻译而成。

¹⁸² Giuseppe Maria Kuo, *Elenchus alumnorum, decretal et documenta, quae spectant ad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Chang-hai 1917, p.2-3

¹⁸³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ercorso documentario e iconografico, catalogo della Mostra*, Napoli: Archivio di Stato di Napoli, 2007, p.40-41

合格的传教士来要求每一位学生的。课程以历史学和神学为主，中国学生还需要特别学习拉丁文。但是相对来说缺少一些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课程。马国贤当年带回来的一名中国教师，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没有文献详细记录早期中国书院的教师教授汉语课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与马国贤一起从中国前往意大利的专职中文教师王雅敬（1693-1738）担任了书院汉语教师的工作。尽管其初衷是教授年幼的中国学生学习自己的母语，但是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籍的学生进入书院开始学习中文。这是首次在欧洲由中国的汉语教师亲自教授汉语。即便这一课程并不是中国书院的重点，却变成了中国书院的特色课程。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尽管有很多对于书院本身的描述，或者是总体学习情况的记载，但是现存的资料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与汉语课程相关的内容。

7.3 后期书院的生活以及学习

对于意大利中国书院来说，最重要的转折点是那不勒斯被法国统治者占领的那段时间。波拿巴王朝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那不勒斯，并由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 1768-1844）和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 1767-1815）进行了近十年的统治。缪拉于 1808 年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教育部对整个意大利的教育系统进行了调整，中国书院也在其改革的名单之中。为了保证书院能够在新的政权下安稳地存续下去，书院必须接受缪拉政府的改革建议：除了为在书院学习的中国传教士们提供必需的培训之外（这些培训也是中国书院建立的初衷），还将作为那不勒斯的青年学院为青少年提供必要的教育。庆幸的是，作为中国书院特有的汉语课程，缪拉政府并没有将其禁止，而是作为书院的特色被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除了要去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传教士需要学习汉语之外，汉语课程也逐渐向那不勒斯的青少年们开放。

在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中，法蒂卡教授和迪·菲奥雷找到了一篇名为《（书院）方案》（*Programma*）的材料，¹⁸⁴其中记录了 1850 年左右，也就是中国书

¹⁸⁴ Collegio deritto dai PP. Cinese. *Programma*, s. d. e s. l., in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Napoli,

院在缪拉政府的强制下转型之后，学院学生的生活。和转型之前的前期生活相比，有很多地方发生了改变。

首先便是学生的来源。在转型之前，书院的生源大都是来自中国立志成为传教士的学生，少部分是来自其他国家打算毕业后去中国传教的学生。在转型之后，由于书院变成了类似“全日制高中”性质的教育机构，所以除了培养传教士以外，学生当中更多的是那不勒斯的青少年。由于能够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家境都不会过于贫寒，因此学校在生活娱乐方面都没有前期那么“艰苦朴素”了。根据《（书院）方案》的记载，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后期学费相较前期上涨了大概 2/3；在每年 10 月份的时候，学生们将组团前去书院的小别墅度假；在进入学校学习之前，学生需要自己准备一系列的生活用品以及服装；每日供应的餐点更加健康，并且数量充足，在节日还会增加餐点的种类。这些记载表现了学校生源从“想成为传教士去中国传教的学生”渐渐变成了“市民阶层子女的青少年”的转变。¹⁸⁵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在前期，学校以教授神学知识、历史知识以及拉丁语为主，但是并没有开设与科技、音乐美术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课程设计很明显是为了培养出合格的传教士。而到了后期，由于在缪拉政府压力下的转型，学校开设的课程新增了希腊语、法语、英语、书法、设计、音乐、演讲、数学、物理、地理、哲学等专业。如果学生想上英语、设计以及音乐课的话，还需要支付一些额外的学费。从新增的课程可以看出，书院的转型使其培养目标从一开始的“去中国传教的本土传教士”变成了“综合素质高的青少年”。

1868 年 11 月，转型后的书院开始正式为意大利学生们提供汉语课程（除汉语课程以外，这个时期还新增了波斯语、俄语等课程），任课教师选取了当时汉语水平最好的几名学生。无疑，对于学院特色的汉语课程来说，这样的转型确实扩大了学习汉语学生的生源。由于面向的群体不再是传教士，而是一般的青少年，这时候的中国书院可以说确实开始将汉语传播到了意大利的一般民众之中。书院后期保留了教授汉语的传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 4 年制的自费课程来

Misc. 252/11. 4.

¹⁸⁵ Ibid.

培养懂汉语的人才。

同时，从 19 世纪开始，中国书院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了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学习汉语，开始编纂意大利语的汉语教科书。其中有几名学生，为汉语在意大利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欧洲人撰写汉语教科书的时代，在这个时间尽管书院开始了转型，但是还没有开设面向意大利青少年的汉语课。在这个时期乔瓦尼·非洛梅诺·玛利亚·特莱斯（Giovanni Filomeno Maria Terres，生卒年不详）撰写了意大利语汉语教材《中文语法》（*La Gramatica Cinese*，于 1813 年编写，编写工作未完成并且未出版，有手稿存于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而另外也有人将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用西班牙语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翻译并且修订成了拉丁语版《初学简径》（*Grammatica Lingvae Sinensis*，1835 出版于那不勒斯）；第二个阶段则是以面向意大利青少年开设汉语课程为契机，开始了中国人撰写意大利语汉语教材的时代。在 1868 年开设了汉语课程之后，郭栋臣（1846-1923）很快编纂了一本作为汉语教材使用的《三字经》读本，并且在次年出版了自己的汉语教科书系列《华学进境》（1869 年出版于那不勒斯，1872 年再版）；在同一时期，作为郭栋臣前辈的王佐才（1842-1921）撰写了《中文文法概述》（*Sunto della Gramatica Cinese*，1873 年编写，1917 年重写，未出版，手稿存于罗马圣方济各档案馆）。两名中国人编纂出的汉语教科书与以往西方人编纂的相比，在框架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3.1 第一阶段

尽管早在 1724 年的时候，马国贤就将书院的第一名专职汉语教师王雅敬带回了那不勒斯，但是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书院在开设面向意大利青少年汉语课之前编纂的教材仍然是由意大利人完成的。在这里笔者挑选了两本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并且比较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汉语教材进行说明和分析。

（1）《初学简径》

首先第一部是 1835 年在那不勒斯出版的《初学简径》。这本书的原作者为

西班牙的来华传教士万济国。¹⁸⁶据记载，这本教材成书的时间为 1682 年。¹⁸⁷从图 7-3 封面标题下面的那段小字：“ex Hispanico in Latinum idioma traslata et aucta”（从西班牙语译成拉丁语，并进行了增补）可以看出，有一名译者将万济国的那本语法书从西班牙语翻译成拉丁语，在进行了一系列增补之后于那不勒斯出版。而译者究竟是谁？以及尽管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 1835 年，但是翻译工作是什么时候进行的？等问题，笔者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译本共 111 页，8 章，按照西方语言“八大词类”的语法框架，逐章对汉语进行了讲解。前两章分别是绪论、发音和声调；第三章开始便是语法教学。《初学简径》章节的分布以及内容与万济国的

《华语官话语法》基本相同。译本与原本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1. 作者万济国想要降低学习汉语的门槛，去掉了令西方人头痛的汉字书写部分。这导致了原本整本书的正文部分都没有出现汉字，而译本当中所有的例子都是用汉字书写，并配上了注音以及翻译；2. 《华语官话语法》全书共十六章，而《初学简径》只翻译了前八章的内

容；3. 第八章“动词”，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完全进行了重新编撰：前七章的译本和原本在内容上基本保持一致，但是第八章对于汉语动词的简介，两个版本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造成这三点不同的原因在于：首先，《华语官话语法》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十分明确，即想要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的传教士。由于万济国所在的多明我会采



图 7-3：《初学简径》书影

¹⁸⁶ Uchida Keiichi,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nguistic Contact*, Goettingen: V&R unipress GmbH, 2017, 36. 万济国神父的原本由姚小平以及马又清翻译成中文，译本名为《华语官话语法》，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2003 年出版。

¹⁸⁷ Francisco Varo,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0, lii.

取的是自下向上，面向一般普通百姓的传教策略，因此传教士并不需要掌握汉字，而只要掌握一般的汉语口语。因此，本着强调实用性的原则，万济国在《华语官话语法》当中直接舍弃了汉字的教学：不仅在书的正文中不使用任何汉字，也完全没有涉及汉字的书写方式。而对于那不勒斯中国书院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马国贤创立的中国书院是为了培养前往中国开展传教工作的传教士，并不强调多明我会“从下至上”的传教策略。因此，教材的实用性就显得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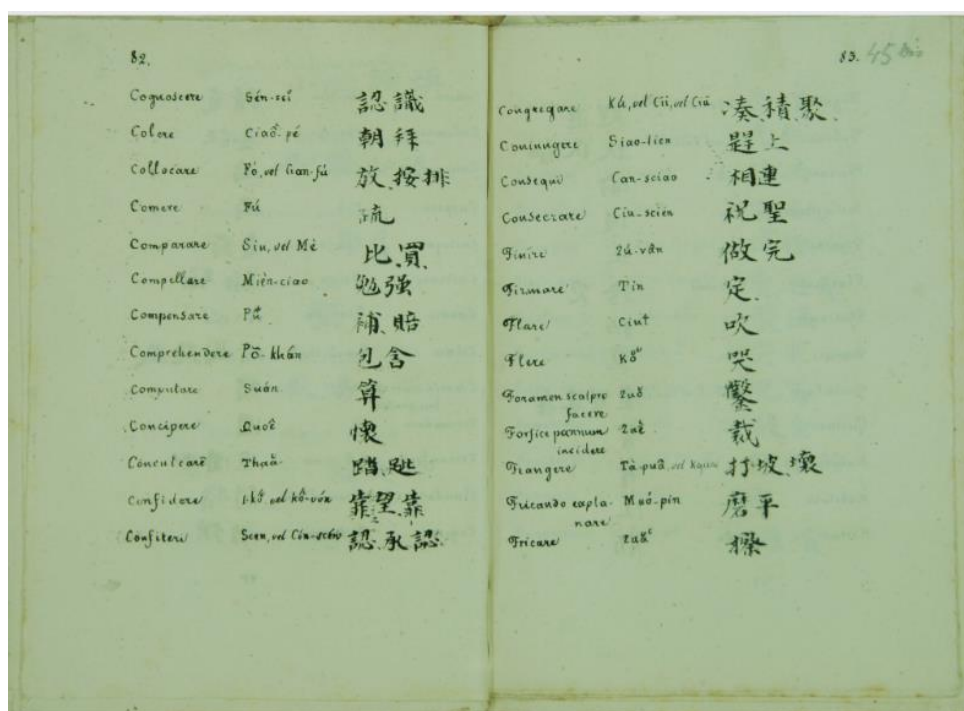


图 7-4

《初学简径》第八章书影。

相较原本增加了很多动词实例，并且使用了汉字

不十分重要，鉴于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案例都写成了汉字，并替换了一些原本的例子，以便让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熟练掌握口语的同时掌握汉字的书写方式。但可惜的是，书院翻译的《初学简径》并没有增加相应的章节来专门讲解汉字的书写。其次，关于《初学简径》为何只翻译了《华语官话语法》十六章中的前八章。对此，笔者推测，很有可能译者原本打算将《华语官话语法》翻译成两卷本的《初学简径》，但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了这个计划并没有得以实现，因为译者选择翻译《华语官话语法》，就证明他是赞同使用“八大词类”的框架来讲解汉语语法的。但《华语官话语法》的前八章并没有将这套体系讲解

完毕。原本的第一章是学习诚律；第二章是发音；三到十三章是按照八大词类的框架讲解汉语语法；十四章到十六章是汉语语用学的知识。也就是说，三到十三章相对而言是一个整体，而到第八章就戛然而止的译本很有可能只是计划中两卷本《初学简径》的上半部分。

最后是译者重写原本第八章动词部分的原因。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在这一时期编写的汉语教学书籍，会或多或少进行了一些尝试，想突破以往的那种“完全使用西方语言的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的框架。这是一种在认识到汉语和西方语言体系的根本不同之后的尝试。也就是说，《初学简径》的译者已经意识到了汉语和拉丁语语言体系的不同，¹⁸⁸并尝试寻找一些新的方法来描述汉语的语法。

《华语官话语法》采取了系动词以及其余动词不同时态语态的分类方式进行讲解，将重点放在了语法的“法”上面；《初学简径》则减少了不同的分类，增加了许多实例和不同的动词，并将这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词义的“义”上面。

（2）《中文语法》

如果说《初学简径》的译者重写《华语官话语法》第八章的行为是谨小慎微地挑战了一下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描述汉语系统的做法，那么下面介绍的特莱斯的《中文语法》则是对这套系统大刀阔斧的改革。

《中文语法》的作者特莱斯从1812年开始在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中文系学习汉语，次年的二月份开始《中文语法——为那不勒斯中国书院使用》的写作以及编撰工作。对于当时还是汉语初学者的特莱斯来说，这样的工作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书院里的中文藏书以及中国老师的帮助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中文语法》是第一部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汉语教科书，¹⁸⁹但并没有完成，

¹⁸⁸ 丁娜娜，《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历史沿革及其中文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21-25页。

¹⁸⁹ Famularo, D., & Hong, S. “La didattica del cinese a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durante il decennio francese: uno studio sulla Gramatica Chinesa di Giovanni Filomeno Maria Terres (1813)”, *Convegno annuale CIRSIL Centro Interuniversitario di Ricerca sulla Storia degli Insegnamenti Linguistici*. P.21.

自然也没有正式出版。目前只有两个手写版本，分别是：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抄本以及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

从标题上来看，《中文语法》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尽管标题和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很相似，但不同于《中国文法》对汉语语法的研究，特莱斯的书是一本从零开始的语言教科书。从书的副标题便能看出特莱斯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中国书院提供一本可供使用的教科书。全书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零开始，认识中文汉字的组成和发音”；第二部分则是讲述汉语的语法。特莱斯只完成了第一部分。根据他的计划，书的第二部分将主要采用八大词类的分类方式来讲述汉语语法。

由于第二部分并没有完成，并且在总体的思路上也与以前的语法书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本文在此不再展开讨论。而第一部分则体现了特莱斯在编撰汉语教材时和前人完全不同的思路。

人类对于自身的问题会进行哲学性的思辨，所以语言研究的诞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从很早以前便开始对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思考和研究，顺势诞生出了自己语言的语法系统。从古希腊诞生的语法研究可谓是众所周知，尤其是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德里亚学派的学者狄奥尼修斯·瑟拉克斯在撰写其著作《语法术》时将希腊语的词类分为八大类（*octavo partes orationis*）之后，这一套西方的语法框架便被传承了下来，并成为了西方人分析研究其它语言的一个有力工具。同样，来华传教士们编纂的汉语语法书和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八大词类为框架的。

然而中国对于语言的研究与古希腊的语法书的内容截然不同。由于汉语是区别于印欧屈折语的孤立语，所以中国诞生的语言研究和语法规律和古希腊诞生的语法学差别很大。作为孤立语的汉语缺少词形的屈折变化，因此它需要通过添加虚词和改变词序来达到改变句子意义的目的，各类词的词性之间的界限也相对模糊，将其分类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于是，中国人在研究汉语时把重点放到了“字”的上面。秦汉之交之际（西方正处于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本具有语法性质的书籍《尔雅》；西汉和东汉期间又有了扬雄的《方言》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因此，从根源上来说，中国的语法学研究就与西方不同，西方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词，各种词的变化和组合规则构成

了西方语言的语法；而中国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字，是对字的读音、词义和字形进行的分析。¹⁹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详细讨论汉语的“字”与西文屈折语的“词”之间的关系。



图 7-5 特莱斯《中文语法》手稿书影

特莱斯这本教科书最大的特点便是首次将汉语教学的重点放在了“字”的上面。作者在介绍汉字的时候，是将其作为象形文字来进行说明的。在讲解汉字的时候，特莱斯将内容分为了四列：第一列是作为象形文字的原始图案；第二列为汉字；第三列为发音；最后一列则是意大利语的释义（图 7-5）。也就是说，特莱斯是在使用八大词类教学汉语的思维（教科书的第二部分）的同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于“字”的介绍和讲解（教科书的第一部分）。尽管画图并不是讲解汉字最合适的方式，毕竟许多汉字的抽象意义并不能够通过画图来解释清楚；整本书的编纂十分粗糙，即使作为未完成品，也能看出作者在编写时并没有很强的计划性；并且，将这本书第一部分的讲解重点放在“字”上，也有很大可能是中国书院的中国汉语教师的主意；但是这种以“字”为重点的汉语讲解方式还是为西方人的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可惜的是，这本教材最终并没有完成，所以也没有作为教科书在中国书院的中文系使用。

¹⁹⁰ 姚小平，《如何学习研究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47-54 页

（3）小结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其实已经有传教士在编纂自己的语法书（教材）时发现，使用欧洲语言的框架来描述汉语的语法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并且尝试对其进行改进。毕竟，欧洲语言框架并不能涵盖汉语中的各种语法现象。耶稣会法籍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在撰写其代表作《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时，在书中很明确地表示要脱离希腊拉丁语的模式来教授汉语¹⁹¹。他也在书中阐述了一些前人在编纂语法书时忽略的汉语语法现象，为汉语的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例如：由于缺少词语屈折，汉语通过改变词序或者增加虚词来改变词的性质；欧洲语言当中没有能与汉字相对应的元素，汉语当中每个汉字都能成为一个语素；汉语中的虚词十分重要……然而遗憾的是，尽管马若瑟对脱离希腊拉丁语体系进行了尝试，但却仍旧采取了这种模式来讲解汉语，并且他在书中阐述的汉语语法现象也并不是他第一个发现并且提出的。还有一位 19 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即撰写了《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的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了想要摆脱希腊拉丁语体系，却又继续使用这套体系的自相矛盾¹⁹²。

总体上来说，万济国神父在 1682 年撰写《华语官话语法》的时候，十分自然地继承了瑟拉克斯的八大词类系统，并以此作为分类目录来编纂汉语教科书，他承认汉语与西方语言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对此并未深究。在此之后编纂语法书的传教士抑或是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师生，无论是将《华语官话语法》翻译成《初学简径》的译者，还是编写《中文语法》的特莱斯，或者是作为他们前辈的马若瑟和马士曼，都是在意识到汉语和拉丁语语言体系差异的前提下，尝试着走出八大词类的框架，去寻找一种真正适合汉语的框架，但从结果看来，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7.3.2 王佐才编写的课本

¹⁹¹ 李真，《汉语札记》对世界汉语教学史的贡献，《世界汉语教学》，2005 年第 4 期（总第 74 期）。

¹⁹² 郑梦娟：《中国言法》：西方早期重要的汉语文言语法研究著作，《世界汉语教学》，2009 年第 3 期。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郭栋臣和王佐才。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对比较接近，加上又是老乡，还是书院同一批的毕业生。两人都编写了对后人影响很大的汉语教材。笔者接下来会逐一介绍两人的情况以及成就。

王佐才于 1842 年出生于湖北省，14 岁进入圣方济·沙勿略神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在 18 岁那年前往那不勒斯中国书院进行学习。1871 年毕业，于次年获得了神父的职位。由于当时书院在缪拉政府的改革之后已经开始招收意大利的青少年，因此王佐才和郭栋臣两人均负责青少年汉语课程的教授。

在意大利期间，王佐才编写了三本汉语教材，除了 1874 年的《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Vocaboli Usuali e Domestici con Frasi Semplici e Dialoghi Facili e Brevi*, 1874，那不勒斯出版），剩下的两本都没有得以出版。¹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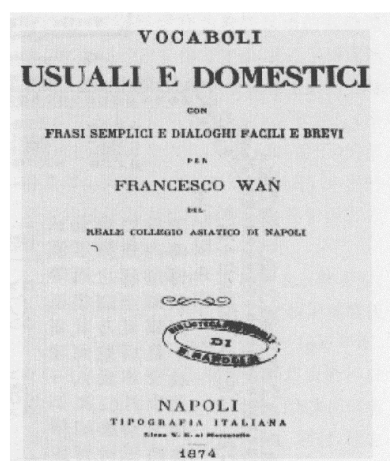


图 7-6 《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书影



图 7-7 《华学进境-读本》书影

（1）《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

《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严格来说并非教科书，而是一篇分类对话词汇集。余下没有出版的两本分别是《中文语法概要》（*Sunto Della Grammatica Cinese*, 1873 年完成编纂，并没有出版，手稿保存在罗马方济各会档案馆）以及《学说汉语新方法》（*Nuovo Metodo per imparare a parlare LA LINGUA*

¹⁹³ 白桦：《论王佐才对海外汉语教学的贡献——那不勒斯中华书院汉语教材再探》，载《国际汉语教育 4》，2010 年，第 91 页。

CINESE, 1882 年完成编纂, 藏于罗马传信部档案馆)。比较遗憾的是, 这三本著作的体量相对来说都较小:《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仅有 11 页、《学说汉语新方法》的手稿也只有 10 页。但是从这寥寥数页当中, 却足以看出此人编纂教科书的思路与以前西方人编纂汉语教科书完全不同。其中最能体现出思维差异的应该是《中文语法概要》了。

由于笔者没有机会去罗马方济各会档案馆查找这本《中文语法概要》的珍贵手稿, 所以对这本小册子的叙述部分均来自白桦的文章《论王佐才对海外汉语教学的贡献——那不勒斯中华书院汉语教材再探》。在这本小册子当中, 王佐才对汉语的很多方面进行了相对粗略的解说。从最开始汉字的书写和分类、到接下来中国书法的种类、笔画、部首、声调、实字和虚字、再到最后的句子结构, 都用意大利语进行了解说并且使用了很多汉字实例¹⁹⁴。

首先要明确的是, 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是《中国语法概要》, 其意大利语的原书名也用到了“Grammatica”(语法)这个词, 但是其核心内容并不是西方的“词法”。笔者在第一部中已经详细探讨过西方人在编纂语法书时, 除了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将重心放在了虚字上面之外, 几乎都把重点放在了汉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法”上面。基于西方对自身屈折语的研究,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当中“词法”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只要提到“语法”, 代表的便是“词法”。而王佐才的这本语法书则完全摆脱了西方“语法=词法”的既定框架, 开始分析汉语中“文字”, 包括汉字的书写、分类、部首、声调、笔画、实字虚字……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以汉字为中心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内容。

(2) 《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

和以前的汉语教科书相比, 还有一本小册子显得比较新颖, 这就是《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这本小册子也是王佐才编纂的汉语教材当中唯一出版的一本。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 这本小册子收录了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词汇和对话, 常用词汇的后面还会附上例句。前文数次提到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研究专家法蒂卡教授曾经对《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的内容进行了

¹⁹⁴ 同上 第 92 页。

整理¹⁹⁵。由于这本书的原文绝大部分是实用对话和词汇，所以作者将书的每一页都分成了左和右两个部分：左边一列是用罗马字标注的一句话的汉语发音字，右边一列则是这一句话的意大利语翻译，整本书中没有出现一个汉字。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字母发音的方法；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相遇时的情景对话 16 句；中国人遇到欧洲人的对话 16 句；询问、请求用语 10 句；有关天气的对话 19 句；名词 18 个；形容词 12 个；人称代词 6 个；附带例句的动词 19 个；附带例句的副词 8 个；介词、连词、叹词 13 个；助词 8 个；家庭生活对话 12 句；有关听、懂、认识的内容 15 句；征求意见建议的对话；来与去的句子 8 句；肯定否定句 10 句；有关年、月、日以及时间的常用词 40 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小册子当中，除了汉语常用的句子和词汇以外，王佐才还加入了一部分和天主教相关的词汇，例如：kiau-ieu（教友）、Ma-li-ia（玛利亚）、Tien-cu（天主）¹⁹⁶等等。这表明，尽管那时书院已经开设了面向意大利青少年的汉语课，但是王佐才的这本教材面向的对象似乎仍然是想要学习汉语并且想去中国传教的传教士。

这本小册子的编排方式类似于一部分类词典，但由于其主体部分是不同情景和不同语用环境下的对话，所以将其归类为分类词典似乎并不合适。这本小册子的编纂思路与以前西方人编写的教材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大多数汉语教科书在讲解汉语的时候，采用的基本上是最为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即使用古希腊的语法术来对教学语言进行描述，并将句子翻译成目标语言。尽管这确实是一种简单并且有效的教学方式，但所耗费的学习周期较长，而且会降低学生学习时的主观能动性¹⁹⁷。《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则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即直接构建场景对话，让学生上来就可以进行最简单的汉语对话。20 世纪初，两位来自英国的应用语言学家哈罗德·帕尔默（Harold Palmer, 1877-1949）和阿尔伯特·悉尼·霍恩比（Albert Sidney Hornby, 1898-1978）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搭建情景来进行语言教学的方法，并将其命名为情景语言教学法

¹⁹⁵ Michele Fatica, “Il contributo degli alunni de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alla conoscenza della lingua sinica in Europa e in Italia: il ruolo di F.S. Wang”, *Scritture di Storie*, n.5,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Napoli, 2005.

¹⁹⁶ 原文分成两部分，分别是注音以及意大利语的翻译，笔者在这里将注音拿了过来，括号当中则是在原文当中并没有出现的汉语部分。

¹⁹⁷ 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98-111 页。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这种教学方法预示着外语从语法加翻译的教学法转向了直接教授语言本身¹⁹⁸。而王佐才此时编纂的这本小册子《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 很明显在教学方法上几乎完全脱离了以前传教士编写汉语教科书时喜欢使用的讲授语法以及给词语释义的方式, 而使用了一种介于语法翻译教学法和情景语言教学法之间的教学法。这是这本小册子的一个重要特点。

(3) 《学说汉语新方法》

另一本只有 10 页的小册子《学说汉语新方法》, 总体上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汉语语音, 第二和第三部分则说明汉语与意大利语在语法上的不同, 并配以实例进行辅助讲解¹⁹⁹。全书同样没有出现汉字, 仅有意大利语的说明以及用字母标注出的汉语实例。

(4) 总结

王佐才从书院毕业正式成为神父之后, 留在意大利任教。他分别在教会的平信部和传信部教授汉语, 同时也在书院教授中国人意大利语。在这段留在意大利授课的日子里, 王佐才完成了上面所介绍的几本汉语教材。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 这些只有 10 页左右的小册子, 和以前西方人编纂的、动辄几百页的汉语教科书相比, 容量虽然很小, 但依旧体现出了王佐才独特的汉语教学思路和汉语教学观。尤其是《中国语法概要》这本书, 摆脱了以前西方人惯用的词法, 取而代之的是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方法来分析汉语的语法。由于这本小册子的发行是在郭栋臣《华学进境·小引》之后(本文接下来会分析郭栋臣《小引》), 加之其内容并没有《小引》详细, 这就使得王佐才的这本语法书并不像《小引》那样出名。王佐才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点是他《实用日常词汇与简短对话》当中所尝试的教学方式, 即脱离以往常用的语法翻译的方式, 而代之以场景对话的形式来教授汉语。这种教学方式现在看来并不新奇,

¹⁹⁸ Megan Smith, and Shawn Loewen.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The TESOL Encyclopedia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8, p.1-6.

¹⁹⁹ 白桦: 《论王佐才对海外汉语教学的贡献——那不勒斯中华书院汉语教材再探》, 第 92 页。

但在 19 世纪后半叶可谓十分超前，毕竟直到 20 世纪初才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了这种教学方式，并广泛沿用至今。

7.3.3 郭栋臣《华学进境》



图 7-8 郭栋臣照片²⁰⁰。第一排最左边编号为“4”者。

R. KuoGius 代表的便是郭栋臣的意大利语名字 Giuseppe Kuo。

除了王佐才之外，另一位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郭栋臣。郭栋臣，字松柏，教名若瑟，又名郭栋材，1846 年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市，有一兄长名为郭连城[1839-1866，意大利语名为 Pietro Ko，代表作《西游笔略》（1921 年出版）]。来华传教士认为郭栋臣是可塑之才，所以将其带回中国书院学习。1861 年，郭栋臣到达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在 1873 年顺利毕业之前，他曾与王佐才一起在书院向欧洲青少年教授汉语。在此期间，郭栋臣编纂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小册子，其中以意大利语版《三字经》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他还用意大利语编撰了一套汉语教科书《华学进境》（*Saggio di un corsodi Cinese*²⁰¹）。1873 年毕业成为神父之后，郭栋臣回到中国传播福音。13

²⁰⁰ Onorio Doria, *Biografia di Mons. Vincenzo Epifanio Carlassare O.F.M.* Vicenza (Italy):Società Anonima Tipografica, 1911. pp. 62.

²⁰¹意大利语的直译，意为“一套汉语课程的文章”。

年后的 1886 年，传信部由于书院汉语教师不足的原因写信给郭栋臣，希望他再次回到书院，教授汉语并且主持书院的日常生活，故郭栋臣再次回到意大利。

1888 年意大利政府关闭了书院的传教部门，随后 1892 年书院变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学学院，同年郭栋臣回到中国。1921 年，他与哥哥郭连城一起撰写并且出版了《西游笔略》。最后于 1923 年死于汉口。

正如马方济的文章题目所言，郭栋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毫无疑问充当了中西文化桥梁的角色。在他成为神父之前，他在书院学习的那段时光中所编纂的《华学进境》以及拉丁语版的《三字经》，为欧洲的汉语研究带来了十分新颖的观点。

（1）《华学进境》系列版本说明

《华学进境》系列共五卷，另附有一本《华学进境-小引》。其中《小引》主要介绍汉语的语法，为读者介绍了汉字的造字法、写法、标点发音等等。而五卷本的《华学进境》本体，作为初学汉语时的教材，郭栋臣选取了中国经典作为课文。五卷的内容分别是：《官话》、《文言文》、《构成》、《轻松学汉语》、《读本》。加上《小引》，《华学进境》这套教科书共有六本，由于流传下来的卷目只能够找到 1869 年和 1872 年的两个版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书确实上述两个年份当中出版过两次。但问题是，流传下来的只有《小引》和第五卷的《读本》两卷，剩下的四卷都已经失传。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是郭栋臣其实并没有完成他的教材编写工作。他只是列好了大纲，并且只完成了《小引》以及《读本》两卷的编写工作。从大纲来看，整套《华学进境》有可能是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汉语教材，如果只有《小引》以及《读本》两卷，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小引》的内容从汉字的书写、发音、形式等基础开始讲起，仅仅对汉语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这也是《小引》书名的由来；《读本》在没有任何意大利语解释以及注释的情况下，收录了例如《三字经》、《孟子》等等的中国古籍。所以有学者认为，很难想象在 1872 年，书院会单独出版两本难度跨度极大的教材，故“郭栋臣其实只完成了两卷的编写工作”的解释是不合理的。

²⁰²。笔者却认为不然：书院有可能没有将其当作一套完整的教材，而是作为一本单独的汉字入门和一本单独的高级读本来出版的。而且从后面的分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郭栋臣编纂教材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自学汉语，而是作为书院所使用的教材出版的。所以他只编纂了原计划 6 本中的两本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另外一种解释则是，剩下四卷只是单纯的失传了。这种说法确实值得怀疑，能够找到的现存《华学进境》，不论是 1869 还是 1872 年的版本，全都是《小引》和《读本》；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套书出版的时间已经是 19 世纪下半叶了，很难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已经出版的四本书会完全失传，而且书院自己也没有留下底稿；再加上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相关记录，都没有能够证明剩下四卷的存在，所以尽管存在这种失传的可能性，但是或多或少有些牵强。

总之，在缺少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并不能够轻易下结论。《华学进境》的其余四本，《官话》、《文言文》、《构成》、《轻松学汉语》到底存在与否，尚未知晓。

接下来，笔者将对现存的两卷《华学进境》进行分析。如上文所说，这两卷分别在 1869 和 1872 年出版，但由于很难分别找到这两卷的两个版本，所以在此仅对 1872 年的《小引》和 1869 年的《读本》进行讨论。

（2）《华学进境·小引》介绍

《华学进境·小引》，是五卷《华学进境》正文之前的内容，和卷名一样，是一个进入博大精深的汉语世界的“引子”。《小引》用意大利语从零开始介绍了汉语的基础：汉字。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详细说明了汉语这门语言的汉字基础。《小引》共分六章，分别为

1. Della scritturacinese（关于汉字书写）
2. Delle diverse forme de'caratteri（关于汉字不同的“形”）
3. Dell'ordinamento lessicografico de'caratteri（关于汉字的字典顺序）
4. Dell'ortografia（关于正字法）

²⁰²[意]孙为，《〈华学进境小引〉探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7 页。

5. Della Pronunzia (关于发音)

6. Differenza tra la lingua scritta, la mandarina e di dialetti (文言文, 官话以及方言的区别)

从目录细分上便可以看出,《小引》当中对于汉语的讲解与西方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完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小引》完全没有采用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八大词类”的以词为本的说明方式,而是继承了中国以字为本的汉语研究体系。

《小引》拥有意大利语封面和汉语封面各一个,意大利语封面上最上面的汉字写上了“华学进境”四个大字,汉字上面有拉丁文字的注音,下面则用意大利语写着“Saggio di un corso di lingua Cinese, per Giuseppe M. Kuo, Alunno del Collegio Cinese”(一套由中国书院学生郭栋臣所著的汉语课程)，“Nozioni preliminari allo studio della lingua Cinese”(学习汉语的基本概念),下方横写从《易经-系辞上》所引用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再向下则写明了出版地点以及出版时间“Napoli, 1872”。意大利语封面右侧竖写汉语“敬奉,纳玻里省书馆”。

中文封面则将意大利语封面中的所有意语部分均翻译成了汉语:封面正中竖写“华学进境”四个汉字;右侧将1872年转换为汉语“同治壬申年”,作者信息从“Giuseppe M. Kuo”变为“郭栋臣”;左侧竖写“纳玻里 中华书院藏本”;下方则将“Nozioni preliminari allo studio della lingua Cinese”译为“小引”;最外两侧分别写有“书不尽言”以及“言不尽意”。

(3) 《华学进境·小引》的特点

由于《小引》的正文部分是用手写体的意大利语写成的,对于非母语者阅读起来会存在一些困难。所幸重庆大学的意大利籍研究生孙为(Michele Salvemini)在其毕业论文《〈华学进境小引〉探析》²⁰³当中对整本《小引》的内容进行了汉译和总结梳理,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笔者参考了孙为的总结梳理,对《小引》的原文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特点进行了归纳。这些特点相较于前人的对外汉语教学书(其中包括西方传教士编

²⁰³[意]孙为,《〈华学进境小引〉探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写的各种语法书，以及中国人在西方人的协助下编写的《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来说，都有相当大的区别。

最重要的一点是，郭栋臣此次编写教材的思路和以往西方人编纂教材的思路完全不同。在缺乏了解对方语言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种印象，即两种语言的词与词之间能够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作为西方传教士早期代表的利玛窦和罗明坚，还是为了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明朝廷，在编写外语教材时，第一反应都是编纂一套双语对照的词汇表。然而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词汇表在语言知识的维度上有很大的欠缺。也就是说，单靠这样的词汇表，学习者并不能够确实实地学会一门语言。后来，西方传教士们开始了编纂语法教学书的工作，认为相较于一份词汇对照表，一本语法书能够更加全面地传授给学习者一门语言的相关知识。但可惜，这个时期的语法书几乎都没有摆脱西方语法的框架。使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描述教学别的语言，确实可以让学习者更容易接受这方面的知识，但是问题也显而易见：在很多情况下，西方的语言框架并不能够解释汉语中的一些现象。即便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调整和改进，这种使用西方语言框架编纂汉语教材的不合理之处依旧颇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人的郭栋臣另辟蹊径，尝试使用中国自己的语法教学框架来实现教授西方人汉语的这一目的。他的方法具体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几乎所有的西方人在编纂辞典或者语法书的时候，都把“读”汉字放在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一点能够从传教士们创造并改进的许多套注音系统中体现出来。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没有人将重点放在“写”汉字上面。每位作者对于不在自己的著作中教授汉字的书写似乎都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卫匡国的《中国文法》顾名思义是对于语法的研究，因此不涉及汉字书写顺利成章；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原标题为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即“官话的艺术”，看似应该或多或少介绍汉字的书写，但遗憾的是为了降低学习门槛，整本书当中都没有出现汉字，自然而然也就没有汉字的书写教学；《初学简径》尽管在《华语官话语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汉字，但它毕竟是译著，所以理所当然按照原本的目录和章节安排教学……尽管对于西方人来说，汉字的书写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学习的技能，但是在郭栋臣之前，却几乎没有西方人尝试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详细地教授汉字的写法。

在《小引》的第一部分之前，作者首先介绍了一些有关汉语的背景知识，随后便开始进行汉字笔画的教学：在解释了汉字十种不同的笔画种类之后，举例说明了基本汉字和复合汉字。郭栋臣将汉字的笔画分成了：横、直、撇、捺、钩、点、弯、挑、宛、转十种，并在旁边加上了拉丁字母注音、意大利语的对应翻译以及笔画符号。随后举例指出了这些笔画是如何构成汉字的。郭栋臣在此将汉字分成了两部分，分别是基本汉字和复合汉字。

我们将由简单笔画组成的汉字称为基本汉字，然后将这些基本汉字再一次进行组合，就变成了复合汉字.....复合汉字的笔画可以达到 50 画以上.....²⁰⁴

之后，在第四部分 *Dell'ortografia*（关于正字法）讲解了汉字的笔顺。同样，书写汉字时候的笔顺也是西方人编写的教材中从未提及的一个话题。而郭栋臣却十分详细地讲述了汉字书写所需要遵循的笔顺。在教材的第一部分之前讲解汉字的笔画，在第四部分讲解汉字的笔顺，毫无疑问，在为西方人编纂的汉语教材当中，这是第一次如此详细地解释汉字的书写，甚至说是第一次解释汉字书写也不为过。

《小引》的第二个特点便是，相较于西方人编纂的面向传教士们的实用语法书，郭栋臣在介绍汉语的时候夹杂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传说故事，这也许是为了激发意大利青少年学习汉语的兴趣。在进入《小引》的第一部分 *Della scrittura cinese*（关于汉字书写）的时候，作者就是从汉字的传说开始，最后举例讲解与汉字书写直接相关的六书。郭栋臣提到，在汉字发明之前，中国人与很多民族一样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事以及传递信息；之后传说中的青帝伏羲创造了汉字，从而终结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两汉期间，人们将汉字进行了归类，将之分为：象形、假借、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形声）共六种，称其为六书。

随后作者在第二部分 *Delle diverse forme de' caratteri*（关于汉字不同的“形”）继续讲述之前汉字的故事，这次他讲到了仓颉。在有关汉字的传说当中，伏羲和仓颉两人都被描述成了“创造汉字并且终结了结绳记事之人”。然而，从历史

²⁰⁴ Giuseppe M. Kuo, *Saggio di un corso di lingua Cinese*, Napoli, 1872, p.3, 原文为意大利语，由笔者翻译为汉语。

的视角来看，尽管仓颉也被称为“造字圣人”，但他的角色更倾向于是一名“汉字的整理者”。随后，郭栋臣讲述了汉字“形”的发展：周宣王时期开始使用大篆、秦代李斯发明小篆、汉代隶书、随后草书、楷书和行书。

这些对于中国传说故事的叙述，让这本《小引》变得不再是一本单纯的“语言”教科书，它在向欧洲青少年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小引》的第三个特点是，它首次明确地表示汉语当中的“字”与西方语言当中的“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外，它还加入了对于部首以及标点法的详细解释。首先，郭栋臣在《小引》的第三部分“Dell’ ordinamento lessicografico de’ caratteri”（关于汉字的字典顺序）解释了汉语的偏旁部首。在西方，很多对汉语感兴趣的学者都认为汉语的偏旁部首和西方语言当中的词根概念十分相似。然而，汉语本身是以“字”为单位的，而西方语言则根本没有“字”这个概念，所以，偏旁部首和词根两者本身并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郭栋臣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于部首的看法：

.....汉语的部首概念与西方的词根概念并不相同。部首是汉字基本的符号元素，而词根却常常包含了这个词原始的含义.....²⁰⁵

随后，作者又对中国学者进行部首分类的历史进行了梳理。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小引》总结归纳了中国人自己学习以及研究汉语的传统。这样的传统使得整本教材教授的内容，都是以“字”为基本元素的中国语言文字学²⁰⁶，与西方的以“词”以及“词法”为本教授“语法”的方式相距甚远。上述的几个话题更是之前西方人在编纂教科书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涉及过的。

在简单介绍了一下《小引》之后，我们可以认为：这本教材的内容与目录相符——它是完全按照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以“字”为本的教授方式，来教授汉语；其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和“西方语法”或者“词法”相关的概念。同样作为一本

²⁰⁵ Giuseppe M. Kuo, *Saggio di un corso di lingua Cinese*, p.12, 原文为意大利语，由笔者翻译为汉语

²⁰⁶ 中国的传统文字学，一般是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三部分。通过研究汉字的写法、读音以及释义来解释汉字。

教授汉语的教科书，郭栋臣的《华学进境》与一百多年前由万济国神父编纂的《华语官话语法》之间有着概念上的不同。笔者认为，相较于以前的教材，《华语官话语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使用西方语法框架来描述汉语的“成熟之作”；上文提到的《初学简径》则是在《华语官话语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中国化”的改变；而这套《华学进境》则是一本彻彻底底以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为基础，并且使用中国本土的语言框架的一本面向西方人的汉语教科书。

(4) 《华学进境·读本》分析

除了《小引》之外，郭栋臣还有两本十分重要的著作，分别是《华学进境》系列第五册的《读本》以及译成意大利语的《三字经》。前者分别于 1869 年和 1872 年出版，后者则是书院刚刚开始开设向社会招生的汉语教程时，郭栋臣所编纂的基础课本。



图 7-9 《华学进境》卷五“读本”扉页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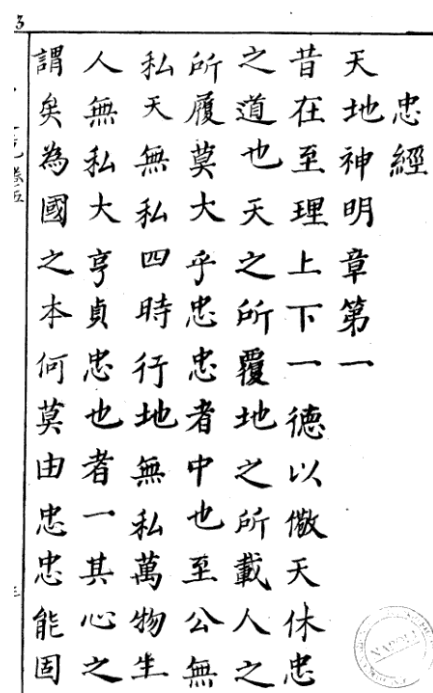


图 7-10 《华学进境》卷五书影

首先来讲一下《华学进境》系列第五册的《读本》。《华学进境》系列包括《官话》、《文言文》、《构成》、《轻松学汉语》以及《读本》，《读本》是整套教

材中的最后一本。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华学进境》系列加上《小引》仅存(或者也有可能是仅仅出版了)最前的《小引》以及最后的《读本》。

作为系列第一册的《小引》,我们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只对汉语最基础的知识做了介绍,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的入门教材;而作为系列最后一册的《读本》,则收录了包括《三字经》、《忠经》、《孝经》、《小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八篇文章,其中大多为儒家经典。《读本》全书除了封面以及目录使用了意大利语之外,主体部分的八篇文章全部使用汉语写成,并且没有任何注音以及翻译,因此,作为教科书,其整体难度可谓相当之大。

从这一系列六册的构成来看,至今尚未发掘(或者有可能根本并不存在)的四册,其难度存在着两种可能性:1.作者采取平缓难度梯度:让《小引》作为最简单的入门,而剩下五册采取不同的难度,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增加难度;2.第二种可能性是,除去《小引》以外的五本难度是相对平级的,都采用《读本》这样完全采用汉语编写的方式,只不过其中选取的文章以及话题会有所区别。造成剩下四本无论是其编纂方式还是难度都难以确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这四本已经失传,甚至连究竟是否存在过都存疑;第二点是这四本的题目尽管能够大致反映出书中的内容,但是却完全不能体现出其编纂方式和难度。例如:《文言文》按理来说似乎要比《官话》更难一点,但我们并没有办法为《轻松学汉语》这样标题的书目找到一个合适的难度坐标。第三点,尽管不是很直接但却很重要,那就是关于18、19世纪中国书院的汉语教学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文献记载。这就导致后人不明白这些教材和实际教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时也搞不清楚教材之间究竟是如何配合使用的。如果只使用一套教材的话,那么很显然《华学进境》系列的难度必须是递进的,然而就郭栋臣教材编纂的方式来看,极有可能只是将其作为单纯的读本来学习。这样,对余下四本书的疑问便又更深了。

(5) 对郭栋臣拉丁语版《三字经》的介绍

另外一本郭栋臣所编的教材是拉丁语版的《三字经》(1869)以及意大利语版的《三字经》(*Classico dei Tre caratteri*, 1900)。由于内容以及编纂方式相差不多,所以在这里笔者选取时间相对较早的拉丁语版《三字经》进行说明。

时至今日，对于传教士编纂《三字经》译本的研究相对较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局限在西方传教士的身上。而郭栋臣的身份有一些特殊：他无疑是一名传教士，只不过并不是西方，而是中国传教士。因此，虽然郭栋臣也被纳入了传教士编纂《三字经》译本的名单中，但是对其译本的研究则寥寥无几。近些年，与传教士编纂《三字经》译本相关的重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部：作为总括性质的研究，耿相新在其文章《〈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中按照语言类别对于不同国别以及时代的传教士所编纂的各个语种的《三字经》译本进行了概述，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勾勒出了一幅总览图，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²⁰⁷。另外，在传教士编纂《三字经》译本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那就是 1823 年基督教中文《三字经》仿作本的出版。在此之前，传教士翻译《三字经》都是将其作为汉语启蒙读本之用的，但自从 1823 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麦都斯（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出版仿《三字经》的，即以《三字经》形式为标准的布道手册之后，编纂翻译《三字经》渐渐从学习汉语的读物变成了传教工具。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所记载的 1820 年前伦敦会的传教事迹²⁰⁸以及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对新教在中国传教的记载²⁰⁹能够拼凑出一套完整的有关这段时间伦敦会传教的事迹。在国内，郭红以及司佳对《三字经》从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的这段历史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²¹⁰。

因此，在郭栋臣编纂拉丁语版《三字经》的时候，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利用基督教《三字经》作为宣教工具的行为已经有了相当一段时间了。然而，郭栋臣选择并且翻译这本读物的目的却是编纂一本基础课本，提供给开始向社会招生的书院使用。尽管郭栋臣自己也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但是他在翻译以及

²⁰⁷ 耿相新，《〈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国际汉学（辑刊）》，2014，第 301-323 页。

²⁰⁸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²⁰⁹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²¹⁰ 郭红，《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 至 1880 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第 6 期，2009，第 51-58 页。

司佳，《麦都斯〈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第 12 期，2010，第 112-119 页

编纂的过程中，却没有夹杂任何和宗教相关的东西。郭编纂的拉丁语版《三字经》全书共 30 页，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装订方式、传统的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对每个汉字挨个使用西文进行了注音以及释义。也许和《三字经》书本的特征有关，但是纵观整个西方人编纂汉语教材的历史，郭栋臣的《三字经》极其少有地完全采用了一个汉字对应一个或多个西文词的翻译方法：在此之前，无论是西方人编纂的词典和语法书，还是西方传教士帮助清政府编纂的《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其实都没有理清楚西方语言当中的“词”与汉语当中的“字”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而郭栋臣的这本《三字经》，则所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把“字”当成是汉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使用西方语言来讲解汉语每个“字”的含义。²¹¹



图 7-11 郭栋臣编《三字经》书影

²¹¹这种以“字”为最基本构成单位来研究汉语的思路，在 20 世纪上半叶，被学者郭绍虞称作“字本位”，与以“词”为基本构成单位研究汉语的“词本位”相对应。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以徐通锵、吕必松、潘文国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撰写论文以支持“字本位”研究汉语。

（6）郭栋臣教材的特点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郭栋臣的作品与先前的教材相比，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便是其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传教。以往的传教士们在编纂教材时，往往有着很明确的目标：希望能够培养出懂汉语的传教士，为传教事业做出贡献。这样的目的性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是传教士编纂的汉语教材的例句、例词时常会与天主教相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传教士们尽快掌握与天主教相关的汉语词汇，以方便传教；第二是教授内容以官话或方言为主，几乎完全不涉及任何有关文言文的知识，这样的好处是，由于大多数修会依旧是以平民百姓为传教目标（然而贯彻“从上至下”传教路线的耶稣会也几乎没有编纂过汉语教科书），只学习官话能够减轻教士们的学习负担，让其尽快学有所成。而《华学进境》和《三字经》则完全不再带有上述两个特征。尽管郭栋臣也是一名神父，但由于 1868 年书院开设了面向青少年的汉语课程，所以这些教材是写给孩子们的，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写给教士们了。这样的转换促使郭神父试图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以及汉语知识编入这一套教材之中。在兼顾趣味性的同时，舍弃了目的性，以这种方式将中国文化展现给意大利当时的青少年。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华学进境》还是《三字经》，编者的目的都是要将其作为书院的汉语教材来使用的。以往西方人在编纂汉语教材的时候，都将读者设定为了自学者，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教师或者老教士的指导，只要通过阅读教材也能获取相当的知识。郭栋臣编纂的教材却完全不同，在缺乏教师引导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主学习。例如《华学进境》第五卷的编纂方式：只有汉语的文章，而没有意大利语的解释。至于郭栋臣编纂的《三字经》，如果学生自学的话，其学习效果借助一本双语字典相比，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正如扉页上所写的那样，郭栋臣所编写的这些教科书是他献给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礼物。

7.3.4 本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截止到目前为止，对于书院的汉语教材以及汉语教学，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于缺乏书院本身对于汉语教学情况的各种记录，所以我们并不知晓书院的汉语教学工作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关于这个时期唯一和书院的汉语教学相关的记载，大概只有一封在书院学习汉语的学生朱塞佩·卡斯特利（Giuseppe Castelli）所写的书信：

.....我开始练习汉语，由于对语法并不熟悉，所以每天都会学习一些单词，并且尝试记住它们.....²¹²

这就导致了我們对于那个时期的教学状况几乎一无所知。的确，郭栋臣和王佐才编写了很多为书院所使用的教材，现在我们也仍然能够找到许多书院所留下的汉语教材，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书院究竟是如何使用这些教材来进行教学的。在缺少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光靠阅读《华学进境》这一套书，抑或是单独学习其它任何的书籍，似乎都很难达到学会汉语这一目的；不过，将书院丰富的藏书以及不同类型的汉语课本组合起来，并且配以汉语教师，从理论上来说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

另外关于书院汉语教材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书院现存的教材，几乎没有一套是完整的。《初学简径》是翻译了瓦罗神父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的半册而成；特莱斯的《中文语法》连一半都没有完成并且也没有出版；郭栋臣的《华学进境》的中间四卷很有可能并没有编纂.....这些教材的不完整或者缺失，无疑为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²¹² Miriam Castorina, *Atti del XIII Convegno dell'Associazione Italiana Studi Cinesi*, Franco Angeli, Milano, 2011, p.147, 原文为意大利语，汉语由笔者翻译。

7.3.5 总结

时间	人物、作品	如何解释汉语
17 世纪上半叶	卫匡国《中国文法》	几乎完全是西方语言框架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	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	完全以西方语言框架来解释
18 世纪上半叶	马若瑟《汉语札记》	用虚词和语序来解释
19 世纪下半叶	郭栋臣《华学进境》	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来解释

表 1 汉语语法教科书代表作是如何解释汉语的

笔者对西方汉语语法教科书的代表作进行了归纳。

总的来说, 郭栋臣所编纂的教材, 其基本原则与以往西方人编纂的汉语教材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最早编纂的汉语语法书(例如《中国文法》以及《华语官话语法》), 由于作者的母语是屈折语的缘故, 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词法上面。然而汉语并没有“词法”这个概念, 就连“词”的概念与西方都不太一样。其后, 马若瑟编纂的汉语教材, 相较于前人而言, 更加注重汉语本身的特点: 他已经明白在汉语当中, 实现西方语言“词法”功能的是汉语当中的虚词以及语序排列, 因此, 他在编写教材时, 直接将重点放在了虚词以及实例上面。

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 郭栋臣作为一名中国人, 选择了完全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来教授汉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在学习汉语的时候, 采用的学习方法与中国本地人学习汉语的方式相近, 所以可以看出耶稣会的汉语语法著作都有向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靠近的趋势。原因在于, 西方人的母语几乎都是屈折语, 所以他们是从西方语言框架, 换句话说来说是从“词法”开始研究汉语的。但随着与中国交流的深入, 他们逐渐发现西方语言框架并不适合汉语的研究和教学, 于是渐渐向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方向移动。

相反, 中国人则由于其语言的特性, 一直在使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来研究汉语。郭栋臣作为一名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将这种方法带到了欧洲。而这种研究的视角, 很大程度上就是马若瑟所寻求的适合汉语本身的框架。

无论是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抑或是教授欧洲人学习汉语，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立的中国书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院是设在欧洲的第一所中文学院，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参与了学院的建设。

尽管现在听起来，利用被教学的语言本身来教授外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彼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还相当少的情况下，西方人获取汉语知识的途径只有书籍。比如 19 世纪著名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 1788-1832）就是完全通过书籍来学习汉语的，他本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lentz, 1840-1893）也是通过阅读学会了汉语，并且完成了《汉文经纬》（*Die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一书。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立的中国书院，以汉语来进行汉语教学，对于中国语言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到了突破性的促进作用。

同时，书院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汉语—外语人才。中国书院建立的初衷是培养一批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但后来，一方面书院培养的人才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原因，书院开设了面向欧洲青少年的汉语课，从而打破了以往汉语知识被教会和部分学者垄断的局面。

此外，书院在不同的阶段还编纂了一系列的汉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汉语的认识。书院编纂的教科书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之前（见本文第一部的内容），欧洲人编纂的汉语教科书都是以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八大词类”的语言框架为基准，尽管马若瑟、马士曼等人想在欧洲语言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进，但最终都没有突破这个框架，他们依然是用一门屈折语的语法体系分类作为教科书的目录，来教授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到了第一阶段，两名跟书院关系密切的意大利人（极有可能是在书院的中国汉语老师的帮助下）进行了一些尝试，他们想把“八大词类”的西方语言框架和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结合起来，从而突破用西方语法框架来描述汉语的固有思维，但出于种种原因，最终却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到了第二阶段，则出现了两位用意大利语编纂汉语教科书的中国人：王佐才和郭栋臣，他们首次在欧洲编纂出了从汉语语法系统出发的汉语教材，并尝试向欧洲人传递汉语和西方

语言的区别。王佐才和郭栋臣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汉语课程开始向欧洲青少年开放的时候，编纂出以本国文化和语言系统为立足点的教科书，这无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以及加深欧洲人对汉语的认识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7.4 结论

最后，重新回到最初提出的三个问题上来：1.在马若瑟之后和甲柏连孜之前，西方对于汉语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质变级别的进步；2.礼仪之争的加剧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受到了相当的限制；3.汉语知识在西方一直处于被教会以及小部分学者所垄断的状态。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马国贤其实间接地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马国贤所做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缓解了礼仪之争中教会与朝廷之间的矛盾。马国贤从加入教会的那一刻起，就以教会的利益为出发点，把完成传教任务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他来到中国后，在不违背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入乡随俗，在中国皇帝面前表现的谦虚而有礼貌，因为他深知，皇帝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西方人想在中国顺利传教，取的皇帝的支持和民众的信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他自己的努力，缓解了皇帝与教皇之间的矛盾，为顺利开展传教工作创造了条件。

其次，马国贤创立了中国书院，让汉语以及与中国相关的知识走出了教会。在中国的十三年期间，他深刻认识到了学习汉语以及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为了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让他们学成后回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回到了意大利创立了中国书院。。尽管马国贤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天主教更加顺利地在中国传播，但在促进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将汉语和中国文化带进了意大利。书院在缪拉政府的统治下进行改革之后，开设了面向欧洲青少年的汉语课程，从而让汉语知识摆脱了教会的垄断，在欧洲人，特别欧洲青少年中间传播开来。而书院也从一个宗教性质的教会学校最终变成了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意大利语: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英语：University of Naples "L'Orientale"），履行着它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使命。

最后，书院后期的学生兼汉语教师郭栋臣和王佐才，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编纂了一系列的汉语教材。从最早西方人开始编纂各类汉语教科书开始，几乎采用的都是一种用西方语言的“词法”来描述汉语的方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有人发现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汉语是不合适的，因为汉语中根本不存在词法，将汉语生硬地套进西方语法的框架绝非明智之举。但直到甲柏连孜用一般语言学的观点来解释汉语之前，似乎并没有人找到比西方语言框架更好地描述汉语语法的方式。而郭栋臣和王佐才编写的教材，却为西方提供了另一种审视汉语语法的可能性，即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教授汉语，这无疑为西方的汉语研究乃至语言研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像马国贤这样的传教士，他们带着欧洲的语言和知识走向了世界，最终也将世界的语言 and 知识带回了欧洲。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传教士的存在，那么欧洲人的语言观将会禁锢在印欧屈折语的框架下。马国贤带回的和中国相关的知识，以及建立的中国书院，无疑为之后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八章 结语

8.1 汉语研究的发展

8.1.1 18、19 世纪意大利汉语教学与研究对语言学发展的作用

西方人首次以较大的规模对汉语进行学习和研究，大约始于利玛窦。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一门新的语言时，往往最先想到的便是这种新语言与母语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导致了无论中外在学习对方语言的时候，最先出现的往往是词典或者类似词典的词汇对照集。例如在中国最先出现的少数民族语言“教科书”以及外语“教科书”《华夷译语》系列均是以词汇对照集的方式出现的；而西方人最早编纂的作为学习汉语目的而使用的也是两种语言对照的词典（词汇对照集），例如利玛窦和罗明坚的《葡汉词典》。从仅存的文献来看，这个阶段其实很难看出编者对两种语言的差异和联系的理解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作者只是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将两种语言的词汇划上了等号。

到了 16、17 世纪，以多明我会为主的托钵修会开始研究汉语的语法，并使用以词法为根基的西方语言框架来分析汉语语法。本文的第一部在对这些传教士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后发现，这些传教士在编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汉语中的很多现象并不能用西方语言的框架来进行很好的说明和解释，但他们仍旧尝试将这些现象归纳在西方语言框架的某些类别之中。西方人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无疑推进了汉语研究的发展，但是这种以“词法”为根本的分析方式并不适合汉语。这个时期所诞生的以西方语言框架来进行汉语研究的方式对中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一直在使用这种框架来描述汉语；而象征着中国的语言研究进入新时期的《马氏文通》也是完全使用的这套框架。

古希腊开创的“八大词类”的语言框架，源于西方的屈折语——古希腊语，因此，以其为基础创建的语法系统不仅适用于古希腊语，稍作改动同样适用于同

为西方屈折语的其他欧洲语言。然而，将这套系统应用到汉语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分析语（孤立语）的汉语和综合语（屈折语以及黏着语）相比，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分析语不会对语素进行变化，而是采用改变语序来体现文法关系。西方语言的词类框架之所以将词类分成了八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同词类变化形式的区别，例如：屈折语的动词都会随着人称进行变位、绝大多数屈折语的名词都会随着词性不同进行变格等等。因此，将这套分析框架放到并没有屈折变化并且词类之间界限十分模糊的汉语上面，明显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最早使用西方语法框架编纂汉语语法书时，编者就已经发现，这套框架在有些地方并不适用于汉语，即便是将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描述汉语发挥到极致的万济国，也曾在《华语官话语法》中，尝试通过对这套框架进行一定的修正，从而达到完美解释汉语语法现象的效果，但毕竟这套使用词法的框架本身并不适合汉语，因此效果并不理想。

和多明我会相比，耶稣会在同一时期并没有将很大的精力放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多明我会采取的方式是在马尼拉创办学校，让传教士来中国之前，先在马尼拉学习一段时间的汉语。而耶稣会则直接让新教士进入中国，在老教士的指导下学习汉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所著的和中国相关的著作表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学习过文言文，并且在学习文言文时并没有采用西方的语言框架进行分析，而是直接通过书籍以及与中国人的接触来进行学习。中国古代的“语法书”和文言文著作，几乎都是依照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思路编纂而成。换句话说，耶稣会传教士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深刻影响。但遗憾的是，由于新教士在中国可以在老教士的带领下学习汉语，因此耶稣会一直没有把编纂汉语教科书当作是一件要紧的事情。本文在第一部中曾经分析了两本耶稣会传教士所编纂的语法书：第一本是卫匡国的《中国文法》，第二本是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从这两本书当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当时耶稣会会士学习汉语时与托钵修会不一样的地方。作为现存的第一本西方汉语语法书，卫匡国在其所著的《中国文法》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几个重要区别：汉字的不可屈折性；汉字词性的不确定性；实现西方语言屈折效果的方式是改变词序和使用小词。但遗憾的是，卫匡国虽然对汉语有着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最终仍旧使用西方的词法作为主体来

讲解汉语语法。直到 18 世纪上半叶马若瑟《汉语札记》的出现，才将耶稣会与托钵修会关于语法上的不同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在《汉语札记》中，作者直接将重心放到了汉语的字上面，但遗憾的是，马若瑟最终也并没有完全走出西方语言的框架。总的来说，耶稣会编撰的汉语语法著作，始终处在完全的西方语言框架和完全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中间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则开始慢慢地倾向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

18 世纪的中国，传教士们除了编纂了一系列面向西方人的汉语语法书以外，也帮助清政府编纂了一套西方语言教科书：《华夷译语》的西洋馆系列。这套教科书应乾隆皇帝的要求，延续了以往《华夷译语》的编纂模式。与同时代西方人编纂的汉语教科书相比较，《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只涉及了西方语言系统的冰山一角。本文在第二部中，以《拉氏诺话》为例，详细分析了《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的编纂方式，从中可以看出这套教科书的编纂思路依旧是将两门不同语言的词汇一一对应起来。也就是说，其研究的深度与利玛窦、罗明坚 16 世纪末编纂的《葡汉辞典》是一样的。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清朝廷编写出了第一套“外语教学课本”²¹³。可以说，这套课本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外语研究的开始，但同时不得不承认，就其研究成果来说，中国要落后西方一个多世纪。

同一时期的意大利，马国贤历经千辛万苦创立了中国书院，并且将中国的汉语教师带回了意大利，对意大利人的汉语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书院中的中国教师给西方人学习和研究汉语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无论是《初学简径》中第八章的改动，还是特莱斯编纂的《中文语法》，或多或少都在尝试打破以往的西方语言框架。尤其是《中文语法》，这本原计划分为两册的书籍（第一册介绍汉字，第二册讲解汉语语法），尽管并没有编纂完成，并且就内容而言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就第一册对于汉字的介绍来说，无疑是对西方人理解汉语的很大突破。在特莱斯之前的 17、18 世纪，尽管已经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或者学者提出了对用希腊、拉丁语框架描述汉语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莱斯在书院的中国汉语教师的帮助下，尝试加入了一册书的内容来讲解“汉字”本身。特莱斯这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标志着中国书院的汉语教材和汉语

²¹³ 朝廷的意图很明显是编纂一套面向中国人的外语课本，但是最后就其结果来说，却成为了一套分类词典。

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

随着书院学生的增加，书院的校友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精通汉语和几种西文，并且留在书院任教的中国人。19 世纪的后半叶，以郭栋臣为代表的书院学生，不仅成为了书院的教师，同时还编纂了多本汉语教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以及中国人自己学习汉语的方法用西文编纂成书，并在书院当中使用。与特莱斯的《中文语法》不同，郭栋臣的教材完全放弃了使用西方的语法框架来描述汉语语法，而是一本以“汉字”为基础的教科书。比起专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所编纂的教科书，郭栋臣的《华学进境》更像是一本写给中国孩子的汉语教科书，只不过书写的语言用的是意大利语。正如本文第二部所分析的那样，《华学进境》系列完全没有讲解西方语言概念当中以“词法”为基础的“语法”；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字”上面，《小引》当中无论是对汉字的写法笔画、读音拼写还是偏旁部首等等的讲解，都显而易见地体现出了作者“字本位”的思想。而郭栋臣的另一本著作，即意大利语版的《三字经》，更是把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音韵、文字、训诂这三大领域全都包含了进去。

自西方人学习汉语以来，郭栋臣第一次将这种中国传统文字学的学习思路介绍到了西方。之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学习汉语时，很大程度上使用的也是这种思路，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在西方“词法”和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之间的摇摆不定。在 17、18 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用西方的“词法”来归纳总结汉语的语法，并且将其编纂成书以供后人学习。郭栋臣的《华学进境》系列首次彻底终结了这种局面，从而使书院的学生，无论是年轻传教士还是意大利青少年，都能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来学习这门语言。

时间/地点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特点
16、17 世纪/中国	利玛窦、罗明坚	《葡汉词典》	单纯字与词之间的对应
17、18 世纪/中国	卫匡国、万济国	《中国文法》 《华语官话语法》	古希腊“八大词类” 几乎完全的“词法”思想
18 世纪/中国	清政府、魏继晋以及西方传教士们	《华夷译语》 西洋馆系列	单纯词与词之间的对应

18、19 世纪	特莱斯、 《初学简径》的译者 马若瑟 马士曼	《中文语法》 《初学简径》 《汉语札记》 《中国言法》	意识到西方语言框架的问题 尝试改进这套系统
19 世纪/意大利	郭栋臣	《初学简径》 《三字经》	完全以汉字为基础描述汉语
19 世纪/德国	甲柏连孜	《汉文经纬》	使用 19 世纪语言学的观点来描述汉语
19 世纪/中国	马建忠	《马氏文通》	使用“八大词类”来讲解汉语语法 完全的西方词法思想

表 8-1 中外汉语研究的发展

除此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本 19 世纪出版的汉语语法书，那就是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这本书对于汉语研究最大的贡献，可以引用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在《汉文经纬》序言当中的话：

《汉文经纬》在汉语研究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以往的著作，从 18 世纪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到肖特（W. Schott）、恩德利希（Endlicher）和儒莲的语法，对汉语的语法现象已做了系统、明白的解说，但是对汉语的语法结构和其他特点还不甚了了。在甲柏连孜以前，人们一直无意识地受到一种成见的左右，即认为应该根据拉丁语的模式衡量每一语言、建立每一语法。甲柏连孜第一个彻底摆脱了这种成见，认识到了一种印度支那语言的特性。²¹⁴

这本《汉文经纬》是一本集大成之作，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从万济国时代开始，西方人就一直没有摆脱使用西方语言框架描述汉语的禁锢，虽然马若瑟、儒莲、马士曼等人在其著作中很明确地表示使用拉丁语的系统讲解汉语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仍然没有脱离这个框架。直到甲柏连孜的《汉文经

²¹⁴ 甲柏连孜，重印版序，《汉文经纬》，Berlin: utscher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纬》开始使用 19 世纪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对汉语进行分析²¹⁵，这才完全突破了使用西方语言描述汉语的桎梏。甲柏连孜在书中完全没有使用已经存在的西方语法框架来套用汉语的语法现象，而是把这些语法现象上升到了语言学概念的层面上。

在几乎和甲柏连孜同时代的十九世纪末，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马建忠开始编纂自己的著作《马氏文通》。如上文所述，这是一本用西方语言框架来研究汉语语言规律的著作，也就是说，马建忠的这部作品继承了卫匡国、万济国等的思想。这本书无论在精细程度，还是对汉语的理解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 17、18 世纪西方人所编纂的语法书，达到了使用“词法”描述汉语语法的巅峰。这本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用汉语写成的语法著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语法著作”²¹⁶，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向现代语言学的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这本著作在中国的学术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这种使用西方语言框架研究中国语法的思路影响了中国人长达将近一个世纪。有趣的是，在《马氏文通》之前，中国人对于汉语文法的理解基本上基于传统的语言文字学，《马氏文通》改变了这一状况，将西方的语言框架运用到了汉语上面，自此之后，使用“词法”描述汉语的思想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而西方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西方人在刚接触汉语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使用基于西方语言框架的“八大词类”来描述汉语了。直到 18 世纪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建立以后，书院的汉语教师郭栋臣在 19 世纪完成了《华学进境》，才第一次将完全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思想来描述汉语的著作带进了西方，自此，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来研究汉语的思路在西方慢慢传播开来。

²¹⁵ 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当代语言学》第 1 卷，1999

²¹⁶ 申小龙，《论中国语法学的方法论》，《学术月刊》，1964 年第 9 期，第 14-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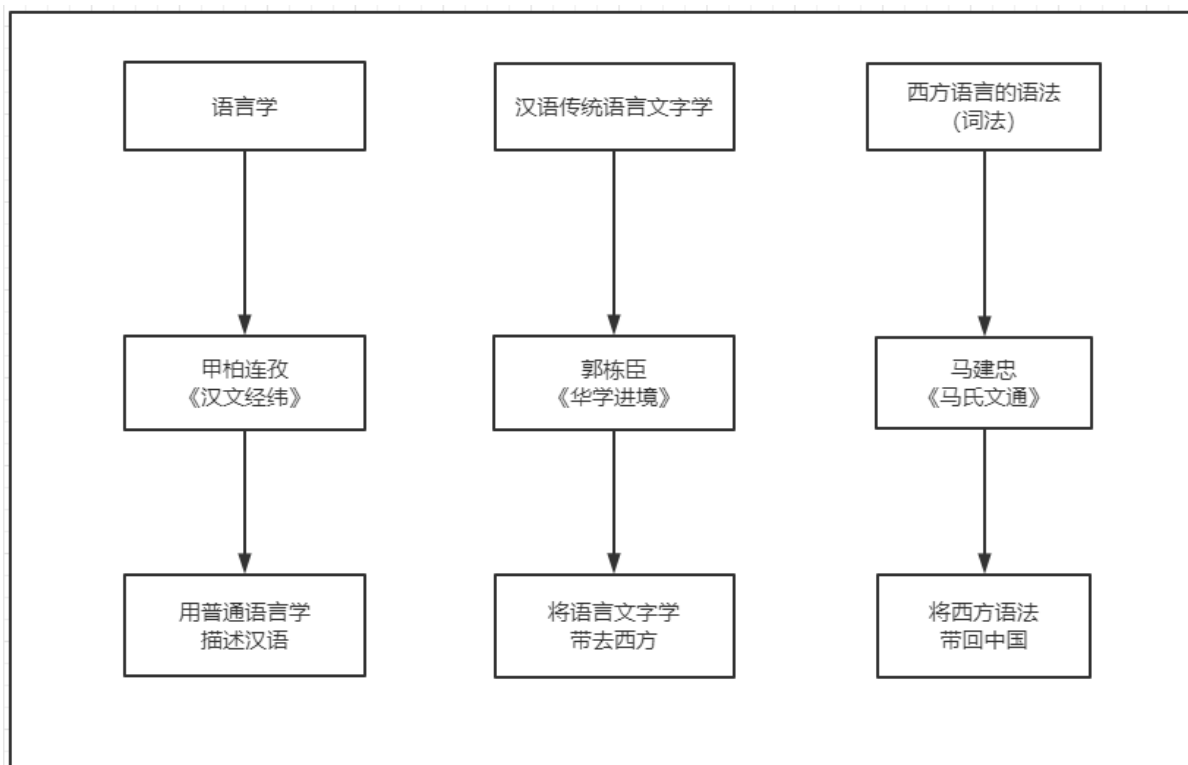


图 8-1 19 世纪汉语研究分裂成的三条线路

从上文可以看出，16、17 世纪传教士开始的汉语研究，到 19 世纪发展并且分裂成了三条不同的道路。19 世纪的这三本重要著作对整个世界的语言学发展以及汉语观的进步起到了弥足珍贵的作用。首先，最后出版的《马氏文通》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语法学。尽管相较于西方的汉语著作来说，这本书在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是作为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语法书，则为中国的语言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是郭栋臣在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编纂并且出版的《华学进境》，这套教材首次将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介绍到了西方，从而使以印欧语言框架为主导的西方语言学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概念。最后则是德国出版的《汉文经纬》，这本书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十分客观、深刻并且全面地介绍了汉语的语法，对东西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方西人对于汉语的研究整理成一条时间线，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但在 19 世纪的时候，这条时间线开始出现了分裂。西方人对汉语的研究不仅推动了西方语言学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外语教育和语言学的发展；反之，中国人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也被引入了西方，

为西方人学习汉语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将西方人的汉语研究分成一条主线和两条支线。第一条主线是从 16、17 利玛窦和罗明坚开始的汉语研究，他们两人共同编纂了第一套汉-外词典，并开创了对后世影响很深的汉语注音系统；接下来，卫匡国利用西方语言框架编纂了现存的第一本汉语官话语法书；随后的 17、18 世纪，万济国尽管已经发现了汉语中的很多语法现象与印欧语系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仍旧采取西方的语言框架来编纂自己的语法教科书；到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马若瑟、马士曼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再使用印欧语言框架来分析讲解汉语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对汉语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词变（汉语压根就没有词变），而是句子中各个成分的顺序。然而，他们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依旧没有完全脱离印欧语系的思维方式。最后，到了 19 世纪的下半叶，甲柏连孜才真正脱离了印欧语系的框架，彻底采用了客观的语言学视角来研究汉语。至此，这条西方人汉语研究的主线就告一段落。在西方人跨越了四、五个世纪的汉语研究过程中，从一开始汉字和西文词之间的简单对应，到最后用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客观科学地审视汉语，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接下来，是第一条支线。这条支线是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中国书院、并且聘请中国人作为书院的汉语老师后产生的结果。书院直到 19 世纪上半叶，才出版了作为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的意大利语译本《初学简径》。尽管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对原本进行了一些改进，但《初学简径》在汉语研究方面已经落后欧洲最先进的汉语研究一个世纪以上了。随着中国汉语老师的到来，书院的汉语研究和教材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即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无论是特莱斯的尝试，还是郭栋臣和王佐良的教材，都把书院的研究方向引向了与“西方语言学发展”这条主线不同的支线。

第二条支线是西方人的汉语研究对中国的语言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受中国朝廷的邀请，开始主持编纂《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但遗憾的是，这套丛书的编纂并没有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朝廷要求传教士按照《西番译语》的体例来进行编写，因此最终传教士们编纂出了一系列他们在 16 世纪末就已经能够完成的、带有注音系统的中西文词汇对照集，

尽管 18 世纪时西方对汉语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对汉语语法的研究阶段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作为第一部中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汉语语法书，意义十分重大。这本书将西方的语法概念运用到了汉语之中，其内容之广泛，研究之精细，都对中国的学术圈产生了巨大影响。无疑，马建忠在编纂此书时受到了西方汉语研究的巨大影响。然而可惜的是，《马氏文通》尽管就其编纂的精度和广度来说，远远超越了 18 世纪以及 19 世纪初西方人的汉语语法作品，但它和同时代的《汉文经纬》相比，缺乏普通语言学的支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可以将西方人对于汉语的研究成果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的研究以“汉字”为本；另一部分的研究则以“词”为本。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词本位”以及“字本位”的概念。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审视并且分析西方横跨了三个多世纪的汉语研究。

8.1.2 关于词本位和字本位

“本位”这个概念，指的往往是一个事物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语言学家们的“本位”概念，则是指语法研究并且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而“字本位”则是将“汉字”作为整个汉语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对汉语进行研究的这样一种思路²¹⁷。郭绍虞在他 1938 年所写的文章《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中²¹⁸，首次提出了“字本位”和“词本位”的概念。但此后，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却兴趣寥寥，鲜有讨论。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以徐通锵、吕必松、潘文国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才开始重新从语言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此时，由于对“本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相继有学者开始提出自己的“本位”观点，包括“句本位”、“词组本位”、“语素本位”、“小句本位”、甚至“复本位”和“无本位”等等。这些理论，有的和“词本位”一样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概念，也有像“复本位”和“无本位”这样本身就在否定“本位”概念的理论，但总体而言，这些观点都区别于“字本位”和“词本位”。。。

²¹⁷ 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六期），2005 年，

²¹⁸ 郭绍虞，《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8 年

至于汉语究竟适合使用哪种本位理论，对此的争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流派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的说法，由于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字本位”和“词本位”，因此在此不对其它本位理论做过多赘述。

（1）“本位”的相关研究

尽管“本位”是 20 世纪才出现的概念，但最早的汉语教科书或语言研究书籍中（无论是西方人编纂抑或是中国人的作品），都体现出了不同“本位”的思想。例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毫无疑问是将“汉字”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来进行研究的，故而体现出的是一种“字本位”的思想；再比如万济国神父的《华语官话语法》，由于继承了古希腊八大词类的概念，所以也将汉语的词语进行分类，然后逐一进行讲解，这种方法无疑是将“词”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体现的是一种“词本位”的思想。

（2）西方“词本位”的历史以及中国“字本位”的历史

下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国内外汉语研究的历史。首先是国内，在马建忠完成《马氏文通》之前，中国人对于汉语的研究几乎一直都在汉语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当中打转：研究汉字的本身以及音韵和训诂。也就是说，在《马氏文通》之前，中国对汉语的研究采用的几乎都是以“汉字”为本的“字本位”。学界基本上认可东汉许慎（58-147）所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开山之作²¹⁹。从此之后，中国的汉语研究被分成了三个领域：传统字形学的“六书”、传统字义学的“训诂”以及传统字音学的“声韵”。可以看出，这三个领域无一不是对“字”的研究，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字学始终是基于“字本位”的研究。

中国在汉语研究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是马建忠在 19 世纪编写并且出版了《马氏文通》。这本语法著作是中国人第一次将印欧语系的研究方法引入国内。本文在前面已经数次提到过西方的语法是以词法为基础的，马建忠在学习了西

²¹⁹ 濮茅左，《中国古文字学和〈说文〉的科学研究——兼论〈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新途径及学术贡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第 98 页

方的研究方式之后，借取了西方语法学的概念体系和描述方法²²⁰，以“词本位”为基础，对文言文的语法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学界基本认同，《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但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马建忠在书中讲解汉语时所采用的却是欧洲“词类”的分类方式：用“词法”来描述汉语。这本《马氏文通》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产物。《马氏文通》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将中国的语言研究方向从“字本位”转向了“词本位”。由于欧洲语言均为屈折语，词的形态变化极其丰富，所以西方更倾向于通过词类划分来研究一门语言的规律。这种将这种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原材料相结合的方式，毫无疑问能够诞生出新的力量，从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马氏文通》将西方研究语言的方法论套用到了汉语上面，尽管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却存在着一个不同忽视的问题。纵览本篇论文，可以发现早在 17 世纪中叶，卫匡国就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的语言框架来研究汉语语法了。《马氏文通》出版之前，西方人研究汉语以及汉语语法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学者认为，马建忠在其著作当中第一次为汉语草创了一套语法体系并且第一次对古代汉语语法材料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²²¹。但本文第一部的论述就表明，卫匡国、万济国、马若瑟等一系列西方传教士，早在 16 世纪就已经开始尝试创建汉语的语法体系，其成果与《马氏文通》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即都是尝试使用词法来研究汉语语法。此外，马若瑟在《汉语札记》中也已经对古代汉语的语法材料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调查。不可否认的是，和西方人的著作相比，《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体系的描述更为详细，所选取的语法材料也更加全面。但是这种量变却并没有引起质变：马建忠和来华传教士以及西方汉学家一样，都被困在了西方语言的框架之中。并且，受《马氏文通》的影响，在之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学术界的风向标从以前的“字本位”逐渐完全转向了西方“词本位”的研究体系。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术界才开始意识到将“词本位”的研究方法套用在汉语上所引发的问题。

我们知道，汉语作为一门孤立语，并没有西方语言丰富的词类变化，甚至

²²⁰ 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当代语言学》第 1 卷第 2 期，1999 年，第 1-16 页

²²¹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88-90 页

汉语中“词”的概念都与西方语言当中“词”的概念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所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字本位”的学者们基本都持同样的一种观点：无论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对外汉语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特点以及规律之上，也不是一味模仿使用“印欧语系”所采用的语言框架来解决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这个时期国内学界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有支持“词本位”的学者，也有认为应当回归“字本位”的学者，还有提出“语素本位”和“句本位”等不同本位概念的学者，甚至出现了“无本位”的概念。²²²

至于西方人对汉语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将罗明坚和利玛窦合作编写的《葡汉辞典》作为西方人开始研究汉语的开端。虽然《葡汉辞典》将葡萄牙语的词汇和汉语的词汇一一对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对汉语的研究。由于利玛窦和罗明坚这两位传教士的母语都是由“词”所构成的，并且《葡汉辞典》是一本外——汉辞典：先将葡萄牙语的词汇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好，随后再加入汉语的释义。因此这本辞典在编撰之时就已经定下了“词本位”的基调。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 17 和 18 世纪，几乎所有的汉语语法书，无论是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还是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都采用了西方的语言框架，利用词类的分类方式，使用词法来讲解汉语语法。卫匡国和马若瑟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西方语言与汉语的不同之处，马若瑟甚至明确提出了西方语言框架并不适合汉语的特点，但最终他们仍旧采取这种“词本位”的方式来讲解汉语语法。

直到马国贤建立了中国书院，并且将中国人作为汉语教师带回了意大利，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变。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教育，因此，当这些中国的汉语教师来到意大利的时候，也将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带进了意大利，从而为意大利人编写中文教材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受此影响十分明显的作品是特莱斯的《中文语法》，这本语法书分上下两部分的：其中上半部分很明显是在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讲解汉字；而下半

²²² 关于“汉语究竟该使用何种本位”的争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其就愈演愈烈。至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潘文国在其著作《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第二章当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以及讨论。

部分则利用西方语言框架来讲解汉语语法。这就形成了一种撕裂的局面：书的上半部分用的是字本位，而下半部分则又回到了词本位。

中国书院的后期，由于开设了面向欧洲青少年的汉语课程，因此书院编纂了一些面向意大利青少年的汉语课本。从小受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熏陶的郭栋臣编写的著作《华学进境》将纯粹的汉语“字本位”观念带进了西方。

到了 20 世纪晚期，西方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了“本位”的重要性，他们面临着和中国学者一样的问题：学习和研究汉语时究竟应该使用哪种“本位”更为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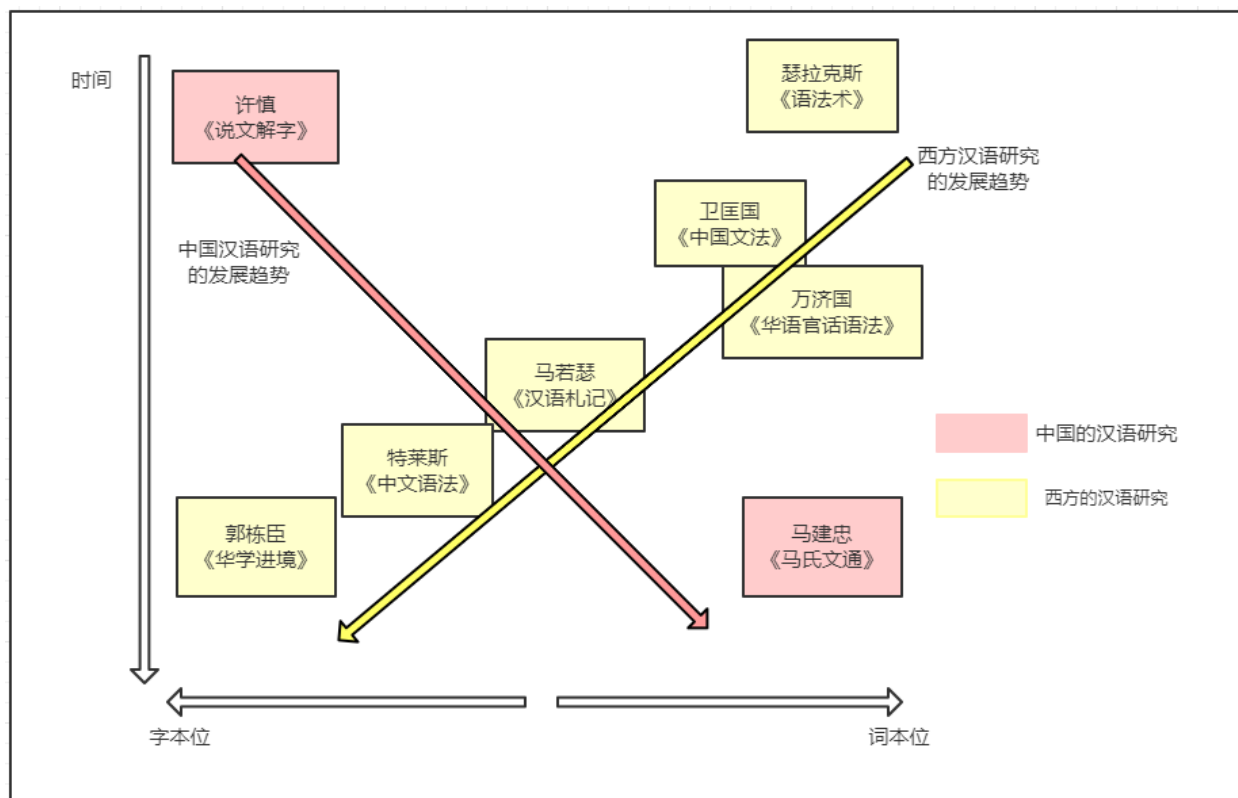


图 8-2 中国以及西方汉语研究的发展趋势图

上述分析表明，中西方对于“本位”的理解有一个有趣的过程：由于自身语言的原因，母语几乎都是屈折语的西方是从“词本位”开始研究语言的；相反，母语是孤立语的中国，则是从“字本位”开始研究语言。在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词本位”的思想来描述汉语，但随着对汉语理解的不断深入，他们逐渐发现似乎“字本位”才是更适合汉语的教学研究方式；而中国人通过与西方人的不断交流，却开始尝试使用“词本位”的思想来教学和

研究汉语。这充分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也是其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相互交融的过程。

8.2 西方汉语教学体系的变革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中国书院，这对于西方的汉语教学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书院的建立，不仅将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带进了欧洲，同时也为西方人的汉语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除此以外，无论是汉语学习的目的、方法还是教课书的编纂，都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本文将对此进行说明。

8.2.1 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动机

我们可以将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分成三个大类：第一类是传教士，他们为了在中国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而学习汉语，他们是早期汉语学习的核心成员；第二是研究者，对于那些对东方抱有兴趣的研究者来说，汉语无疑是他们学习的首选语言；第三则是欧洲的平民和青少年，他们开始学习汉语意味着汉语在欧洲的广泛传播。

首先是为了开展传教工作而学习汉语的传教士，从16世纪末开始，他们对西方汉语知识的垄断持续了长达将近三个世纪在此期间，几乎所有有关汉语的研究成果都出自他们之手。这些人学习汉语的动机也十分单纯：无论是利玛窦时期的传教士，还是马国贤建立中国书院，都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尽管时代不同、所属修会不同、在中国的种种经历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对西方的汉语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来华传教士，都深刻意识到了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教，汉语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

先从利玛窦开始说起，利玛窦以及那个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是耶稣会前辈的教诲，例如沙勿略和范礼安，他们在其它国家传教考察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了在和西方文化截然不

同的东方，如果不会当地语言将很难开展传教工作。因此，范礼安在罗明坚来到澳门时，便已经要求他学习汉语官话，之后各个修会都要求其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

第二是来自中国的平民。从利玛窦的回忆录²²³当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很多中国的平民都是十分排外并且难以接近的。整本回忆录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讲神父们是如何与中国平民“斗智斗勇”的故事。当然，这本书是从利玛窦——一名西方耶稣会会士的视角来看待各种问题的，所以对于当时中国平民与神父们所发生各种事情的叙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这至少说明了，中国平民确实给这些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这些麻烦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随行的翻译人员造成的。所有这些都让利玛窦等人痛下决心，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平民百姓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并尽量不找翻译人员帮忙。而通过学习汉语一方面能够博取一些中国平民的好感，尽快地融入中国社会，另一方面还可以摆脱对翻译人员的依赖。

最后的动机则来自中国的上层。无论是面对普通百姓的排斥，还是初到中国时相对匮乏的资源，这些都让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认识到，与中国的上层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学习汉语甚至用文言文写作、穿上僧服儒服、采取“驱佛近儒”的手段、妥协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社会规则（“利玛窦规矩”），这些都是深知中国这样一个等级制社会运行规则的利玛窦为了赢得中国上层的好感而采取的措施。

处于上述三方面的压力，学习汉语无疑是十分明智并且有效的手段。

而对晚于利玛窦一百多年的马国贤神父来说，学习汉语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为了完成自己作为传教士的使命——更好地传播福音。但由于年代和身份的不同，使得他学习汉语的理由与利玛窦有着些许不同。作为教会传信部的神父马国贤并没有很明确的一套类似耶稣会“自上而下”或是托钵修会“自下而上”的传教策略，而是权衡了两种策略的利弊，最后选择了一条中间的道路。马国贤学习汉语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平民，第二则是康熙皇帝。

前面已经提到，马国贤到达中国的时候，正值由于礼仪之争教会和朝廷的

²²³ 请参考，[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

关系降到了冰点，马国贤很快就意识到了两点：第一，皇帝是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必须要得到他的准许和支持才能够在中国顺利进行传教；第二，康熙皇帝本人并不排斥天主教，但是对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来说，康熙认为他们有必要接受和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语言。为了得到康熙帝的支持，马国贤延续了耶稣会的做法：一方面为朝廷提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具体到马国贤则是西方的绘画技术），另一方面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以此来拉近自己与朝廷之间的关系。

但马国贤也知道，最终信教的毕竟是普通民众，因此他也延续了托钵修会从底层传教的方式。但从中国的底层开始传教同样也需要掌握汉语知识。马国贤在自己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中国底层百姓与利玛窦所记载的并不相同：利玛窦日记中的中国底层百姓十分排外，而马国贤日记中的中国百姓就显得谦逊平和了很多。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了。总而言之，由于最终能够成为信徒的依旧是中国老百姓，因此，通过学习汉语拉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中国传教”，而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包括马国贤在内，更多思考的则更是“如何更好地传教”。在耶稣会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以及相对排外的百姓，利玛窦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采取灵活的传教策略将天主教带进中国；要不放弃自己的传教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汉语就成为了灵活传教策略的第一步。之后的传教士们相对来说就要幸运得多，在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会士们的共同努力下，天主教已经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并且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来自朝廷方面的阻挠，直到发生礼仪之争为止。

礼仪之争也让马国贤认识到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传教的限制相对来说较多，因此，与其不断派出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倒不如培养一批中国本土的传教士。这样的想法促成了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建立。如上文所提到的，一开始书院的学生大多数是为了回到中国进行传教的中国人，在法国人统治那不勒斯期间，书院发生了一些变化，渐渐地发展成

为了一所全面培养青少年的高中，生源也从“想去中国传教的中国人”变成了“欲成为复合型人才青少年”。这种学习动机的转变，对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书院转型之前，几乎所有的汉语知识都被局限在了传教士这个小圈子里面。尽管由于一些来华传教士所著书籍的流通，让欧洲的极少部分学者也接触到了汉语，但是总体来说，从利玛窦时代开始一直到书院转型前期，除了那些对亚洲怀有兴趣的欧洲学者，传教士们依旧垄断着这些和汉语相关的资源。书院的转型，让汉语第一次走进了欧洲平民和西方青少年中间。这些平民和青少年学习汉语的动机无疑与传教士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并没有传教的需求，所以这些人学习汉语纯粹是兴趣使然。

最后是对东方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如上文所述，传教士的汉语知识除了在教会内部流传，还传播到了研究东方的欧洲学者那里。从卫匡国完成现存的第一本汉语语法书开始，西方学界就不断地从传教士的著作当中发掘有关汉语的知识。16、17 世纪，欧洲的东方研究者大都并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传教士所编纂的相关书籍来研究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华传教士编纂的书目不断得到出版，加之中西之间书籍的流通日益频繁，欧洲学者们可用的研究资源逐渐增多，这就使得这些学者们即便没有去过中国，也能够得到大量的和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19 世纪有很多位著名的汉学家或者研究汉语的语言学家，其本人并没有来过中国，却取得了丝毫不亚于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成果。

8.2.2 西方人汉语认知情况

了解西方人的汉语教学体系，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在不同的时代，西方人对汉语的了解达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本文在上一章节详细分析了西方人汉语观的发展过程。16 世纪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当时他们对于汉语的认知几乎只停留在了“汉字是独特的，西方语言当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以及“汉字的读音有四声”。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便一直生活于此，并且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们不断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使他的汉语水平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但利玛窦对于汉语的语法并没有做太

多的研究。

17、18 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汉语是没有语法的”，“由于汉语并没有西方语言的词变，也就是说，相对于西方语言来说，汉语是一种相对原始并且低级的语言”。这两种观点在欧洲占据了很长时间，直到 19 世纪，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的前言部分还写道：

.....之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已是研究汉语言的第二十个语法家了，竟还得花时间跟人争论这种语言有没有语法。在当代的汉学家中间，否认汉语有语法的绝非少数.....²²⁴

尽管这两种观点毫无疑问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从这样的讨论当中可以看出，西方人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尝试理解汉语的语法了。无论是 17 世纪完成的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还是 18 世纪出版的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和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都明确表示，汉语毫无疑问是有语法的。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传教士们发现汉语的语法似乎与西方的语法体系很难契合到一起，因此，他们逐渐摒弃了将汉语硬塞进西方语法框架的做法，尝试着对西方语法框架做适当的改变，使其能够更加适应于汉语。然而，尽管他们对于汉语语法的理解一直在进步，但依旧很难完全摆脱希腊拉丁语框架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即便有很多汉语语法教科书的作者都在著作中表示了这样一种观点：“编纂汉语语法书，首先要将自己的思维从西方语言框架当中剥离出来”，但最终却未能实现。

19 世纪的时候，西方人对汉语的认知分成了两条线路：第一条以德国汉学家、语言学家甲柏连孜所编纂的《汉文经纬》为代表，它彻底摆脱了印欧语言框架的束缚，采用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和教授汉语。第二条则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由马国贤招募的中国汉语教师所引进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其中以郭栋臣编纂的《华学进境》系列为代表。

根据西方人对汉语的认知情况以及各种资料，我们大致能够推测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学习汉语时所使用的学习方式。但这套逻辑中依旧存在着两个问题：

²²⁴ [德]甲柏连孜著，姚小平译，《汉文经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F4

第一是知识传播的速度十分有限。尽管活字印刷术的诞生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开启确实加快了知识的传播速度，但是最前沿的研究依然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和社会位置的不同，尖端的汉语研究与实际的汉语教学很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万济国在 17 世纪末就已经完成了《华语官话语法》，此书于 18 世纪初出版之后，传教士们继续深入地研究汉语语法并写出了一系列的著作，无论是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马士曼的《中国言法》还是洪堡特的《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在某些方面对汉语语法的研究都比《华语官话语法》更加深入。但那不勒斯的中国书院，却在 19 世纪依旧选择了翻译《华语官话语法》（意大利语的《初学简径》）作为自己的教科书。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应用层面与最尖端的研究层面相差了将近 150 年。第二个问题则是，大多数时期，西方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都缺乏最直接的文献记录。例如那不勒斯中国书院成立之后，从书院正式开课到 18 世纪末，共开设了半个多世纪的汉语课程，但几乎在任何资料当中都找不到相关的记载。这就导致了只能从有限的资料当中推测很多时期的汉语教学和研究情况。

8.2.3 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方法

16 世纪后半叶到 16 世纪末，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由于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并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澳门作为一个东方传教的根据地，并在葡萄牙人的捐赠下，在此办起了学校。学校主要向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传授教义并对对来东方传教的传教士进行培训。因此，那些想去中国内地传教的教士们理论上都需要先在澳门学习汉语。罗明坚便是如此。然而，尽管在澳门向中国人学习汉语确实是一种方法，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居住在澳门的中国人大都是南方的商人以及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尝试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因此这些人的汉语水平并不好，向他们学习汉语成为了十分困难的一件事。

16 世纪末，利玛窦来到了澳门，与罗明坚一起学习汉语，但在进入了中国内地之后，他们学习汉语的方式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在内地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名懂得汉语官话的中国人来做他们的汉语老师。当时担任耶稣会会士汉语教师的有：翻译人员、专门聘请的汉语老师、皈依天主

教的教徒们、中国的学者等等²²⁵；另一方面，中国内地丰富的汉语文献也为想要学习汉语的传教士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着第一批耶稣会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进入了中国内地，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内地的难度有所降低；同时，新进入中国内地的教士可以直接跟着教会的前辈们学习汉语。

这种直接向中国人学习汉语的方式，加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使这一时期的耶稣会会士的汉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学习汉语时采用的是和中国人自己学习汉语同样的方法——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这也就导致了这个时期的耶稣会会士和中国人一样，对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较多，但却不怎么涉及和语法相关的内容，这一点从他们用汉语书写的著作和相关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

随着 16 世纪西方的对外扩张，耶稣会以外的其他托钵修会也在伺机进入中国的内地传教。如同耶稣会选择澳门作为自己的传教据点一样，托钵修会的教士们将菲律宾选做了自己的基地。当时的菲律宾已经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1565 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以后，为修会在菲律宾建立据点并向中国内地传教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奥斯定会开始策划传教活动之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也先后开始以菲律宾为据点向东亚各国传教。根据多明我会的记载，他们在 17 世纪初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为新教士开设了汉语语言课程。课程相对来说十分严格，并且设有汉语水平考试。

和在中国本土学习汉语的耶稣会传教士不同，以多明我会为代表的托钵修会在马尼拉只能通过前来菲律宾进行贸易活动的中国人带来的汉语书籍进行汉语研究。既然不能像耶稣会那样拥有丰富的汉语学习资源，多明我会的会士就开始自己分析和研究汉语，试图建立一套汉语学习体系。他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受到古希腊语言研究的很大影响，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对应和归纳总结汉语的各类语法现象。所以，这个时期的许多多明我会的会士，以语法书的形式编纂了汉语教科书以供新教士学习。因为大多数的新传教士对拉丁语的语言系统相当熟悉，所以，这些教材用印欧语的框架来讲解汉语的语法，这种方法尽管本

²²⁵ 高永安，《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的明末对外汉语教学状况，《中州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1 期，2007

身存在着问题，但它确实为西方人学习和研究汉语做出了贡献。

随着传教事业在中国的不断推进，教会渐渐发现了中国这片土地尚未挖掘的巨大潜力，各个修会都开始瞄上了这块巨大的蛋糕。同时，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和“礼仪之争”的发生，也让天主教教廷本部和中国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教会和朝廷都着手开设了汉语课堂。在汉语几乎完全被教会垄断的这段时期，除了耶稣会可以直接派教士来中国，让他们在前辈的指导下学习之外，其余想到中国开展传教工作或者商讨“礼仪之争”的教士们，几乎都需要在西方人开展的汉语课堂中学习一段时间的汉语。

马国贤便是在这样的汉语课堂中学习的汉语。根据马国贤日记的记载，他的学习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当，尽管笔者并没有找关于汉语课堂的实际教学记录来证明这一点，最终导致了马国贤在结束汉语课堂的学习并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的汉语水平并不是很理想。

综上所述，早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方式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以澳门作为传教基地，率先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它采取了让新教士直接进入中国，在老教士的指导下或者直接向中国当地人学习汉语的方式；第二种是当时以菲律宾为传教基地的托钵修会和以传信部为代表的教廷圣部，他们让新晋教士先在西方人开办的汉语教室中学习一段时间的汉语，之后再派他们到中国开展教廷（或者修会）交给他们的传教工作。就学习结果来说，耶稣会直接让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学习汉语，并且由于它贯彻从上至下的传教政策，使得传教士们需要和中国的高层进行频繁的接触，这种汉语学习方式，似乎更容易诞生汉语水平相对较高的教士，例如利玛窦和马若瑟，他们不仅熟练掌握官话，甚至对文言文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并且还能够用文言文来进行写作；而托钵修会则采取了和耶稣会相反的传教策略，因此教士们除了汉语官话还要学习一些方言，因为对他们来说，能与当地人顺利地进行交流是开展工作的重点，而并不需要像耶稣会教士一样对汉语进行深入的研究。

马国贤创立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将中国的语言环境带进了意大利，从而拓宽了上述两种学习汉语的方式，因为他。但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于书院汉语课的记载，所以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来对当时的教学方式进行

推测。书院创立的初衷是培养去中国传教的中国本土传教士，因此书院的汉语课一开始面对的是年轻的中国人。这就要求书院的汉语教师必须具有相当高的汉语水平²²⁶。在这种前提下，书院很明显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带入了那不勒斯。与汉语课堂不同，在书院中学习汉语的感觉与耶稣会在中国本土学习汉语的情况更加相似。19 世纪，书院的学生郭栋臣和王佐才编写出的汉语教材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郭栋臣和王佐才都是天主教的教徒，并且是作为传教士到那不勒斯中国书院学习的。但难能可贵的是，其编纂的汉语教材并不包含具有天主教性质的词汇和例句，是纯粹的汉语教材。另外，王佐才的教材中还出现了情景语言教学法，这在当时是领先世界的。此外，除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书院也出版了从西方视角教授汉语语法的教科书。

由此看来，书院的教学融合了以前西方人学习汉语方式的各种优点：既有良好的语言环境和高水平的汉语老师，同时还尝试教授汉语语法。因此可以这样说：自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鲜有意大利人在语言研究方面站在了世界的最前沿，但就汉语教学而言，书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8.3 结论

在很多学者的印象当中，意大利人对于汉语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了马可·波罗以及耶稣会入华早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了中国，将中国以及汉语的概念首次带进了欧洲。但由于马可·波罗自己并不会汉语，因此他对汉语更多的只是“叙述”，而不是“归纳总结”和“研究”。

利玛窦、罗明坚和卫匡国是早期入华的耶稣会会士的代表。利玛窦和罗明坚开创了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系统，这个系统在利玛窦时期就已经很完善了：利玛窦本人并没有对这套注音系统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总结，而作为后辈的金尼阁在这套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进，然后归纳成书并出版；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汉语进行了总结性的叙述，这些叙述尽管尚且存在些许不准确的地方，但在汉语研究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卫匡国将自己学

²²⁶ 当然，前文也分析过书院实际的学生当中，中国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同时可以推测参与汉语课学生的文化背景也来自世界各地

习汉语时的笔记整理成了《中国文法》，这是现存的、由西方人编纂的第一本研究汉语语法的书籍。书中主要采用了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八大词类”的分类方法，尽管后人发现用这种方法来讲解汉语语法有生搬硬套之嫌，但在当时确实向西方人描绘出了汉语语法的基本构成。由于是自己学习汉语时的笔记，《中国文法》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并且没有系统性，即便如此，这本书仍旧影响了很多欧洲的学者。

在卫匡国之后，意大利人研究汉语的这条线似乎就断掉了。后续站在汉语研究前沿的是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其它西欧国家的传教士。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万济国同样按照“八大词类”的方式，编写了一本十分细致详细的汉语教科书《华语官话语法》，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卫匡国的《中国文法》；18 世纪上半叶马若瑟编写了《汉语札记》，19 世纪初马士曼编写了《中国言法》，这两本书在方法论上都较《华语官话语法》有了提升，两人已经意识到用希腊拉丁语的语法框架来解释汉语很难成功；20 世纪上半叶，洪堡特发表的《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以及甲拍连孜完成的《汉文经纬》，则是第一次从语言学的角度，科学并且客观地剖析了汉语语法。上述的这些著作与意大利以及意大利人的汉语研究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上文所提及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编纂的汉语教材，包括 19 世纪上半叶翻译并重新编纂出版的《初学简径》以及特莱斯所著的《中文语法》，都是在发现完全使用希腊拉丁语框架解释汉语产生的一些问题后，尝试改进或者摆脱这套框架的约束。但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处于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之后，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之前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个时期中国书院的汉语研究，落后了西方人汉语研究最前沿大概一个世纪以上。这应该就是世人认为意大利人对汉语研究的贡献只集中在马可·波罗和耶稣会早期入华传教士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对汉语研究做出的贡献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最前沿的研究上。例如，以利玛窦、罗明坚、郭居静等人为代表的最早进入中国的那批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尽管对西方人的汉语研究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最大的贡献却在于架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虽然其它修会和教会对耶稣会的做法（与中国礼仪相关的种种做法）持一定的否定态度，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对是打通中

西文化屏障最高效的方式之一，从而为后来入华的修会提供了相当的便利。18世纪以后的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亦是如此，他们虽然并没有站在汉语研究的最前沿，但却为汉语在欧洲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国贤建立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第一次将中国的汉语教师带到了意大利。在此之前，学习汉语只能采取两种方式：1.像耶稣会传教士一样直接前往中国，在老教士的带领下，通过书籍以及和中国人的交往来学习汉语；2.像托钵修会或者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那样在自己开设的汉语课堂中学习。但第一种方式的成本过高，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来中国的条件，即便到了中国，也不能保证会有一名老教士手把手地指导学习；第二种方式的问题则在于汉语课堂的教师也都是西方人，他们在授课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从自身语言的思维出发，减少汉字的内容，并将重点放到语法和口语的交流上。所以最终的教学结果并不是很理想。而在那不勒斯建立一所由中国人担任汉语老师的学校就可以同时解决上述两种方式的缺点：将中国的汉语老师带回那不勒斯，那么想要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在意大利就可以获得到亲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的体验；另一方面，中国汉语教师在教授汉语的时候，很大可能运用的是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与西方人使用希腊拉丁语框架教授语法不太一样，使用传统语言文字学能让学习者更加全面地学习汉语，而不仅仅是将重点单纯地放在简单的汉语对话上面。

书院在引进中国汉语教师的同时，还聘请了一些优秀的中国毕业生担任汉语教师。19世纪，书院学生郭栋臣所编纂的《华学进境》更是成为了书院教科书的代表作。其实，从早期耶稣会会士来华学习汉语的情况来看，利玛窦、郭居静和马若瑟等人应该也是采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方式学习的汉语。只是他们在书写自己的汉语观、甚至出版自己的汉语语法专著时，并没有将其体现出来。例如马若瑟在《中国札记》中曾明确表示，想要学好汉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量阅读经典，但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篇幅却都是他对每个不同汉字的解释。这就说明，早期的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著作将自己学习汉语的方式准确地传达给其他西方人。郭栋臣的《华学进境》成功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华学进境》系列的《小引》详细介绍了汉字的写法和读音，后面的正文部分则直接收录了各种汉语文章。这种学习逻辑与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会士的汉语学习经历是相符的。西方人在学习《华学进境》的时候，可以获得一种一

种在中国本土学习汉语的感觉。

综上所述，18，19 世纪的意大利并没有在汉语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深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在 18 世纪上半叶中国礼仪之争达到高峰的时候，马国贤和众多教士缓和了教会与朝廷的矛盾：在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就中国礼仪问题争吵不休，康熙帝险些完全禁教的情况下，这些传教士们深知服从中国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的重要性，他们采取的对教会“阳奉阴违”的态度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马国贤在返回意大利之后，在自己故乡建立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书院的建立并没有直接推动西方人汉语研究的进步，但却带来了另两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点，在书院建立之前，欧洲人是无法在欧洲直接跟着中国汉语老师来学习汉语的。书院建立后，随着中国汉语教师以及想成为传教士的中国学生来到意大利，产生了相当规模的文化输出：以前，欧洲人有关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基本都是从西方人自己编纂的汉语课本和著作中获取的；而书院的中国老师和中国学生，开始在欧洲向西方人传授汉语和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不同于西方传教士使用西方的语言框架来描述汉语的语法，郭栋臣编纂的《华学进境》将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带到了欧洲，从而使欧洲人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内容。

第二点，自利玛窦来到中国，西方人开始研究汉语之后，有关汉语的知识就被教会所垄断。除了少部分欧洲的东方学学者能够有幸得到来华传教士和汉语相关的手稿，或者购买到他们编纂的在欧洲出版的书籍，一般民众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汉语。而书院在后期，尽管并非出于本意，开始接收意大利青少年，同时为他们开设汉语课程，这无疑对汉语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双向的，中国书院在促进西方汉语学习的同时，西方的汉语研究也对中国的汉语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体现出这种影响的是在乾隆年间编纂的《华夷译语》丁种本：乾隆皇帝命人将各个语种的《华夷译语》按照《西番译语》的体例进行重新编撰，受乾隆帝的委派，德国传教士魏继晋组织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协助朝廷编写了一套西洋馆的译语。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套汉——外分类辞典²²⁷。当时，和西方相比，中国对外语，甚至是汉语的系统研究都处于相对的弱势状态。《华夷译语》西洋馆系列的编纂无疑成为了中国外语研究的起点。一个多世纪以后，留学欧洲的马建忠在完成学业回到中国之后，编写了中国语言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语言框架的影响。

仔细梳理西方的汉语研究史以及中国的西方语言研究史，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双方不断交换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的过程。西方在研究汉语的时候，一开始是从西方的语言框架出发的，随后逐渐向中国的传统语言学靠近；而中国在研究汉语的时候，则从传统语言学出发，向西方语言框架靠近。

18、19 世纪的意大利，在汉语研究领域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却为中西双方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诚如马建忠用西方的语言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文言文，其实早在他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就有西方人对此进行了尝试但并没有人因此就否定《马氏文通》的学术价值。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应该忘记 18、19 世纪的意大利为西方汉语研究做出的贡献。

²²⁷ 这套书籍最开始的定位应该是外语教材，但是最终的成品实际是一套分类辞典，具体的分析请参照本文第二部对《拉氏诺话》的分析。
中国的第一套中西文分类辞典的定义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第一套由中国人组织编纂的中西文分类辞典。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白滨、金史波、卢勋、高文德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北平故宫博物院 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
- 董海樱,《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郭绍虞,《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8 年
-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
-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2010
- 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卷,中华书局,1987
-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 歐陽哲生,《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
- 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任萍,《明代四夷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苏嘉,《康熙字典》,出版史料,2008, 1-1
- 吴莉苇,《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徐忠文、荣新江,《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姚小平,《如何学习研究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姚小平 主编,《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鞞鞞馆及<华夷译语>鞞鞞“来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中文期刊:

白桦:《论王佐才对海外汉语教学的贡献——那不勒斯中华书院汉语教材再探》,载《国际汉语教育4》,2010

方豪,《中国初期留学史拾遗》,《磐石杂志》第四卷第一、二期,1936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2(1981)

耿相新,《〈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国际汉学(辑刊)》,2014

傅任敢,雍正年间意大利的中国书院,《中华教育界》23卷9期,1936

[德]福克司,《魏继晋司铎首创德华字典》,《中德学志》,第二卷第二期,1940

高永安,《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的明末对外汉语教学状况,《中州大学学报》第24卷第1期,2007

顾保鹁,“利玛窦的中文著述”,《恒毅》,1982,32:5

郭红,《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第6期,2009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李真:《汉语札记》对世界汉语教学史的贡献,《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

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民族研究》,2008(2)

刘亚轩,《清代留学生郭栋臣与中西文化交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11期

陆耿,“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2010

聂大昕,《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文献》,2016年11月第6期

濮茅左,《中国古文字学和〈说文〉的科学研究——兼论〈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研究的
新途径及学术贡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申小龙,《论中国语法学的方法论》,《学术月刊》,1964年第9期

司佳,《麦都斯〈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第12期,2010

孙宏开,《〈西番译语〉再考》,《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2002年

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六期),2005

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2期

王军,“对但丁与《神曲》的另一种认识”,《外国文学》,第6期,2015

王军,“薄伽丘和《十日谈》的另一种解读——纪念薄伽丘诞辰七百周年”,2013,《外国文学》,第4期,2013

乌云高娃,《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载《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4期

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当代语言学》第1卷第2期,1999年

赵继,《〈集韵〉究竟收多少字》,《辞书研究》1期,1986

张宜生,“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和分类”,《语言研究》(01),2000

郑梦娟:《中国言法》:西方早期重要的汉语文言语法研究著作,《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3期

中文学位论文:

丁娜娜,《那不勒斯中国科学院历史沿革及其中文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意]孙为,《〈华学进境小引〉探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中文译著: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 著,姚小平 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德]甲柏连孜 著,姚小平 译,《汉文经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丹麦]龙伯格 著,李真/骆洁 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

[英]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

[意]利玛窦 著,文铮 译,《利玛窦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列传及数目》,中华书局,1995

[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213册),齐鲁出版社,1997

[美]苏尔·诺尔 著,沈保义 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方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意]卫匡国 著,白佐良,白桦 译,《中国语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葡]曾德昭 著,何高济 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西文文献:

- Adkins, Lesley; Adkins, Roy: *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PF, Collegi vari, *Collegio dei Cinesi della Sagra Famiglia in Napoli*, b. 8, ff. 76-76v.
- Ameka, Felix K; Dench, Alan; Evans, Nicholas,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Walter de Gruyter, 2008
- Baugh, A.C.; Cable, T: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outledge, 2001
- Calvert, J.B.: *The Latin Alphabet*,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9
- Carroll, D. 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4th Edition, Thomson Learning, 2004
- Castorina, Miriam: *Atti del XIII Convegno dell'Associazione Italiana Studi Cinesi*, FrancoAngeli, Milano, 2011
- Coblin, W. South: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Early Qing Guanhua",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1996
- Coblin, W. South: "Notes on the Sound System of Late Ming Guanhua", *Monumenta Serica* 45, 1997
- Coblin, W. South: "Francisco Varo and the Sound System of Early Ming Mandain", *JAOS* 118: 2, 1998
- Collegio deritto dai PP. Cinese. *Programma*, s. d. e s. 1., in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Napoli, Misc. 252/11. 4
- Cummins, J. S.: *Jesuit and Friar in the Spanish Expansion to the East*,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6
-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Harper Perennial, 1998
- Doria, Onorio: *Biografia di Mons. Vincenzo Epifanio Carlassare O.F.M.* Vicenza (Italy): Società Anonima Tipografica, 1911
- Famularo, D., & Hong, S: "La didattica del cinese a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durante il decennio francese: uno studio sulla Gramatica Chinesa di Giovanni Filomeno Maria Terres (1813)", *Convegno annuale CIRSIL Centro Interuniversitario di Ricerca sulla Storia degli Insegnamenti Linguistici*.
- Fatica, Michele: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ercorso documentario e iconografico, catalogo della Mostra*, Napoli: Archivio di Stato di Napoli,

2006

- Fatica, Michele: *"L'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come sede di scambio culturale tra Italia e Cina nei secoli XVIII e XIX"*, in: Scritture di storia, 2001
- Gernet, Jacques: *Le Monde chinois*, Paris: Armand Colin, 1972
- González, José María: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 Juan Bravo, 1964-1966
- Grout, Donald Jay, Claude V. Palisca: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1988
- Grube, Wilhelm: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 č 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896
- Hayden, Debora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 Medieval Europ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2017
- Hirth, Friedrich: "The Chingese Central College", *The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II, pp.203-224, 1887
- Jonge, De; Constantijn, Casper: *Between Grammar and Rhetoric: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Brill. 2008
- Klötter, Henning: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LL, 2011
-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ir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Lundbæk, Knud: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Acta Jutlandica, 1991
- Kuo, Giuseppe Maria: *Elenchus alumnorum, decretal et documenta, quae spectant ad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Chang-hai 1917
- Li, Dan. J.: *Chin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69
- Maglioccola, Francesco: 郭栋臣 Guō Dòng Chén (1846 – 1923): the man which was a great bridge between Wuhan and Naples, in *Italy in Wuhan*, 2016, from <https://italyinwuhan.wordpress.com/author/italyinwuhan/>.
- Masini, Federico: *Chinese Dictionaries Prepar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Encounter and Dialogu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Beijing, 2001

- Messner, Dieter: "The First Portuguese Bilingual Dictionary Restoring to a Foreign 'Modern' Language – Chinese", *Review of Culture*, No. 34/35 (2nd series), 1998
- Milne, William: *A Retro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 Mommsen, Theodor E: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Vol. 1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 Mueller, Friedrich W.K: "Vocabularien Der Pa-Yi-und Pah-Poh-Sprachen 'Hua-I-Yi-Yii'", *T'oung Pao*, Vol. III, 1892
- Neill,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 Pelliot, Paul: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revised and edited by Takata Tokio, 1995
-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C. Moule & Paul Pelliot,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1983
- Pelliot, Paul: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revised and edited by Takata Tokio, 1995
- Pelliot, Paul Eugène: Le Sseu-yi-kouan et le Houei-t'ong-kouan, *T'oung Pao*, Vol.38, 1948
- Polo, Marco; Pauthier, Jean Pierre Guillaume: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F.Didot, 1865
- Robins, R.H.: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 Routledge, 1997
- Ripa, Matteo: *Storia della fo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C. scritta dallo stesson fondatore Matteo Ripa e de' viaggi da lui fatti, Tomo II, dallo stabilimento della Scuoola in Pekin fino alla solenne aperture di quest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in Napoli*, Napoli: Napoli dalla Tipografia Manfredi, 1832
- Ripa, Matteo: *Giornale (1705-1724) Vol I, Vol II, Testo critico, note e appendice documentaria di Michele Fatica*,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1, 1996
- Ripa, Matteo; Prandi, Fortunato: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6

- Ricci, Matteo; Ruggieri, Michel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 Rosso, Antonio Sisto: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 Mex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Author*”, Franciscan Studies, 1948
- Seuren, Pieter A.M.: *Western linguistic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1998
- Uchida, Keiichi,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nguistic Contact*, Goettingen: V&R unipress GmbH, 2017
- Varo, Francisco: Edited by: W. South Coblin, Joseph A. Lev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andra Breitenbach,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0
-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 Willis, Roy: *World Mythology: The Illustrated Guide*, Voctoria: Ken Fin Books
- 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 Volumes), John Murray, 1871

日文文献:

- 内田慶市、“T.S.Bayer（1694-1738）の Museum Sinicum（1730）に関する覚え書き”、「近代において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
- 高田時雄，“カトリック・ミッションの言語戦略と中国（特集 十字架とアジア）”，文学2.5，2001，
- 大友信一、木村晟，《日本館訳語》，东京洛文社，1968